



怎 么 办 ?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怎 么 办？

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6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6
(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10
(三) 俄国的批评派	15
(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22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8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29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33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42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52
(一) 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53
(二) 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63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66
(四) 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72
(五) 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75
(六) 又是“肆虐者”，又是“捏造者”	91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94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95
(二) 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99
(三) 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106
(四) 组织工作的规模	121

(五) “阴谋”組織和“民主制”	127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36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145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146
(二) 報紙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152
(三) 我們需要什么样式的組織?	163
結束語	170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統一的嘗試	173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180
注释	181

怎 么 办？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¹

“……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薩爾 1852 年 6 月
24 日給馬克思的信)

写于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1902 年 3 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7 年
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文集的
原文作过校訂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計劃，本书的任务是要詳細發揮“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一文^①中所發表的那些思想。我們应当首先向讀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許的諾言（这些諾言在答复許多私人詢問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太迟了。这样迟緩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間曾經試圖把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組織統一起来。当时自然应当等待这次嘗試的結果，因为这次嘗試如果成功，我們也許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火星报”对于組織問題的观点；无论如何，这样的成功可以保证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內存在两种派别的現象。讀者知道，这次嘗試結果失敗了，而且，正像我們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杂志在第10期上重新轉向經濟主义以后，这次嘗試也不能不失敗。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但因而也就更为牢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別作坚决的斗争，已經是絕對必要的事情。因此本书的原定計劃，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題，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問題，即我們的政治鼓動的性质和主要內容，我們的組織任务，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組織的計劃等問題。对于这些問題，作者早已感觉兴趣，还在一次試圖使“工人报”复刊（历次嘗試都沒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有成功)的时候(見第五章)，就想在这个報紙上提出這些問題了。但是，原定計劃，即在本書中只分析这三个問題，并且尽可能用正面叙述方式說明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論戰方式的計劃，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而根本无法實現。一方面，原来經濟主義比我們所設想的要頑強得多(我們所用的經濟主義這個詞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篇可以說是定出了本書大綱的“同經濟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的文章已經說明這一点^①)。現在已經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問題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黨內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什么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主义者看見我們在“火星报”上实际宣传我們的观点而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說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讲各的話；如果我們不 ab ovo^② 讲起，便什么也不可能讲清，所以必須作一次嘗試，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來就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一切經濟主义者作一番系統的“解釋”。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嘗試，來“解釋”一番，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書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別的办法，來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許的諾言。所以，除了为出版迟緩致歉之外，还要为本書文字修飾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經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斷。

对上述三个問題的分析，仍然是本書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較一般的問題談起：为什么像“批評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們甚至在社会民主黨对于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問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80—287頁。——編者注

② 从头。——編者注

題上都談不攏？其次，本来是要叙述我們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內容的观点，現在則变成了說明工联主义政治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間的区别；本来是要叙述我們对組織任务的观点，現在則变成了說明經濟主义者认为滿意的手工业方式与我們认为必須建立的革命家組織之間的区别。再次，人們用来反对全俄政治报“計劃”的意見越是沒有根据，人們越是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問題，即我們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組織的問題，我也就越是要坚持这个“計劃”。最后，在本书的結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經濟主义者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工人事业”杂志已經具有一种特別的、甚至可以說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現出来的不是彻底的經濟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整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們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的初看起來似乎是过分詳細的論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結束这个时期，我們就不能前进。

尼·列寧

1902年2月

—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争辩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辩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的中间，有人声称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辩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像外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

① 我要顺便说明一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斐尔派与爱森纳赫派²之间，盖得派与可能派³之间，费边社分子⁴与社会民主派之间，民意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辩，始终纯粹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争辩，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个别国家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在这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也许会充分地巩固起来，足以消除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

两个派別，这两个派別之間的斗争，有时熾烈起来，火焰騰騰；有时又靜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決議”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馬克思主義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伯恩施坦已經十分肯定地讲明，米勒兰已經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为头头是道的“新”論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論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貧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終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論，认为这个理論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們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轉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轉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許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納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①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別，按其內

① 此典出自罗馬神話，丘必特是掌管众神的最高之神，密納发是手艺、科学和艺术、教师和医生的保护之神。相传密納发女神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鎧甲、手执宝劍。因此，人們常常借此來比喻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譯者注

容來說，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論批評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末法国人已經設法把“新方法”具体表明了。法国在这一次也证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历来的名誉，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結局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彻底”。（見恩格斯为馬克思的《Der 18 Brumaire》^①一书写的序言）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談什么理論，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們能够立刻轉到有其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絕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爾馬尔都来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对他大加贊賞了！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的勇气，那末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閣，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統治，那末社会党人閣員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詞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經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諦之后，仍然留在内閣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向那目前恰好被法国社会党人叫做絞架、鞭子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专家的沙皇致賀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敗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識——这种社会主义意識是保障我們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只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听起来頗为响亮的 草案，这种改良真是微

① “雾月十八日”⁵。——編者注

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些！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像那个空桶的寓言了①。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的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道：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

① 要克雷洛夫寓言“两只桶”。这个寓言讲有一辆车子运两只桶，其中一只空桶，一路上晃晃荡荡，响声刺耳，弄得路人唯恐避之而不及。——译者注

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认为你們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帮助你們搬到那里去。不过，請你們放开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評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最近（第 10 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評自由”），並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論定理，而是当做政治要求，即为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組織統一起来”这一問題而提出的。它說：“要达到坚固的統一，就要有批評自由。”（第 36 頁）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确定的結論：1.“工人事业”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杂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活动的自由。現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結論。

“工人事业”杂志“特別”不喜欢的，就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爱作預言，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山岳派 和 吉伦特派必将決裂”①。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做十八世紀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見于“火星报”第 2 号（1901 年 2 月）的社論。这篇社論的作者是普列汉諾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无题派”⁶或孟什維克，至今都很愛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諾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來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現在人們却宁願默不做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編者注）

“工人事业”杂志編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們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說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馬克思主义者筆下写出这样的話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以想像的那样，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派別，包括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場上，站在无产阶级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的。”（第32—33頁）

好一个大胆的断語！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見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們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定說“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级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說法，是没有拿出任何論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大概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关于自己所讲的話，那末他的断語也就无須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別时竟以該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話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他随后所說的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絕對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說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頁），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完全的批評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他們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的害处”。

我們对此回答說：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簡直是“按伊洛瓦斯基⁷方式”来觀察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人的意見，要解釋德国社会党的一致和法国

社会党的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征，不必把軍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議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經濟生活以及經濟发展的情况拿来对比，不必提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論上的錯誤（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②），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錯誤（拉薩尔）的斗争——同时发生的事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法国人互相爭吵是因为他們不肯容忍；德国人彼此一致是因为他們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极端深奥的議論就“避开了”一件事实，一件完全推翻了维护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言論的事实。伯恩施坦主义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对于这个問題只有历史經驗才能給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義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曾經在自己的德国同道們的热烈贊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贊助下——參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頁），試圖独自 站稳脚跟。这种援引法国人“不肯調和”的言論，除掉有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于杜林的观点的，当时他們在党代表大会上甚至紛紛公开地責备恩格斯，說他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态度进行爭辯等等。莫斯特和他的同志們提議（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Vorwärts》（“前进报”。——譯者注）上不再登載恩格斯的論文，认为这些論文“絕大多数讀者都不感到兴趣”；而瓦耳泰希（Vahlteich）則說登載这些論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說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有貢獻的，“我們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大学教授們要彼此爭論，那末‘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爭論的場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們看，这也是维护“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慮一下这个例子！

其“历史的”(諾茲德烈夫^①式的)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忿的話来抹杀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們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許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摈弃伯恩施坦所作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⁹，以及那个虽带有很浓厚的外交意味、但是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卢卑克决议¹⁰。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上看来，这种外交式的态度适当到什么程度，当时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固然是个还可以争论的问题，总之，在评价拒绝伯恩施坦主义的这种或那种方法是否妥当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这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懂得现在有目共睹的实际情况^②。

不仅如此。正如我們上面已經讲过的，“工人事业”杂志还向

① 諾茲德烈夫是果戈里小說“死魂靈”中的一个地主，喜欢爭吵、招搖撞騙。果戈里称諾茲德烈夫为“历史”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丑“史”和乱子来。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意义，即指此意。——譯者注

②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杂志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問題时，始终只限于轉述事实，完全“不肯”說出自己对于这些事实的估計。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頁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¹¹时，竟把一切意見分歧都归結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絕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頁及以下各頁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轉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決議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像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到“专文”上去談。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頁上說道：“……倍倍尔所申述的观点贏得了代表大会絕大多数的贊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說：“……达維德發舊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 他首先就极力說明，說……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們毕竟是 (sic!) (原文如此!——譯者注)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場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間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大概已經不再相信倍倍尔的观点的正确性，而把达維德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来重複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大概它是认为我們这里有人冤枉了我們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主义者吧。究竟是冤枉了誰呢？是誰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問題，“工人事业”杂志始終避而不談，沒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主义者！这里我們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 被人冤枉的不是別人，正是“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上两篇論文中，都只讲到“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杂志）。如果是这样，那末始終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杂志，不替“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和批评自由說話，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 被人冤枉的是什么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說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誰呢？

由此可見，“工人事业”杂志还在繼續玩那种从它一創立起就开始玩的（这一点我們下面再讲）捉迷藏的游戏。其次，請你們看看第一次 实际运用被贊美的“批评自由”的情形吧。其实，在运用这个“批评自由”时所立刻表現出来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评，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做暗疾（照斯塔罗維爾¹² 的中肯的說法）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杂志，現在却主张 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来医治它！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內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現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視理論，而在实际上实行着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營垒中去，他們不是进行

維护原則和維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漸漸地、悄悄地、可以說是不受处分地敗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竭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是这种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說什么批評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統一起来的条件，却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結果，——这就等于是，說了話是为的什么也不說。

現在就讓我們把“工人事业”杂志所不願說出来的（也許是它所沒有能够了解的）东西，简单地說明一下吧。

（三）俄国的批評派

俄国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工人运动一开始发生和先进輿論一开始轉向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这是指“合法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而言。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現象，这种現象发生的可能，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在一个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緒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殘的时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現于受检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來說明这个理論的語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終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論当做危险的理論，却照例沒有发觉这一理論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論的批評。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军队終於发觉了新的敌人而加以攻击的时候，已經过去了不

少的(照我們俄国的尺度来計算)時間了。在这个时期，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了，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報紙相继創办起来了，大家都紛紛变成了馬克思主义者，人們都來奉承馬克思主义者，向馬克思主义者獻殷勤，出版家因为馬克思主义书籍的暢銷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自然也就出現了不少“趾高气揚的作家”¹³……

現在，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談論这个已經过去的时期了。誰都知道，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刊物上面盛行了一个短暫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溫和的分子实行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溫和分子是資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結論(由他們后来的“批評”发展过程所显然证实了的这个結論)还在“联盟”完整的时候，就已經有人意識到了^①。

既然如此，那末后来那种“混乱状态”，是否应当由那些同后来的“批評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負担最大的責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觀察問題的人們那里，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問題以及对于它的肯定的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賴自己的人，才会害怕甚至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暂时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不实行这样的联盟，就不能存在。而同合法馬克思主义者联合，乃是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我們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們实行了这个联盟。同时，締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 1895 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馬

① 这是指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論文(見“列寧全集”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311—481 頁。——編者注)，該文是根据題目为“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編者注)

克思主义文集，即“俄国经济发展問題的資料”¹⁴。假使我們同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在文字上的協議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末这一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條約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資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資产阶级民主派，正是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俄国的現状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須使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資产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对立性。現在大多数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紛紛向往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評”派，却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蝕社会主义的意識，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緩和論，硬說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縮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縮小为要求逐漸实行細小的改良的“現實主义的”斗争。这同資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因而也就是否认它的生存权，是完全一样的；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条件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由于俄国有它的“独特”之点，所以这个破裂也就只是简单地表現在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刊物上消失而已。在这种刊物上，“前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評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譴責”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統”、“批評自由万岁”的口号（現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竟使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擋不了，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①的名声的）伯恩施

^① 赫罗斯特拉特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为了要出名，于公元前356年放火焼掉了古希腊有名的艺术建筑——阿尔蒂米斯神庙。——譯者注

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出現，祖巴托夫也极力介紹伯恩斯坦和普羅柯波維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这些就可以說明这一点。現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純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而这个思潮不仅表現在刊物中。随着人們的轉向“批評”，那些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随之傾心于“經濟主义”。

合法的批評和不合法的經濟主义彼此間的联系和互相依賴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味的問題，值得專門写一篇文章来分析。这里我們只需要指出显然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赫赫有名的《Credo》^① 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而且吐露了“經濟主义”的基本政治傾向：让工人去作經濟斗争（更确切些說，是让工人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有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溶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間”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而合法的批評则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論調成了反对經濟主义的一个极好的武器，所以，如果沒有《Credo》，也应当杜撰出一篇《Credo》来。

《Credo》并不是杜撰出来的，但是它的公布却是沒有得到它的作者們的同意，也許，甚至是违反了它的作者們的意願的。至少参加过将这一新“綱領”公諸于世的本书作者^② 已經听到过一种怨言

① 信条、綱領、对一种世界观的闡述。——編者注

② 指反对《Credo》的十七人抗議書而言。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議书的工作（1899年末）¹⁵。1900年春，抗議書曾同《Credo》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46—158頁。——編者注）現在从摩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¹⁶杂志上）已經知道，《Credo》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經濟主义者”中間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羅柯波維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編者注）

和責難，說不應該把發言者用來歸納自己的觀點的一種草稿複制散發，冠以《Credo》的名稱，甚至還同一份抗議書一起刊印出來！我們所以要講到這段情節，是因為它揭露了我們的經濟派害怕公開發表的那種耐人尋味的特點。這正是整個經濟派的特點，而不只是《Credo》的作者們的特點，因為表現出這種特點的，有最坦白最熱誠地擁護經濟主義的“工人思想報”，有“工人事業”雜誌（它因人們把“經濟主義的”文件在《Vademecum》中^①發表出來而表示憤慨），有基輔委員會（它在兩年以前也曾經不願意讓人把它的《Profession de foi》^②連同那篇反駁它的論文一起登載出來^③），還有許多單個的經濟派分子。

擁護批評自由的人有這種害怕批評的表現，這並不只是他們在玩弄狡猾手腕（雖然毫無疑問，他們有時也非耍一點狡猾手腕不可，因為把還沒有巩固的新派別的萌芽暴露出來讓敵人攻擊，是很不合算的！）。不，大多數經濟主義者確實是抱着惡意來看待（並且按經濟主義的實質來說，他們也應當這樣來看待）一切理論上的爭論、派別的分歧、廣泛的政治問題、把革命家組織起來的方案等等的。“讓僑居國外的人去干這些事情吧！”——一個相當徹底的經濟主義者有一次這樣對我說過，而他這句話是代表一種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純粹工聯主義的）意見的：我們的事情就是管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運動、工人組織；至於其餘的事情，都是學理主義者虛構出來的東西，都像“火星報”第12號上發表的那封信的作者們和“工人事業”雜誌第10期異口同聲地所說的那樣，是“夸大思想的作用”。

① 在“指南”¹⁷中。——編者注

② 信條、綱領、對一種世界觀的闡述¹⁸。——編者注

③ 據我們所知，基輔委員會的成分從那時起發生了變化。

試問，既然俄国的“批評派”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末凡是不仅口头上反对机会主义，而且願意真正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設法恢复在合法馬克思主義时代刚刚开始，而現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論工作；如果沒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順利发展。第二，必須积极反对严重地腐蝕人們意識的合法“批評”。第三，必須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駁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的企图。

無論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沒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往下便要从各方面來詳細地說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現在我們只想指出，“批評自由”这个要求同我們俄国的批評派以及俄国的經濟派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用来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決議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們认为在党的刊物上自由批評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是絕對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評不同这个理論的阶级性质和革命性质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頁）

理由就是：決議的“第一部分是与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問題的決議相符合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們这样抄襲就是证明他們自己思想貧乏到了极点！……“但是……決議的第二部分却比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

既然如此，“联合会”的決議就是反对俄国伯恩施坦主义者的了？否則援引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岂不是十分荒謬！然而，要說这个決議“严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諾威決議逐条拒絕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卢

卑克決議中，則對伯恩施坦個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們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對俄國“批評派”和俄國經濟派所特有的任何一種表現都只字不提；既然對這一切避而不談，那末空空洞洞地說什麼理論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就只是要留下更多的曲解的余地，——何況“聯合會”還不願把“所謂經濟主義”看做是機會主義（“兩個代表大會”第8頁，關於第一條）。但這還只是順便說說而已。而主要的是，機會主義者對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在德國和在俄國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德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主張保存現有的東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經由幾十年的經驗詳細闡明了的原有的綱領和策略。“批評派”想加以改變，但由於這個批評派只是一個很小的少數，而他們的修正主義企圖又很怯懦，所以黨內大多數在反對“革新主張”時只是干脆把它拒絕了事，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我們俄國，却是批評派和經濟主義者主張保存現有的東西。“批評派”希望大家繼續把他們當做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保證他們在各方面享受過的那种“批評自由”（因為他們實際上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黨的聯繫^①，並且我們也沒有一個為大家所公認的、能“限制”——哪怕是用規勸的方法也好——批評自由的黨機關）；經濟主義者要革命者承認“現時運動的正當性”（“工人事業”雜誌第

① 單是缺少公開的黨的聯繫和黨的傳統這一事實，就表明了俄國的情形和德國的情形的根本差別，這種差別必定會提醒每一個明智的社會主義者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從下面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批評自由”在俄國達到了怎樣的地步。俄國的批評家布爾加柯夫先生竟譴責奧地利的批評家海爾茨說：“海爾茨所做的結論雖然很有獨立精神，但是他這個問題（合作社問題）上的見解，看來半竟是太受本黨的意見的束縛了，他雖然在細節方面持有分歧意見，但始終不敢離開一般原則。”（“資本主義和農業”第2部第287頁）一個政治上备受束縛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被政治上的奴性和完全不懂黨的榮譽和黨的聯繫的習氣敗壞到極點的國家裏的臣民，却傲然地責備一個完制國家裏的公民，說他過於“受黨的意見的束縛了”！那末，我們的不合法組織就只好去擬訂關於批評自由的決議了……

10期第25頁)，即承认現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載的那封“来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們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附刊”¹⁹第14頁)。相反，我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崇拜“目前”現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滿；我們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們声明說，“在統一以前，并且为了統一，首先必須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公告)^①。总之，德国人主张保存現有的东西，拒絕加以改变，而我們却要求改变現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現有的东西以及同它調和的态度。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們的“自由的”抄襲德国人決議的专家們也根本沒有觉察到！

(四)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这是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社中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們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問題提到日程上来，我們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們还主张再提出一个問題：

誰当公断人呢？

我們面前有两个刊物出版公告，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綱領”(“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两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16頁。——編者注

个文件都标明是在 1899 年公布的，当时“馬克思主義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們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第一个文件絲毫沒有指出这个現象，也沒有确切說明新的机关刊物对于这个問題所打算采取的立場。关于理論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問題，无论在这个綱領中，或在 1901 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对于这个綱領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 15—18 頁），都絲毫沒有提到。在这整个时期內，“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始終都把理論問題置諸脑后，虽然这些問題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問題。

与此相反，第二个文件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們对理論的兴趣減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論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評”我們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傾向”。已經出版的几期“曙光”杂志，表明了这个綱領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見，所謂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詞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飾人們在理論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說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現象（这是德国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現象）：赫赫有名的批評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論来代替另一种理論，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論，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則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論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論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論修养的人，由于看見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見，“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綱領重要”²⁰，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論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

面所引的馬克思的這句話，是从他論述哥達綱領的那封信里摘引來的，馬克思就在那封信里严厉地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所抱的折衷態度。馬克思寫信給黨的領袖們說，如果需要聯合，那末為了達到運動的實際目的，可以締結條約，但是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的意思就是這樣。而我們這裡却有人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減弱理論的意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機會主義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由於存在三種時常被人忘記的情況，理論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剛在形成起來，剛剛在確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他各種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危險的派別進行的清算還遠沒有結束。恰恰相反，正是在最近時期，可以看到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派別活躍起來了（這是阿克雪里羅得早已向經濟主義者預告過的）。在這種條件下，初看起來似乎“並不重要的”錯誤也可能引起極其可悲的後果；只有毫無遠見的人，才會以為進行派別爭論和嚴格區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或者多餘的事情。這種或那種“色彩”的加強，可能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許多許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其本質來說是國際的運動。這不僅意味著我們應當反對民族沙文主義。這還意味著在年輕的國家里開始的運動，只有在運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要運用別國的經驗，簡單了解這種經驗或簡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為此必須善于用批判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經驗，並且獨立地加以檢驗。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長和擴展，就會懂得，為了履行這個任務，需要有什麼樣的丰富

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們在下面还要談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們身上的种种政治責任和組織責任。現在我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論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讀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請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驅者赫尔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輝的革命家；就請想想俄国文学現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請……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現在讓我們引证一下恩格斯 1874 年談到理論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義問題时所发表的意見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經濟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論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經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現代各种問題和爭論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們希望讀者不要因为我們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見的珍本书的《Der deutsche Bauernkrieg》^① 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話而埋怨我們：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們属于欧洲最有理論修养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謂‘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別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

^① Dritter Abdruck. Leipzig, 1875. Verlag der Genossenschaftsbuchdruckerei.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萊比錫第3版，合作书局发行。——編者注)

論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現在这样深入他們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國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組織，但是前进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魯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魯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國人都迟。德国的理論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記，它是依靠聖西門、傅立叶和歐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們終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論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記，它是依靠英國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没有英國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們現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須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計劃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說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國工人运动具有島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鎮压，

所以現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許他們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預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們还占据这个地位，他們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給他們的种种責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須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来越透澈地理解种种理論問題，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詞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們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識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須日益加强團結党组织和工会組織……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說他們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驗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們表現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們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²¹

恩格斯果然料中了。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意外严重的考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驗，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驗。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加无比严重的考驗，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較起来，真是小巫見大巫。历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們現在可以这样說）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們有理由指望，只要我們能够用我們

的先驅者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們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們的比当时更廣闊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們就一定能够获得我們的先驅者在当时已經享有的这个光荣的称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 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們已經說过，必須用七十年代革命家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們的比七十年代更廣闊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人怀疑过这一点：現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們缺乏自觉性和首創精神。

但是，近来却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到現在为止对于这个問題的一切流行的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論战的时候，不仅提出了局部性的反駁，而且力图把“一般意見分歧”归結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归結为“对自发的成分和自觉的‘有計劃的’成分互相比較的 意义有不同的估計”。“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責难是，“輕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① 我們回答說：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論战，除了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一般意見分歧”之外，完全沒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結果，那末单是这个結果也使我們感到很滿意，因为这句話的含义很深，它

^① 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7頁和第18頁。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編者加的。

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的各种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意見分歧的全部实质。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問題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这个問題应当十分詳細地加以討論。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 紛纷 倾心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事实。就在大約同一时期，在 1896 年有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之后，工人罢工事件也是这样紛紛发生的。工人罢工的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說什么“自发的成分”，那末首先当然应当承认这种罢工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但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的。早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紀前半叶），俄国已經发生了罢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現象。同这些“騷乱”比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經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向我們表明：“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騷乱也表現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經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們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說是了解到）必須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順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掙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說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現出来的自觉的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經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已經預先考慮較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討論別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說騷乱不过是被压迫的人們的抵抗，那末有系統的罢工所表現的已經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說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

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經激起，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調和的对立，也就是說，他們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虽然比起“騷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終究还是純粹自发性的运动。

我們已經說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会、必須同厂主斗争、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①。而社会主义學說則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学、历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会地位來說，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到我們現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學說不仅已經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綱領，而且已經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爭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論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时特別要指出人們常常忘記的（而且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

① 工联主义决不排斥一切“政治”，像人們有时认为的那样。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間的区别，我們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說明。

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论鼓动”一书中的许多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他们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做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末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的报纸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正准备付印的时候，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安·亚·瓦涅也夫^①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了三十年之后，会有一个“俄国旧事”杂志²²从警察署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做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标题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论文^②，是论述警察摧残知识分子运动委员会的事件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当时运动实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获得首都的工人以及革

① 安·亚·瓦涅也夫在拘留所里被单独拘禁，在那里得了肺病，因此于1899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最了解安·亚·瓦涅也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命知識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一創举的失敗，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經驗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滿足当时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²³也是如此，“工人报”²⁴以及 1898 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更是如此。当然，我們根本沒有想以这种缺乏修养来責备当时的活动家們。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經驗，并且从这个經驗中求得实际的教訓，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必須指出，有一部分（也許甚至是大多数）在 1895—1898 年間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正确地认为在那个时候，即在“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綱領和战斗的策略^①。当时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这是很自然的現象，这决不会引起什么特別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撓地實現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經驗和組織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願望就行！只要能認識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認識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消失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說过的那

① “‘火星报’对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抱否定的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細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沒有条件进行別的工作”——經濟主义者在他們“給俄国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 12 号）中这样說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謂“沒有条件”的說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九十年代末，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除了为細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进行 別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領導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經濟主义者”不公开承认我們这些思想家、我們这些領導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沒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说什么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試問，这不是盲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酷愛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些活动家中間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說成是美德，甚至想为自己盲从和崇拜自发性的态度奠定理論基础的时候，这个小不幸就变成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別，用“經濟主义”这一过于狹隘的概念來說明它的內容是很不确切的，現在該給这个派別做个总结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在沒有讲到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刊物上的表現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這是我們从上面所說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件事实多少可以看出，当时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們中間怎样产生和发展了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內两派之間的糾紛。1897年初，安·亚·瓦涅也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被遣往流放地以前，参加过一次非正式會議²⁵。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會員和“青年派”會員。当时談到的問題，主要是組織問題，特別是关于“工人儲金会章程”問題，这个章程的最后确定的条文发表在“‘工作者’小报”²⁶第9、10期合刊上（第46頁）。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把他們戏称之为“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們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間，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銳的意見分歧，发生了激烈的爭論。“青年派”拥护已經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則。“老年派”說，我們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巩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組織，并且使各种工人儲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間进行宣传的小組等等都受它的領導。当然，爭論的人們并没有认为这个意見分歧就是分离的开端，恰恰相反，他們认为这是一种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見分歧。可是這件事实表明，在俄国，“經濟主义”也并不是沒有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争就产生和传布开

來的(現在的經濟主義者往往忘記了這一點)。至于這個鬥爭多半沒有留下“文件的”痕迹，這只是因為在當時進行活動的各個小組的成分變化得很快，沒有任何繼承性，因此意見分歧也就沒有用任何文件記載下來。

“工人思想報”的產生使經濟主義暴露出來了，但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出來的。必須具體地了解當時俄國許許多小組的工作條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具體地了解這一點)，才能懂得新派別在各個城市里的成敗中有多少偶然的原因，而這個“新”派別的擁護者或反對者又是多么長久地不能夠斷定，並且簡直是根本無法斷定，這究竟真是一个特殊的派別呢，或者只是一種個別人缺乏修養的表現。譬如“工人思想報”頭几號的膠印版，甚至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們現在所以能夠援引“工人思想報”第1號上的社論，只是因為在弗·伊一申的文章²⁷(“工作者”小報第9、10期合刊第47頁及以下各頁)中轉載了這篇社論，而弗·伊一申自然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來熱心——真是過分地熱心——夸獎這個新的報紙，認為這個報紙與上面我們所說的各種報紙以及準備出版的報紙大不相同^①。這篇社論是值得談一談的，因為它把“工人思想報”和一般經濟主義的全部精神都極其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社論指出穿藍色袖口衣服的人^②決不能阻止工人運動的發展，接着說道：“……工人運動所以這樣堅強，是因為工人終於從領導者手里奪回了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來掌握了”，並且把这个基本

① 這裡要順便說說，在1898年11月間——當時經濟主義，特別是在國外，已經完全形成了，——這樣夸獎“工人思想報”的這位弗·伊一申，不久以後便成了“工人事業”雜誌的編輯之一。而“工人事業”雜誌當時却還否認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兩個派別存在的事實，而且直到現在還在否認這個事實！

② 這里是指沙皇警察。當時沙皇警察穿藍色袖口的制服。——譯者注

論点进一步作了詳細的發揮。其实，領導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組織者）可以說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了的^①，而人們却偏說工人与这些領導者作过斗争而擺脫了他們的束縛！他們不但不号召前进，去巩固革命組織和扩大政治活动，反而号召后退，去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說什么“人們因經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杀了运动的經濟基础”，說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銘是“为改善經濟状况而斗争”（！），或者說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說什么罢工儲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組織更有价值”（請把1897年10月間說的这段話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爭論比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謂我們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間的“精华”，而是“中等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謂“政治始終是順从于經濟的”^② 等等之類的話，現在已經成为一种时髦的論調，并且对于許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大半只是根据合法刊物上的叙述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片断的青年，已經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于是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表現这种自发性的，就是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部分

① 从下面一件明显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件事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在什呂謝尔堡大道上的工人中間传着一个消息，說这次逮捕是一个接近某个常与“十二月党人”接触的团体的奸細尼·尼·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造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②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第1号上的那篇社論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²⁸ 的理論修养究竟怎样了。当馬克思主义者正在刊物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了解政治与經濟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把“經濟唯物主义”粗陋地庸俗化的論調！

工人，他們听信这样的說法：对每一个卢布工資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貴；他們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們現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第1号的社論）。这种詞句是西欧資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們因仇視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搬到本国来，向本国工人說，純粹工会的斗争^①才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和将来的什么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現在也來重复这些資产阶级的詞句了。这里必須指出三个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往下分析 現代的意見分歧^②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現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故意玩弄詞句，但可惜这是一个痛苦的真实情况！这种現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就是沒有亲身参加过现代俄国的运动，而只是聞到运动的气味的人，也清楚地知道事实正是这样。而我們所以还要特別坚持使讀者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實彻底弄清，我們所以还要引用有关第一次創办的“工人事业报”

① 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純粹工会的”斗争的人。

② 我們这里强调 現代的，是要請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聳聳肩膀說：現在斥責“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們回答这班现代的伪君子說，*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里暗指的就是你。——編者注）关于这班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們将在下面加以證明。

以及 1897 年初“老年派”与“青年派”爭論的材料来实际地加以說明，是因为有些以“民主主义”自夸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輕的青年們）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問題，我們以后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經濟主义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現，我們就可以看見一种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們了解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見分歧的現象，就是那些主张“純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說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場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純粹工联主义者”的論据。这件事实向我們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 «Credo» 綱領。这件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終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說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①，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② 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領導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純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創造出而且一定会創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錯誤。为了补充我們以上所說的話，我們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談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綱領草案时所說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話^③。

① “火星报”第 12 号上发表的“經濟主义者”的來信。

② “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

③ 1901—1902 年 «Neue Zeit»（“新时代”。——編者注）第 20 年卷第 1 卷第 3 期 第 79 頁。卡·考茨基所談到的綱領起草委員会的草案，由維也納代表 大会（去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

“在我們那些修正主義的批評家中間，有許多人以為馬克思似乎曾經斷言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條件，而且還直接產生認識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識（着重號是卡·考·加的）。于是這些批評家就反駁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國，對於這種意識却是最陌生的。根據草案看來，可以設想：被人用上述方式加以推翻的這一冒充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綱領的起草委員會也是贊成的。草案上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越是使無產階級的數量增加，無產階級也就越是不得不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這個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会主义有實現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意識就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必然的直接的結果。但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當然，社会主义作為一種學說，也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樣，是根源於現代經濟關係的，也同這種階級鬥爭一樣，是從反對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眾的貧窮和困苦的鬥爭中產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階級鬥爭是並列地產生的，而不是一個從另一個中產生出來，它們是在不同的前提下產生的。現代社会主义意識，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的確，現代的經濟科學，也像現代的技術（舉例來說）一樣，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條件，而無產階級不管它多么希望，終究不能創造出現代的經濟科學，也不能創造出現代的技術；這兩種東西都是從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着重號是卡·考·加的）；現代的社会主义學說也就是從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他們把这个學說傳給了才智出众的無產者，後者又在條件許可的地方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可見，社会主义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urwüchsig）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旧加因斐綱領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識無產階級地位及其任務的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直譯就是：充實無產階級）。假使這種意識會自然而然地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那就用不着這樣做了。新草案接受了舊綱領中的這個原理，而把它勉強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這樣，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們运动进程中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那末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間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

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一般說來，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着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人們談論什麼自发性，但工人運動的自发的發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Credo》綱領進行，因為自发的工人運動也就是工聯主義的運動，也就是純粹工會的運動，而工聯主義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奴役。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发趨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因此，“火星報”第12號上發表的那封“經濟主義者的”來信的作者們說什麼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終究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由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決定的道路，這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說的話大膽而透徹地思考到底，——而每個從事著作和社會活動的人都應當這樣來思考自己的思想，——那麼他們就會只有“把一隻沒有用的手束在空洞的胸口”，而……而讓司徒盧威和普羅柯波維奇之流的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線上去”，即拉到資產階級工聯主義路線上去，或是讓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牧師-憲兵

① 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一創造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身分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身分、以蒲魯東和翦特林一類人的身分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只有當他們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把它向前推進的時候，他們才能或多或少地參加這一創造工作。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盡量設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覺悟水平，使他們不要自限於被故意縮小了的“工人讀物”範圍內，而要學習多多理解一般讀物。更正確些說，不是“自限於”，而是被限於，因為工人自己是閱讀並且也願意去閱讀那些為知識分子寫的讀物的，而只是某些（惡劣的）知識分子，才認為“對於工人”只要講講有關工廠制度的情形，反覆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東西就够了。

“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决没有结束（虽然那些按普罗柯波维奇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按司徒卢威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也许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是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保皇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²⁹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它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断的斗争，才能保持住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所以某

①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它使自发性受它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

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越是年輕，也就必須越加積極地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越加堅決地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對“夸大自然成分”等等的惡劣的勸告者的話。經濟主義者的來信的作者們和“工人事業”雜誌異口同聲地攻擊運動在幼年時期所特有的那種不肯容忍的態度。我們回答說：不錯，我們的運動確實還处在幼年狀態，而為了趕快成長起來，它正應當感染上不肯容忍的精神，以對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的態度來阻礙運動發展的人。硬把自己裝成一個早已經歷過鬥爭中的一切重大變故的老頭子，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過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報”第1號向我們表明：“經濟主義”這個名稱（我們自然不想丟開這個名稱，因為這個稱呼畢竟已經用慣了）並沒有十分確切地表達新派別的實質。“工人思想報”並不完全否認政治鬥爭，因為在“工人思想報”第1號所刊載的那個工人儲金會章程中，就談到要與政府作鬥爭。不過“工人思想報”以為“政治始終是順從於經濟的”（“工人事業”雜誌則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這個論點，它在自己的綱領中說，“在俄國，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比其他國家更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政治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那末“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的這種說法便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說過，工人的經濟鬥爭往往是同資產階級、教權派等等的政治相聯繫的（雖然這種聯繫並不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政治是指工聯主義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想從國家那裡爭得某些可以減輕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是不能滅絕這種地位即

雜誌恰恰忘記和曲解了這個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階級自发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嚴厲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不消灭劳动受资本的支配地位的措施，那末“工人事业”杂志的說法便是对的。这个想法确实是敌視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义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政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見，“工人思想报”对于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說是否认政治斗争，不如說是崇拜这种斗争的自发性，崇拜这种斗争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虽然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說：工人的政治願望和政治要求），但是它完全不肯独立地制定特殊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即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現代俄国条件的政策。下面我們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錯誤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我們所以这样詳細地分析“工人思想报”第1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現在差不多已被遺忘了的社論，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現了后来以无数的小的支流涌現出来的那个总的潮流。弗·伊一申称赞“工人思想报”第1号及其社論，說它写得“很激烈，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頁），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見正确，自以为提出了一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鮮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因“工人思想报”的論敌具有“論战的斗志”而加以攻击。

我們現在不来讲“‘工人思想报’附刊”（我們以后談到各种問題时，还会来引用这一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經濟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談談“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轉載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夜”杂志³⁰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們很

公允地說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起来，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它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們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結論，而忘記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記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們跟着瓦·沃·先生說：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經濟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經濟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应当服从于它”。

至于說到“工人事业”杂志，那末它的活动是直接从“維护”經濟主义者开始的。“工人事业”杂志虽然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頁）上公然撒謊，說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①里警告經濟主义者时“所說的究竟是哪些年輕的同志”，但是在它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諾夫因这种謊話而进行激烈爭論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它“原是想用表示疑惑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較年輕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来反对这种不公正的責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責备經濟主义者眼光狭小）。其实，这个責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杂志清楚地知道这个責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編輯弗·伊一申的头上。我要順便指出：在上述爭論中，在解釋我所著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②这本小册子时，阿克雪里罗得說得完全正确，而“工人事业”杂志却說得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即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

① “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和策略問題”1898年日内瓦版，給“工人报”的兩封信寫于1897年。

②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79—302頁。——編者注

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直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杂志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书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因为我这本书上所发挥的观点已经在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①。

但是，“工人事业”杂志不仅为经济主义者“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的错误思想上去。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语义含糊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乃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大体上将决定联合会的文字工作的任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和性质。”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了解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了解：或者是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经济主义者就是这样了解的），或者是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工

① “工人事业”杂志除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之外，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于‘任务’一书的书评时起，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产生出或是颇为明确地显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任务’一书上所描绘的俄国运动的状况相比，要算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这是1900年间出版的“回答”上所说的话。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间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直到1899年之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初次发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抗议声（即反对《Credo》的抗议书）。而经济主义的产生却是1897年间的事，“工人事业”杂志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申早在1898年11月间（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已经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人运动还没有产生时可以使我們感到滿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和現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肯定地讲过任何新的任务，而始終都认为正是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們不必去清楚地認識和解决它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們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据说是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爭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 25 頁）。

我們暫且把“工人事业”杂志編輯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于第 7 期上的那篇重复了同样錯誤的論文，即标题为“俄国运动中的經濟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①撇开不談，而直接来談“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現在我們当然不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对“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提出的各个反駁意見。現在我們想談的只是“工人事业”杂志在第 10 期上所持的原則立場。我們也不去

① 例如，在这篇論文中，政治斗争中的“阶级論”或“畏縮迂迴”論是这样論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 1900 年 8 月写的！）“应当适合于各該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經濟斗争中所获得的經驗。政治鼓动能够而且应当仅仅（！）根据这种經驗去进行”等等（第 11 頁）。在第 4 頁上，作者反駁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說他們宣传經濟主义邪說的斥責，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試問哪一個社會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各个阶级的經濟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着重号是我們加的）这“所以”一詞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从經濟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该做出經濟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結論，因为一般說來，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 政治改造来滿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經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滿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議論（——政治服从于經濟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議論（例如伏尔特曼就企图用这种議論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經濟力量”，然后才可以想到政治革命）。

分析——举例來說——“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下面两个原理“絕對矛盾”的这种笑話。一个原理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計劃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現有力量……”（“火星报”第1号）①

另一个原理是：

“沒有一个善于在任何环境中和任何时期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組織，就談不到什么有条不紊的、具有坚定原則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計劃，而只有这样的計劃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②

原則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計劃和一切方法（只要它們是适当的）是一回事，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要求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計劃（如果想談策略的話）是另一回事；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談，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在医治一定的病症时要求采用一定的疗法这两件事混为一談。可是問題也就在于“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得了我們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願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得出了一个出色的发现，“計劃策略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頁），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第11頁；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后面这一句話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杂志“派別”的一座永垂不朽的紀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問題，领导性的机关刊物所給的答复是：运动是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間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极端深奥的議論并不只是一个笑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別来讲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32頁。——編者注

②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頁。——編者注

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綱領，爾·姆·曾經(在“‘工人思想报’附刊”上)把这个綱領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无止境的机会主义的派別。

“計劃策略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誣蔑馬克思主義，是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派在同我們作战时用来反对我們的那种諷刺画。这就是压制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給他們开辟最远大的前途，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的力量交給(假使可以这样說的話)他們指挥！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充滿着这些或那些政治領袖提出的各种計劃，它們证实了某些領袖所持的政治和組織观点的远見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些領袖的近視和政治錯誤。当德国遇到一个极大的历史轉变——建立帝国，成立国会，实行普选制——的时候，李卜克內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計劃，而施韦泽尔則提出了另一个計劃。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賽尔曼提出了一个計劃，打算直接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而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伯恩施坦則提出了另一个計劃，他們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說，是因为他們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他們現在应当作出一种模范行为来求得赦免；当时那些准备出版并且实际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則提出了第三个計劃。选择道路的問題所引起的斗争已經結束，历史对所选定那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經下过最后的判断，自那以后已經过去許多年了，而现在在回顾以往的时候，发表深奥的議論，說什么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

期①，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复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理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思想贫乏”。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巧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候，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杂志往下又这样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自己的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因为‘火星报’对于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意见，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编制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可能产生或巩固，也可能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末这些计划编制者的罪过就不在于轻视自发成分，相反地，却在于轻视自觉成分，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所必需

① 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 *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之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起初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计划策略”时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② 摘自“火星报”第1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81页。——编者注）

的“自觉性”。因此，单是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互相比較的（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意义的估計”这个說法，就已經暴露出完全沒有“自觉性”的事實。假如說某些“发展過程的自发成分”一般是人的意識所能覺察到的，那末对于这种自发成分的錯誤估計，就等于“輕視自觉成分”。假如說这种成分是人的意識所不能覺察到的，那我們既然不知道这种成分，也就无法談論这种成分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計劃”是錯誤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計劃是錯誤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實，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責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或者用他的說法：“輕視自觉成分”。假使他不滿意主观計劃，但是除了援引“輕視自发成分”（11）之外便沒有其他什么論據，那只是证明：（1）在理論上，他对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和备受別尔托夫³¹譏笑的卡列也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滿足于把我們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引誘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們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誘到經濟主义上去的那些“发展過程中的自发成分”，并且他“十分恼恨”那些无论如何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的”发展道路的人。

再往下面更是些十分滑稽的話了。“正好像人們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現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爆发的結果。”（第18頁）就像那句古老的格言，要生儿养女，誰沒有本事？——“現代社会主义者”（像納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³²所說的）的格言是，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出現，誰都有本事。我們也认为誰都有这种本事。为了这样来参与，只要在經濟主义流行时跟着經濟主义跑，在恐怖主义出現时跟着恐怖主义跑就行了。例如，在今年春天，当必須警告大家不要迷惑

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因为这个問題在它看来是个“新的”問題而感到困惑莫解。現在过了半年之后，当問題已經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們声明，說“我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并且不应当是阻撓恐怖主义情緒的高涨”（“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第 23 頁），同时又向我們提出代表大会的決議，說“代表大会认为有系統的进攻性的恐怖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 18 頁）。你看，这說得多么清楚，多么圓通！我們不去阻撓它，但我們却宣布說它不合时宜，并且我們这样宣布說，“決議”並沒有把无系統的和防御性的恐怖行动包括在內。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決議是完全可以避免危险并且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錯誤的，正如一个說了話是为的什么也不說的人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錯誤一样！为了拟訂这样一个決議，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工人事业”杂志把恐怖行动問題說成一个新問題而受到“火星报”的譏笑的时候^①，“工人事业”杂志怒气冲冲地責罵“火星报”，說“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十五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問題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組織，这簡直是太狂妄了”（第 24 頁）。的确，預先在理論上解决問題，然后設法說服各个組織、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你看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成分呵^②！如果只是旧調重弹，对誰也不“强加”以什么，对于每一次走向經濟主义或走向恐怖主义的“轉变”都唯命是从，那該多么好呀。“工人事业”杂志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訣作了概括，責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說它們“竟把自己的綱領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綱領当做翱翔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精神”（第 29

① 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5 卷第 5—6 頁。——編者注

② 同时还不要忘記，“劳动解放社”“在理論上”解决恐怖行动問題时，还总结了过去的革命运动的經驗。

頁)。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的“精神”嗎?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末好則对于运动无益,坏則对它非常有害。所謂“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过程策略”,而且把它奉为原則,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的这种倾向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詞)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了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它走的人,是永远和絕對不会“輕視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成分”的。

* * *

总之,我們已經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新派別”的基本錯誤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表現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論、政治和組織工作方面表現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非常迅速(而且現在仍是这样迅速地发展着),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們对于完成这些巨大任务却沒有准备。这种沒有准备的状况是我們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繼續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沒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識分子、甚至农民中間的风潮,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了)。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論”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沒有建立起一种連續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組織。

在第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工人事业”杂志貶低我們的理論任务而“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的事实,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缺乏“自觉性”,以致不能了解机会主义“批评派”的

立場和革命派的立場，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

在下面几章中，我們就要来考察一下这种崇拜自发性的态度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組織工作中的表現。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們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杂志开始吧。馬尔丁諾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上，发表了一篇論述与“火星报”的意見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見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們不能只限于揭露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們还应当对无产阶级的各种最近的日常的利益有所反应。”（第 63 頁）“……‘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 而我們現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馬尔丁諾夫說出这一段話來，我們不能不表示感謝。他这一段話具有重大的概括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們同“工人事业”杂志的意見分歧，而且概括了我們同“經濟主义者”在政治斗争問題上的一切意見分歧。我們已經指出过，“經濟主义者”并不絕對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馬尔丁諾夫也正是这样滑下去的，因此我們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經濟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的典型例子。我們往下就会证明，无论“‘工人思想报’附刊”的作者們，或“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們，或“火星报”第 12 号上所載的那封經濟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們，都是沒有理由因我們

选定馬尔丁諾夫而責备我們的。

(一) 政治鼓動以及經濟派 縮小政治鼓動的观点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經濟^① 斗爭的广泛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是和經濟方面的揭露（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揭露）“刊物”的創办工作同时并进的。“传单”的主要內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形，于是在工人中間很快地激起了从事这种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們一看見社会民主党人小組願意而且能够供給他們一种叙述他們的貧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况的新传单，就紛紛写起工厂通訊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既然各个企业和各种职业的工人們的貧困和痛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實話”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間，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一下”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的热情。这种“传单”在絕大多数場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工作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現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結果，厂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传单是一种宣战书，往往不願等待战争本身的到来。这种揭露性刊物，照例是一經出現就成为强有力的东西，发生

① 为了避免誤会，我們要說明一下，在以后的叙述中，所謂經濟斗争（按我們所習慣的用詞法）全都是指“实际的經濟斗争”而言，在上面所举的引证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資本家的反抗”，而各自由国家里的人們則称它为工会的、工团主义的或工联主义的斗争。

强大的精神压力。往往只要有传单出現，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滿足。总之，經濟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現在都是經濟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必然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資本主义还存在，这种揭露工作是始終会保持这种意义的。現在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也还可以看見这样的情形，就是对于某一个偏僻的“行业”里或某一个落后的家庭手工业部門里种种丑恶現象的揭露，可以成为喚起阶级觉悟、使工会斗争开始进行和社会主义开始传播的起点^①。

近来，絕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种組織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們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記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 某一个职业 的工人同老板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績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純粹商业契約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組織适当地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

① 我們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 政治 斗爭，較广义的或較狹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們只順便指出，“工人事业”杂志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諱”經濟斗争，这不过是一个笑柄而已（“两个代表大会”第 27 頁；馬尔丁諾夫在他所寫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冊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假使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們把一年來“火星报”上的經濟斗争栏的篇幅用普特或印张（这是他們所愛用的方法）計算一下，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杂志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經濟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較一下，那他們馬上就会看到，他們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大概，他們正因为感觉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而提出了一些显然是表明他們自己的惶惑不安的論据。他們写道：“‘火星报’不管願意不願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載一些叙述工人运动情形的通訊。”（“两个代表大会”第 27 頁）这真是一个把我們駁得体无完肤的論据！

条件下則一定会)产生“純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爭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給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由此可見，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經濟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許把組織經濟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們的主要活动。我們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識。現在，当“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向經濟主义作了第一次攻击之后，这一点已經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們在下面就会看見，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試問，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內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說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像只是向工人說明他們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須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現来进行鼓动(正像我們已經开始利用經濟压迫的具体表現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現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們如果不担负起組織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們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識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見的嗎？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現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現揭露出来嗎(也像为了进行經濟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現象揭露出来一样)？

看來，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須全面发展政治意識。正是在这里我們可以看

到，例如“工人事业”杂志就不仅沒有負起組織（或是提倡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的任务，反而把已經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請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經濟斗争形式”（“工人事业”杂志的綱領；“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第3頁）。“現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馬尔丁諾夫，“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頁）。“經濟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決議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頁和第17頁）。讀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論調，从“工人事业”杂志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編輯部的通知”为止，始終都貫彻在“工人事业”杂志中，并且这些論調显然都表現着对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同一个观点。你們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經濟鼓动这个流行于一切經濟主义者中間的意見來仔細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說經濟斗争一般讲来^①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不是正确呢？完全不正确。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現，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經濟斗争相联系的表現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橫行不法，农民遭受体刑，官吏貪污受贿，警察欺侮城市的“老百姓”，同饥民作斗争，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識的願望，勒索賦稅，迫害异教徒，虐待兵士，侮辱学生

① 我們所以說“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則和一般任务。固然，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經濟，但是只有經濟主义者才会在准备应用于全俄各地的決議中說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只有在經濟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形，但“工人事业”杂志終于已經明白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頁）。我們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証这种任务彻底实现。

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諸如此类的不同“經濟”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較不“普遍适用的”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緣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苦于（他們自己或者同他們亲近的人）沒有权利，苦于遭受专横和强暴压迫的所有的实际事例中，工会斗争中遭到警察压迫的事例显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試問为什么要預先缩小 政治鼓动的規模，只把 一种 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采用其他一般讲来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杂志曾經写道：“經過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經過几次罢工以后”，“当政府一出动警察和宪兵的时候”，“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 年 8 月第 7 期第 15 頁）現在联合会已經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論推翻而向我們表示让步，說“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 就只有在經濟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 11 頁）。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看看“联合会”这样否认它那一部分旧的錯誤見解的事实，就能比根据任何长篇議論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經濟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糟蹋到怎样的地步了！联合会該是多么的幼稚，竟以为这样抛弃它的一种縮小政治范围的議論就能促使我們去贊同它的另一种縮小政治范围的議論！如果在这里也說經濟斗争必須尽量广泛地进行，要始終利用經濟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經濟斗争是最普遍适用的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手段，这岂不是更合邏輯一些嗎？

联合会以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說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決議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說法

是有意义的。我們实在很难說这两个決議中究竟哪一個好些，照我們看來，兩個都很糟糕。無論聯合會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不自觉地，只是由於受了傳統的影響）經濟主義即工聯主義的政治觀上去了。至於這裡用的字眼是“最好的”，還是“最普遍適用的”，實質上是毫無差別的。假使聯合會說“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是最普遍採用的（而不是“適用的”）手段，那末這對於我們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的一定時期來說，就會是正確的。也就是對於經濟主義者，對於1898—1901年間的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來說，是正確的，因為的確這些做實際工作的經濟主義者几乎仅仅是在經濟基础上採用了（是說他們一般地採用了！）政治鼓動。我們已經說過，“工人思想報”和“自我解放社”也是承認並且介紹過這種政治鼓動的！“工人事業”雜誌本來應當堅決斥責在進行經濟鼓動這種有益的事情時縮小政治鬥爭範圍的有害行為，但它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把最普遍採用的（經濟主義者採用的）手段稱為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無怪乎當我們把這班人稱為經濟主義者的時候，他們也就只好大罵我們是什麼“捏造者”、“搗亂者”、“聖使”、“誹謗者”^①等等；只好向大家哭訴，說這使他們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發誓賭咒的口吻聲明說：“現在根本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犯有經濟主義的錯誤”^②。啊，這些誹謗者，這些凶惡的人，政治派！整個經濟主義不是他們仅仅由於有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來，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嗎？

馬爾丁諾夫向社會民主黨提出“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這究竟有什么具體的切實的意義呢？經濟鬥爭是工人

① 這是“兩個代表大會”小冊子的原話；該小冊子第31、32、28、30頁。

② “兩個代表大會”第32頁。

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通过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頁即第43頁上所說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着“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見，所謂“赋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話，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倾向！他們表面上是說要糾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說“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①，而实际上却把为经济改良的斗争当做一种新的东西来款待我們。其实，“赋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不过是意味着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自己仔细分析一下他所說的那些話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

① 見“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60頁。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們在上面已經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重要”这一論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來。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說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有名的話翻譯成俄文罢了。

个简单的結論。馬尔丁諾夫拖出了他的一門最重的大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說：“我們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經濟剥削，消除失业現象，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43頁）具体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嗎？我們現在要再一次問問沒有偏見的讀者：当工人事业派（想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詞！）提出必須爭取經濟改良这个論点来表明他們同“火星报”的意見分歧的时候，我們称他們为暗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这是不是誣蔑了他們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現在都把爭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經濟”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經濟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現象來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爭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爭取自由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馬尔丁諾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論复活起来，硬要使政治斗争一定按所謂經濟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爭取改良的所謂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經濟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馬尔丁諾夫羞羞答答地用“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論点来掩飾爭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經濟方面的（甚至仅仅是工厂方面的）改良当做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方面的”改良，那末我們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論点就会毫无意思了。也許是由于他以为政府只是在經

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体上会实行“让步”吧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謬見了，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問題的立法方面，也可能作并且确实作过让步的。“經濟方面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在政府看来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們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发生这样一种誤解），以为我們是把經濟改良看得更有价值，以为我們正是把这种改良当做特別重要的东西看待等等。馬尔丁諾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說道：“这种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話，因为这种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結果，就能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們可不是經濟主义者！我們不过是像伯恩施坦先生、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尔·姆·先生以及 tutti quanti②一样奴隶般地崇拜那些具体結果的“显著性”而已！我們不过是（同納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說，所有不“能产生显著結果”的东西都是一种“空話”！我們不过是要大家知道仿佛工人群众不能够（仿佛工人群众——不管人們怎样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加到他們头上——并没有已經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绝对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結果的反抗！

就拿馬尔丁諾夫本人所援引的那些关于消除失业和消除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來說吧。“工人事业”杂志致力于——根据它自己的諾言来看——拟制和詳細制定“能产生显著結果”的“立法

① 第 43 頁上說道：“自然，我們之所以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种經濟要求，是因为在經濟方面，专制政府由于必要而願意作某些让步。”

② 諸如此类的人。——編者注

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以法案的形式嗎？）要求”，而“火星报”却“始終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极力說明失业現象与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的联系，警告大家說“饥荒已經发生”，揭露警察“同饥民作斗争”的行为和可恶的“暫行苦役条例”；同时“曙光”杂志又把論述饥荒問題的一部分“內政評論”^①印成了单行本的鼓动小册子。可是，天哪，这班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統主义者，这班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熟視无睹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呵！他們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沒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的的确确是沒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結果”的“具体要求”！这班教条主义者是多么可怜呵！应当叫他們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馬尔丁諾夫之流那里去領教領教，好讓他們懂得策略是同什么一起发展的什么什么增长的过程，好讓他們懂得必須賦予經濟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

“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对政府作 經濟 斗爭”！），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經常感到他們沒有政治权利这个問題。”（馬尔丁諾夫，第 44 頁）我們把这段話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說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來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馬尔丁諾夫特別表示感謝，因为他发明了所謂“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样一个新鮮而出色的公式。說得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天才，极其巧妙地抹掉了各經濟主义者間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細微的差別，而用简单明了的話表明了經濟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維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②，接着是大談阶段論，最后是在代表大会決議上說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对政府

① 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 223—241 頁。——編者注

② “工人思想报”，“附刊”第 14 頁。

作經濟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二)馬尔丁諾夫究竟怎样加深了 普列汉諾夫的意見

有一位同志說，“近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真是出現了不少羅蒙諾索夫！”他指的是，許多傾心于經濟主義的人都有一種十分奇怪的傾向，總想“凭自己的头脑”發現一些伟大的真理（例如說經濟斗争將使工人碰到無權問題），同時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態度鄙棄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運動發展過程已經提供的一切。馬尔丁諾夫就是這樣的一位天生的羅蒙諾索夫。你們只要瞧瞧他所寫的“當前問題”一文，就能看出他在怎樣“凭自己的头脑”研究那早已經由阿克雪里羅得說過了的東西（關於阿克雪里羅得這個人的名字，我們的羅蒙諾索夫當然是完全保持緘默的），就能看出例如他已經在開始了解我們決不能忽視資產階級中某些階層的反政府態度這種道理（“工人事業”雜誌第9期第61、62、71頁；並參看“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對阿克雪里羅得的“回答”，該雜誌第22、23—24頁）等等。但可惜只是“在研究”和只是“在開始”，僅僅如此而已，因為他畢竟還根本沒有了解阿克雪里羅得的意思，所以他還在說什麼“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在三年之久的時間內（1898—1901年），“工人事業”雜誌一直在努力了解阿克雪里羅得的意思，然而——然而畢竟還是沒有了解這種意思！也許這也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也像整个人類一樣”始終都是只向自己提出能夠實現的任務吧？

但是羅蒙諾索夫之流的特色，不僅表現在他們對於許多東西都不知道（如果只是這樣，那不過是一種小不幸），並且還表現在

他們不認識自己的无知。这才是一种大不幸，正是这种大不幸促使他們馬上就來着手“加深”普列汉諾夫的意見。

罗蒙諾索夫-馬尔丁諾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諾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以后，已經过去許多时候了。社会民主人在十年中間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經濟斗争，但是他們……還沒能給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論基础。現在这个問題已經成熟了。我們如果願意奠定这样的理論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加深普列汉諾夫曾經闡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則…… 我們現在对于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应当作出一个与普列汉諾夫所作的不同的定义”（馬尔丁諾夫在前面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諾夫的話：“宣传員給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許多观念，而鼓動員却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給一大群人”）。“我們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精神來說明整个現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現，——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是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那是沒有什么关系的。所謂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們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預。”

我們真应当为俄国的，而且为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了馬尔丁諾夫所发明的这一套更严格更深奥的新名詞庆賀。直到現在，我們（同普列汉諾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領袖們一起）都认为：宣传員譬如讲到失业問題的时候，就应当解释危机的資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为什么在現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說明必須把現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許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領会，完全領会。而鼓動員讲到这个問題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的最显著的例子，譬如举出某某失业工人的家属餓死，貧困加深等等事实，并竭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即富者越富和貧者越貧的这种矛盾是多么不合理，并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現象的不滿和憤恨，而把全面地說明这种矛

盾的工作留給宣傳員去做。因此，宣傳員的活動主要是文字的，鼓動員的活動則主要是口頭的。宣傳員應當具備的素質是和鼓動員不同的。例如，我們稱考茨基和拉法格為宣傳家，而稱倍倍爾和蓋得為鼓動家。想在實際活動中分出第三個方面或者第三種職能，並把“號召群眾去作某種具體行動”歸入這種職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為要是把“號召”看做單一的行為，那它不是理論著作、宣傳書籍和鼓動演說的自然和必然的補充，便是一種純粹執行性的職能。例如，拿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谷物稅的鬥爭來說吧。譬如說，理論家在論关税政策問題的著作中“號召”群眾為貿易條約、為貿易自由而鬥爭；宣傳員在雜志上也是這樣做，鼓動員在公開演說中也是這樣做。這時群眾的“具體行動”就是共同簽名向國會提出請願書，要求不增加谷物稅。這些行動的號召間接是出自理論家、宣傳員和鼓動員，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簽名簿分送到各個工廠和各個住宅中去的工人。照“馬爾丁諾夫式的名詞”來講，豈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爾兩人都稱為宣傳員，而把分送簽名簿的人稱為鼓動員嗎？

說到德國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個德國字：Verballhornung。這個字直譯出來就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伊萬·巴耳霍恩是十六世紀萊比錫城里的一个出版家。他出版了一本識字課本，並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張畫有雄雞的插圖，不過他並不像通常那樣畫一只腳上有距的雄雞，却畫了一只腳上無距的雄雞，旁邊還放了兩個雞蛋。課本封面上寫了一行字：“伊萬·巴耳霍恩的修正版”。從那時起，德國人講到實際上是把東西改壞了的那種“修正”時，就說這是 Verballhornung。所以當我們看到馬爾丁諾夫之流“加深”普列漢諾夫的意見時，我們就不由地想起巴耳霍恩的故事來……

为什么我們的罗蒙諾索夫“发明了”这种糊塗观念呢？他是为了說明：“火星报”“也像普列汉諾夫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 39 頁）。“‘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过于偏重了宣传任务而忽視了鼓动任务”（第 52 頁）。假使我們把后面这个論点，从馬尔丁諾夫式的語言譯成普通人的語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采用这种新发明的名詞），那就是說“火星报”过于偏重了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視了“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結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即社会改良的要求，——假使还可以把还没有发展到馬尔丁諾夫那种程度的旧人类的旧名詞再使用一次的話）的这个任务。請讀者把这个論点同下面的一段議論对照对照吧！

“这些綱領”（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領）“还有使我們吃惊的地方，就是他們始終都偏重工人在議会（我国現时所沒有的議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略（由于他們怀有革命虛无主义态度）工人参加我国現有的工厂主厂务立法會議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議論的作者是把罗蒙諾索夫-馬尔丁諾夫凭自己的头脑所想到了的那个思想說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一些了。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附刊”（第 15 頁）上的那位尔·姆·。

（三）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馬尔丁諾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論”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經濟主义者所崇拜的那种經濟斗争称为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別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称为表現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錯誤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馬尔丁諾夫一个人特有的本色。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

們不以“建立在經濟基础上的政治鼓動”为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動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識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种工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絲毫不會取消这种揭露工作，而只会稍微把这种工作的方向改变一下。例如，德国党正因为它毫不松懈地努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是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現象有所反应（并且是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識的。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代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現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計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現时，工人群众的意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識的。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觀察力和意識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認識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論上的……更确切些說：与其說是理論上的，不如說是根据政治生活經驗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認識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們的經濟主义者所謂經濟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按其实际意义來說，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識地主和牧师、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經濟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們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飾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

行詞句和各种詭辯，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認識”无论从哪一本子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只有把現在在我們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談論着或者只是私下談論着的，表現于某些事件、某些数目字、某些法庭判决詞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們获得这种認識。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虐待人民，对于迫害异教徒和鞭笞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拷打兵士，摧残各种最平常的文化事业等等現象，还很少表現出自己的革命的积极态度呢？是不是因为“經濟鬥爭”沒有使他們“感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對他們很少“能产生”“显著結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們再說一遍：这种意見不过是想嫁禍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加到工人群众头上罢了。我們应当責备我們自己，責備我們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責備我們還沒能組織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地揭露这一切可恶現象的工作。假使我們已經进行了这种工作（我們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連最平凡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欺压学生和异教徒的，欺压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躪和压迫他們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願意而且十分願意对这一切有所表示，就会今天辱罵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騷乱的省长門前举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对异教徒橫加摧殘的身穿袈裟的宪兵，如此等等。我們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沒有——把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新的罪状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还没有認識自己应尽的这个責任，而是自发地尾随在那种单以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为限的“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說什么

“‘火星报’有輕視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輝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馬尔丁諾夫, 第 61 頁), 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 就等于为我們的缺乏修养和落后的状况辩护, 并且加以赞美。

至于說号召群众行动起来, 那末只要我們积极进行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鮮明的揭露, 就自然会发生这种号召的作用。当場抓住罪犯, 在各地立刻当众加以譴責——这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 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 究竟是誰“号召了”群众, 究竟是誰提出了某种示威計劃等等。要号召, ——不是說什么一般号召, 而是說具体号召, ——就只有就地来做, 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們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政論家的任务, 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我們就來談談“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 号召工人对当局判处大学生当兵这个对工人來說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結果的問題积极加以干預的唯一机关报, 就是“火星报”。在 1 月 11 日“派 183 个大学生去当兵”这个命令一公布之后, “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論述这件事情的文章 (2 月第 2 号)^①, 而且它在任何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 就已經直接号召“工人去帮助大学生”, 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战行为。我們要問問大家: 馬尔丁諾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 甚至把“号召”看做一种特別的活动方式, 但他对于我們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一个字都沒有提到, ——这件出色的事应当怎样來解释呢? 既然如此, 那末馬尔丁諾夫宣称“火星报”片面, 說它沒有充分“号召”大家去爭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結果”的要求, 这难道不是一种充满庸俗味道的說法嗎?

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包括“工人事业”杂志在內——所以受

^① 見“列寧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371—375 頁。——譯者注

到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落后工人的心。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忽然排斥所有这些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等等的議論，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对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的那些建議人說：先生們，你們真是白忙，你們拚命来干預我們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同时却逃避你們自己的真正的責任。你們說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說得太不聪明了，要知道这只是一种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經濟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誰的一边的^①。要知道，你們当做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現在在俄国的許多穷乡僻壤都正由那些听見过罢工而几乎絲毫沒有听見过社会主义的工人們自己进行着。要知道，你們总想以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結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維持的工人“积极性”，我們工人已經具备了，并且我們自己在我們日常的、职业的、細小的工作中，往往是絲毫不需要知識分子的帮助就能提出这种具体要求的。但我們不能以这样的积

① “赋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发性的崇拜。經濟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无須“知識分子这种革命細菌”的干預，无須自觉的社會民主党人的干預。例如，英國工人的經濟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經過社会主义者的参与的。社會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是要进行建立在經濟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而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會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經濟斗争給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識，把工人提高到社會民主主义政治意識的高度。而馬尔丁諾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識，反而崇拜自发性，唠叨說，——老是令人作嘔地唠叨說，經濟斗争使工人“感到”他們毫无政治权利的問題。先生們，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識的这种自发产生却没有使你們“感到”你們的社會民主主义任务的問題！

极性为滿足；我們并不是一些单靠“經濟主义”政治的稀飯就能喂飽的小孩子；我們想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我們想仔細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件。为了这一点，就要知識分子們少讲些我們自己也知道的东西^①，而多給我們些我們还不知道，并且是我們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經驗和“經濟方面的”經驗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識。这种知識是你們知識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們应当比过去多千百倍地把这种知識供給我們，并且你們供給我們这种知識的方式也不要仅以議論、小冊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們說句老實話！——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統治阶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干的勾当都具体地揭露出来。請你們多多努力来履行你們的这个責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話吧。我們的积极性要比你們所想像的高得多，我們善于用公开的街头斗争來支持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結果”的要求！你們沒有資格來

① 工人对經濟主义者說的这番話，决不是我們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們可以举出两个見证人，他們显然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絕對不想袒护我們“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見证人是經濟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杂志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見证人是恐怖主义者。前一个見证人在“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眞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部分：（1）自觉的革命家，（2）中間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間阶层“对于政治生活問題往往要比对于最近的經濟利益更有兴趣，因为这种經濟利益与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了解了……”“大家都很厉害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說，“你們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讀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評論栏里也是半点东西也沒有”（第30—31頁）。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較为敏感、較为年轻、受酒館和教会腐化影响較少的工人群众，虽然差不多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談政治生活中的現象，思索学生騷亂的片断消息”等等。而恐怖主义者則写道：“……把本城以外各地工厂生活中的瑣聞瀏覽一两遍，便停止不看了…… 枯燥无味…… 在工人的報紙上不談國家問題……就等于把工人当做小孩子看待…… 工人并不是小孩子。”（“自由”杂志，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版第69頁和第70頁）

給我們“提高”积极性，因為你們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們，請你們還是少崇拜點自发性，而多想點办法來提高你們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 經濟主義和恐怖主義有什么共同之點？

在上面的附註中，我們已經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個經濟主義者和一個非社會民主黨人恐怖主義者作了對照。不過，一般講來，這兩種人之間是有一種並非偶而是必然的內在聯繫的。關於這種聯繫，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並且在談到培養革命積極性的問題時還必須講到這一點。經濟主義者和現代恐怖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這就是崇拜自发性。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一章里已經把它當做一般的現象講過，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它對於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的影響。初看起來，我們的斷語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種人強調“日常的平凡的鬥爭”，另一種人號召作單個人的自我犧牲的鬥爭，其間的差別是多麼大呵。但是我們的斷語並不是不近情理的。經濟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個極端，經濟主義者崇拜自发的“純粹工人運動”，而恐怖主義者崇拜那些不善於或者沒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個整體的知識分子的自发的激憤。凡是不再相信或者從來不相信這種可能性的人，除了採取恐怖手段之外，確實是難以找到別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憤激情緒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見，以上兩種對於自发性的崇拜，都無非是在開始實現著名的《Credo》綱領：讓工人們去“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請《Credo》的作者原諒我們用馬爾丁諾夫的話來表达他的意思吧！我們以為我們有理由這樣做，因為在《Credo》中也說到工人在經濟鬥爭中“感到政治壓迫制度”），而讓知識分子們独自去進行政治鬥爭，——當然是用恐怖手段去進行

这个斗争！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邏輯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結論，虽然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綱領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識到这个結論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邏輯，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願望。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用善良的願望鋪成的，而在我們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願望也无法挽救人們免于自发地滾到“阻力最少的路線”上去，滾到《Credo》这种純粹资产阶级綱領的路线上去。而俄国許多自由派分子，无论公开的自由派分子或戴着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分子，都十分同情恐怖手段，极力贊助目前恐怖主义情緒的高涨，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产生，——它正是以从各方面帮助工人运动为己任，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綱領中，并且力求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束縛的，——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見，他还在1897年末就确切地預見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結果（“論当前任务和策略問題”），并且草拟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后来发生的一切爭論和意見分歧，都已經包含在这两个前途^①中，就像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① 馬尔丁諾夫“认为有更現實的（？）另外两个前途”（“社會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頁），“或者是社會民主党負起責任来直接領導无产阶级的經濟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轉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謂“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經濟斗争。請馬尔丁諾夫告訴我們，什么地方見过只是领导职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轉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有没有想到：要达到这种“轉变”，我們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政治鼓动呢？……“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會民主党規避领导工人經濟斗争的責任，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杂志的意思，“火星报”就是“規避”领导經濟斗争的責任的。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經濟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杂志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以此为借口来缩小自己的政治任务。

从上述的观点看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工人事业”杂志既沒有抵擋住經濟主义自发性的影响，也沒有抵擋住恐怖主义自发性的影响。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別論据拿來談談，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 64 頁），但是它注重这种手段的“激发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是表明那种驅使他們拘守恐怖手段的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与衰落的阶段之一。承认現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綱領規定的活动范围。第二，它所以值得注意，更因为这是不了解我們在“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方面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的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的手段，即对工人运动給予“强大推动”的手段。这种論据的自相矛盾，真是再明显不过了！难道在俄国生活中还缺少足以激发人心的丑恶現象，因而还需要虛构出一种特殊的“激发”手段来嗎？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連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沒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末他对于政府与一小群恐怖主义者的单独决斗也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嗎？問題是工人群众已經因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可恶現象而十分激动起来，但我們却不善于把人民的义憤的一切水滴和細流汇集——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話——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細流是被俄国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比我們所想像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我們正应当把它們汇集而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 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

切的責任，即組織全面的政治鼓動工作的責任。“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來代替鼓動，而公開承認：“當開始在群眾中進行強有力的鼓動工作時，恐怖手段的激發作用就完結了。”（“革命主義的復活”第68頁）這正是說明，無論恐怖主義者或經濟主義者都不顧春季事件^①的明證，還是輕視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前者拚命去找人的“激發手段”，後者則高談所謂“具體要求”。兩者都沒有充分注意發展自己在進行政治鼓動和組織政治揭露方面的積極性。而這種工作，無論現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別的什么东西來代替的。

（五）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战士

我們已經看到，進行最廣泛的政治鼓動，因而也就是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這是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活動中絕對必要的和極其迫切必要的任務。但我們做出這個結論，是單從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知識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這方面出發的。然而只是這樣提出問題，就未免過于狹隘，就會是忽略一切社會民主黨特別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民主任務了。為了盡量具體地說明這個原理，我們就從經濟主義者感到最“切近的”方面，即從實踐方面來談這個問題。關於必須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這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但請問怎樣來做到這一點呢？為了做到這一點需要什么呢？經濟鬥爭只能使工人“感到”政府同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因此我們無論怎樣努力來解決“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也永遠不能在這個任務範圍內把工人的政治意識發展起來（發展到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意識的程度），因為這個範圍本身就是

① 指1901年春季開始的大規模的街頭示威。（這是作者為1907年版加的注釋。——編者注）

很狹隘的。我們所以認為馬爾丁諾夫的公式很有價值，決不是因為它表明馬爾丁諾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經濟主義者的基本錯誤觀點，即認為從所謂工人經濟鬥爭內部，即僅僅（或哪怕主要是）從經濟鬥爭出發，僅僅（或哪怕主要是）根據經濟鬥爭，便可以發展工人的階級政治意識。這種見解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因為經濟主義者怕恨我們同他們進行論戰，竟不願仔細想一想意見分歧的來源，結果就弄得我們簡直是各講各的話，彼此無法理解。

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從一切階級和階層同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從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方面，才能汲取到這種知識。所以我們對於為了給工人灌輸政治知識應當怎麼辦這個問題，決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實際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傾向於經濟主義的實際工作者——滿意的那種回答，即所謂“到工人中去”。社會民主黨人為了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就應當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應當把自己的隊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們故意選定這樣一個生硬的說法，故意說得這樣簡單激烈，並不是因為我們想說些新奇的話，而是想使經濟主義者好好“感到”他們不可饒恕地加以輕視的任務，感到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即他們所不願了解的那種區別。所以，我們請讀者不要着急，仔細地把我們的話听完。

就拿近年來最盛行的那種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為例來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這種小組因為“與工人有聯繫”而心滿意足，只是印發傳單來抨擊工廠中的黑暗現象，抨擊政府對資本家的袒護行為和警察的暴行；在會議上與工人進行談話時，也往往不越出或者几

乎不越出这一类題目的范围；而关于革命运动史，关于我国政府对內对外政策問題，关于俄国和欧洲的經濟进化問題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問題的报告和談話則极少举行；关于在社会上其他阶级中有系統地取得和扩大联系的問題，誰也沒有想到过。实际上，这种小組組員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聯書記，而不像是社会主义者——政治領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聯書記，例如英國工聯書記，都經常帮助工人进行經濟斗争，組織对工厂的揭露，說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布置糾察队（目的是告訴大家該厂工人已經罢工）的自由的各种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說明那些属于資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而言之，每个工聯的書記都进行和帮助进行“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因此，我們应当始終坚持說：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社會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聯会的書記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現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現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們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現象綜合成为一幅警察橫暴和資本主义剝削的图画；他們要善于利用一切瑣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們可以把罗伯特·奈特（他是英國一个最强大的工聯——鍋炉工人联合会的著名的書記和領袖）和威廉·李卜克內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較一下，可以試把馬尔丁諾夫用來形容自己与“火星报”的意見分歧的那些对比的詞句应用到他們身上去。你們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馬尔丁諾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第39頁），而威·李卜克內西則多半是从事于“用革命精神來說明整个現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現”（第38—39頁）；罗·奈特“規定了无产阶级的最近的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

求的手段”（第 41 頁），而威·李卜克內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没有拒絕“同时領導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們指出积极的行动綱領”^①（第 41 頁）；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 42 頁），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結果的具体要求”（第 43 頁），而威·李卜克內西則多半注意于“片面的”“揭露”（第 40 頁）；罗·奈特偏重于“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第 61 頁），而威·李卜克內西則偏重于“宣传光輝的完备的思想”（第 61 頁）；威·李卜克內西把自己所領導的報紙变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 63 頁），而罗·奈特則“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 63 頁）——而这里所謂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們上面已在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那里看到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同时，当然也和馬尔丁諾夫一样，相信他“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 63 頁）。总之，你們会看到，*de facto*^② 馬尔丁諾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虽然他这样做当然决不是因为他不想使社会民主党得到益处，而只是因为他沒有认真地去了解普列汉諾夫的意見，却有些急于去加深普列汉諾夫的意見。

讓我們言归正传吧。我們上面已經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須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識，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問題：要怎样

① 例如李卜克內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 行动綱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时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② 实际上，其实。——編者注

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們有沒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沒有在其他一切階級中進行這種工作的基礎呢？這是不是放棄或者導向放棄階級觀點呢？現在我們來談談這些問題。

我們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又以鼓動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工作應當研究各個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點，這是誰也不懷疑的。但是這方面的工作還做得很少很少，與研究工廠生活特點的工作相比，這方面的工作未免太不相稱了。在各個委員會和小組中有些人甚至埋頭于專門了解某一煉鐵生產部門的情況的工作，但是在參加這些組織的（往往是因为某種關係而不得不脫離實際工作的）人們中間，對於我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種迫切問題（這種問題使社會民主黨人有機會到其他居民階層中去進行工作）的材料，却几乎沒有人去專門收集。當我們說到現在大多數工人運動領袖缺乏修養時，我們也不能不提到這方面的修養問題，因為這也是同“與無產階級鬥爭保持密切的有機聯繫”的“經濟主義”見解相聯繫的。但主要的任務當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階層中間進行宣傳鼓動。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容易執行這種任務，因為那裡有各種群眾集會，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那裡有議會，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利用它在一切階級的代表面前講話。我國既沒有什麼議會，又沒有什麼集會自由，——但我們還是善于把那些願意聽社會民主黨人講話的工人召集來開會。我們也應當善于把一切階級中間凡是願意聽民主主義者講話的人都召集來開會。因為誰在實際上忘記“共產黨人應當贊助一切革命運動”，忘記我們因此也就應當向全體人民說明和強調一般民主任務，而一分鐘也不隱瞞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誰忘記這一點，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誰在實際上忘記社會民主黨人在提出、

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問題方面，自己有責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沒有耐性的讀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給“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的新的指示，也直接說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有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特別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爭自由的革命勢力的先鋒队的現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動。”（“两个代表大会”第17頁；着重号是我們加的）是的，这些話是說得很正确而且說得很好的；假使“工人事业”杂志懂得它这些話的意思，假使它不是在說这些話时又說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話，那我們就会很滿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鋒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們确实是走在前面。所以，我們要問問讀者：难道其余各个“部队”中的人物都是些傻瓜，居然是单凭我們空口說白話就会相信我們是“先鋒队”嗎？不妨具体設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說道：我們是先鋒队；“現在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末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間有头脑的人是不少的）听了這話，只会微微一笑說道（当然只是在心里这样想，因为他們往往是有經驗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鋒队’可真是个傻瓜！他甚至不了解，賦予工人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們的任务，是資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們也像西欧各国的資产者一样想把工人卷入政治，不过我們要把工人卷入的乃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資产阶级政治。而这个

‘先鋒隊’，對於工人階級任務的說法也就是工聯主義政治的說法！因此，就讓他們隨心所欲地，甚至把自己叫做社會民主黨人吧。我又不是小孩子，決不會為了招牌問題吵鬧起來的！只要他們不受那班可惡的正統數條主義者的誘惑，只要他們能給那些不自觉地把社會民主黨拖到工聯主義軌道上去的人們留下‘批評自由’就行了！”

我們的這位立憲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談社會民主黨先鋒隊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我們的運動幾乎完全由自发性獨占統治的今天還最害怕“輕視自发成分”，最害怕“輕視平凡的日常的鬥爭進程而偏重於宣傳光輝的完备的思想的傾向”等等，他就會由微笑變為哈哈大笑了！一個“先進的”部隊居然害怕自觉性超過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個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一致贊佩的大膽的“計劃”！看來，他們也許是把先鋒隊和後衛隊這兩個詞搞混了吧？

例如，你們考慮一下馬爾丁諾夫的下面這段議論吧。他在第40頁上說，“火星報”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們怎樣散布不信任和仇恨政府的種子，但如果不能發展充分積極的社會力量來推翻它，我們便不能達到目的”。我們要順便指出，這還是那一套關心提高群眾的積極性而同時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積極性的老調。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馬爾丁諾夫這裡當然是指革命力量（“來推翻”政府的力量）而言。但他所得出的結論又是怎樣的呢？既然在平常的時候，各社會階層一定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當然不能同時領導各个反政府階層的積極行動，不能向他們指出積極的行動綱領，不能替他們指明應當用哪種方法來經常為本身的利益而鬥爭…… 自由主義階層自己會設法為自己的最近利益而進行積極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就會使他們直接感到我國的政治壓迫制度”（第41頁）。由此可見，馬爾丁諾夫開始是說革

命力量，說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他馬上就偏到一边去了，而談起什么工会的力量，什么为最近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来了！我們当然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为他們的“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但可敬的經濟主义者，我們所說的并不是这个問題！我們所說的是各种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然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問題；而“各个反政府阶层的”这种“积极行动”，我們不仅 可以 領導并且一定要領導，如果我們想做“先鋒队”的話。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直接感到我国的政治压迫制度”，那末不仅他們自己会設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和专制政府的官吏自己就会首先最努力地做到这一点。而“我們”——如果我們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話——則应当設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現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局現状等等表示不滿的人們感到全部政治制度的不中用。我們 应当負責組織这种在我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們 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領袖，他們善于領導这种全面的斗争的一切表現，善于在必要时向憤激的学生、不滿意的地方自治派，忿忿不平的异议徒和受侮辱的国民教師以及其他各种人“指出积极的行动綱領”。所以馬尔丁諾夫所說的“对于这些人，我們只能尽一种揭露現存制度的消极作用…… 我們只能打破他們对于各种政府專門委員会的种种希望”（着重号是我們加的），是完全不正确的。馬尔丁諾夫这样說，就证明他 簡直完全不懂得 革命“先鋒队”的真正作用。讀者注意到这一点，就会懂得馬尔丁諾夫所說的下面几句結束語的 真正含义 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們現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

爭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們縮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 63 頁）这个結論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們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誤解以及缺乏修养，或者是由于信念而往往以这种政治为限）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杂志則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場”（第 63 頁）。
O, sancta simplicitas! ①

我們再讲下去吧。我們有沒有力量把自己的宣传鼓动推广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呢？当然是有的。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們的运动从 1894 年（大致說來）到 1901 年間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們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刚才开始的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們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决定只在工人中間进行工作而严厉斥責离开這項工作的一切企图，原是很自然很正当的；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間巩固起来。而現在則已經有广大的力量卷入运动中来，有教养的阶级的年轻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們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許多参加了运动或者願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許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 1894 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屈指可数的）。我們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們还不会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会給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們在下一章里还要詳細談到）。这些力量絕大多数都完全沒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談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們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給

① 多么纯朴天真啊！——編者注

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識，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各种陣地上都有“自己的人”，都有社会民主党人，以便了解我国全部国家机构的内幕。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鼓动方面需要，在組織方面尤其需要。

有沒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誰看不見这一点，那就說明他自己的觉悟程度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經使并且現在还在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滿，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可以得到支持，使第三部分人感觉到专制制度无法維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所有一切不滿的表現，是要把所有一切即使是还很微弱的抗議聚集起来并且給以推动，那我們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是常常有这种情形的）。不要說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始終是非常願意听比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的，而且在哪一个阶级中沒有一些对无权地位和专橫暴虐不滿、因而易于接受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的分子、集团和小組呢？誰想具体認識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們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們以后还要詳細談到）：“我們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間激起从事政治揭露的热情。决不要因为現在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惶惑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橫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願意从事揭露的人還沒有一个說話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演人說話并且鼓舞讲演人精神的听众；他們在人民中間还完全看不見值得向它控訴‘万能的’俄国政府的那种力量…… 現在我們已經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報紙就

应当是这样的讲坛。”①

工人阶级就是政治揭露言论的最好的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进行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便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刊物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资助卡特柯夫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刊物冲破书报检查的障碍，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派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五十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愿意阅读秘密刊物，愿意从这种刊物中学习——用一位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³³的那封信上所说的话来说——“怎样活和怎样死”的人民阶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许多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越是广阔和强大有力，为了开始战争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人数越多和越坚决，这种宣战所发生的精神上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政治揭露工作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手段，是使敌人所有那些偶然或暂时的同盟者离开他们的一种手段，是在那些经常参加专制政权的分子中间散播互相仇恨和互相猜忌的情绪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8頁。——編者注

別的階級)，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靜的实事求是的人。他們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訴”下級官吏都不免有危險，更不要說“控訴”“萬能的”俄國政府了。所以他們只有當看到向我們控訴真能發生作用，看到我們真是一種政治力量的時候，才會來向我們控訴。我們要想在旁人眼裡表現為這樣一種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斷地努力提高我們自己的覺悟性、首創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是在後衛隊的理論和實踐上挂起一块“先鋒隊”的招牌是不夠的。

既然我們應當負責組織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末我們的運動的階級性質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那位過分熱心地崇拜“與無產階級鬥爭保持密切的有機聯繫”的人一定會這樣質問我們，並且已經在這樣質問我們了。我們回答道：我們運動的階級性質就表現在這種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來組織的，就表現在進行鼓動時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始終都要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來加以說明，而決不寬容任何有意或無意地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就表現在進行這種全面的政治鼓動的黨把上述的各種活動結合成為一個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擊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無產階級並保持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並利用工人階級和剝削者之間自發產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無產階級群眾激發起來和吸引到我們的陣營中來的衝突！

經濟主義的最明顯的特點之一，就是不了解無產階級最迫切的要求（即從政治鼓動和政治揭露中獲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運動的要求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繫甚至互相符合的事實。而這種不了解不僅表現於“馬爾丁諾夫式的”詞句，並且還表現於意思與這些詞句相同的那種援引所謂階級觀點的論調。例如，請看“火

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經濟主义者的”来信^①的作者們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說的吧：“‘火星报’的基本缺点（即夸大思想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不彻底的原因。它根据理論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决定立即转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來說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像那些关心小孩子的“經濟主义”知識分子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馬尔丁諾夫的语言來說——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結果”的要求而斗争）“……而‘火星报’又沒有耐性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中間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們的确是已經沒有任何“耐性”“等待”一切“調和者”老早答应賜給我們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們的經濟主义者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話来为自己缺乏力量辩护了。我們要問問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是要在政治上教育工人，要在他們面前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嗎？正是为了这一点，我們就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中間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們一起去揭露当局对地方自治派、教师、統計員和学生等等所举行的那种政治进攻

① 因为篇幅有限，我們当时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代表經濟主义者观点的信作一个詳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現使我們非常高兴，因为我們早已从各方面听見过責备“火星报”不一貫遵守阶级观点的流言，而我們当时正要等待一个良好的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責备的正式的說法出現时給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們所慣用的方法却不是防御，而是反攻。

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嗎？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奥妙的东西”嗎？难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 1897 年起就已經向你們反复說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間爭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間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間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嗎？”而馬尔丁諾夫之流及其他經濟主义者仍然认为 起初工人应当用“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經濟主义者繼續說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常常离开了阶级观点，抹杀阶级矛盾，把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緒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举例來說，‘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派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是“对这些不滿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貴族保证由工人阶级給以援助，而对这些居民阶层之間的阶级紛爭却只字不提”。讀者只要看一看（在“火星报”第 2 号和第 4 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局”的两篇文章（該信作者們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①所談論的是政府对“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所进行的那种温和鼓动”，对“甚至有产阶级所表現出来的那种自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說工人对于政府反对地方自治局的斗争决不能采取旁观态度，同时号召地方自治局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用全力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溫和的言詞而作出强硬的激烈的表示。該信作者們所不同意

① 在这两篇文章之間（在“火星报”第 3 号上）还登载有一篇专論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見“列寧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376—383 頁。——編者注）

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是不是以為工人“会不懂得”“有产阶级”和“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去作激烈的表示，就是“夸大思想的作用”呢？他們是不是以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局所持的态度怎样，也能“积蓄力量”去与专制政府斗争呢？所有这些我們还是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写这封信的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認識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們所說的这句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說，也是“蒙蔽阶级的对抗性”）。照他們的意見，我們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示威手段来当众指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来源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①），——倒应当刊載“工人思想报”式的議論吧！这种意見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生运动高潮的前夜发表的，而这个学生运动的高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维护那些惨遭军警毒打的学生的自发趋向，已經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組織的自觉活动！

該信的作者們繼續說道，“但是在其他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銳地斥責任何妥協，而出来，比方說，維护蓋得分子的不肯容忍的行为。”我們劝那些在評論现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意見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輕率地說这些意見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的人們仔細想想这几句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說我們在說明专制制度同各种阶级相敌对这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种社会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这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之少，而另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71—375頁。——編者注

外有一种人却以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大概是向“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种理論妥协，——試問这两种人能否共同在一个組織內順利进行工作呢？

我們在談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曾經說必須把階級斗争灌輸到农村中去（“火星报”第3号^①），而在談到維特秘密奏折的时候曾經說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們在談到新頒布的法律的时候抨击了地主以及替地主服务的政府所施行的农奴制政策（第8号^②），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請願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③）；我們鼓励了那些已經开始了解必須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經轉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責了那些主张“純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參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現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評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員會宣言）；我們揭露了“俄國报”^④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分子的“无謂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訊室“对和平的作家、老教授和学者以及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人士橫施摧殘”的狂暴行为（第5号，“警察对文坛的襲击”一文）；我們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綱領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謂“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⑤）；我們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統計家（第7号）而斥責了甘作工賊的統計家（第9号）。誰把这个策略看做是蒙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識，看做是同自由派妥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76—383頁。——編者注

②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76—80頁。——編者注

③ 同上书，第81—82頁。——編者注

④ 同上书，第64—70頁。——編者注

协，那他就是暴露自己完全不懂《Credo》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正是实行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到“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道路上去，在自由派面前屈服，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态度的任务。

(六)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客气的字眼是“工人事业”杂志听见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自敬我们的。“工人事业”杂志社的人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我们对他们的责备不过是论战中的一种谩骂手段，说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定用一切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声明，说这是“露骨的誹謗”（“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虚伪”（第33页）。“工人事业”杂志在这方面倒像丘必特一样（虽然它不大像丘必特），它所以生气，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的急躁的谩骂，恰巧是证明它自己不会思考对方的意思。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杂志是否会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会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爽地说出自己对于国际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会的，它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它

堅決採取一種可以說是“一味抵賴”的手法。我不是我，馬不是我的，我也不是馬車夫。我們不是經濟主義者，“工人思想報”不是經濟主義，俄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經濟主義。這的確是一種頗為巧妙的和“機靈的”手段，不過這樣做也有一點不便的地方，就是凡採取這種手段的機關報，人們都把它叫做“牆頭草”。

在“工人事業”雜誌看來，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俄國根本就是一種“幻影”（“兩個代表大會”第32頁）^①。這些人真是有福氣！他們好像鴕鳥一樣，只要把頭縮在翅膀底下，便以為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許多自由派政論家，他們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凱歌，說馬克思主義垮台了，甚至滅絕了；有許多自由派報紙（如“聖彼得堡新聞”³⁵、“俄羅斯新聞”及其他許多報紙），它們鼓勵自由派把布倫坦諾式的階級鬥爭觀和工聯主義的政治觀傳授給工人；有許多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他們的真实傾向已經由《Credo》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只有他們所著作的貨色才能在全俄通行無阻，到處暢銷；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派別已經活躍起來，尤其是在二三月事件之後，——所有這些大概都是一種幻影吧！所有這些都是同資產階級民主派毫不相干的！

“工人事業”雜誌以及發表於“火星報”第12號上的那封經濟主義者來信的作者們當“想一想，為什麼春季事件沒有使社會民主黨的威信和聲望提高起來，反而使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派別這樣活躍起來呢？”——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勝任自己的使命，是因

① 這裡他們又是以“俄國具體條件必然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作為論據。他們不願意了解，工人運動的革命道路也還可能是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整個西歐資產階級在專制制度下都是“推動過”，都是自覺地推動過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却不能以此為滿足。所以，我們只要（不管是用什麼方式）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降低為自发的工聯主義的政治，我們也就正是幫助了資產階級民主派。

為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們的积极性，是因為我們沒有具备有足夠修養的革命領導者和組織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緒，善于领导运动，把自發示威变成政治示威，使示威游行的政治性质加强起来等等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于是，我們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較活跃和比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地顽强地与軍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們終究只会成为帮助上述那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資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鋒队。就拿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來說吧。为什么德国每次政治事件都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更加增强呢？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計这种事件，都更积极地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議。它并不用經濟斗争一定会推动工人感到他們的无权問題、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議論来安慰自己。它干預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領域和一切問題，例如德皇威廉不批准資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問題（我們的經濟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說这其实就是同自由派妥协！），頒布法令禁止“不道德的”图书的問題，政府干預大学教授人选的問題以及其他等等問題。他們在一切場合都走在大家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間激发政治上的不滿，喚醒沉睡者，振奋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积极性。結果，甚至那些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怀有尊敬的心情；所以，不仅是資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落到“前进报”編輯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工人事业”杂志

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矛盾”，只好举手高喊：“这是虚伪”！你們想想看：我們“工人事业”杂志最重視的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們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們警告大家不要輕視自发成分的意义，我們想賦予經濟斗争本身，本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們想保持我們与无产阶级斗争間的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些人說我們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誰在这样說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派“妥協”，干預每一个“自由主义”問題（这是多么不了解“与无产阶级斗争間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局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一般想要多花些力量（与經濟主义者比起来）到各个非无产者阶级的居民中間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杂志！它是不是总有一天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呢？

四 經濟派的手工业方式和 革命家的組織

我們上面已把“工人事业”杂志說經濟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說我們目前的任务是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的論調，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論調表明他們不仅对于我們的政治任务，而且对于我們的組織任务也持着狭隘的見解。为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有这样的斗争的基础上也产生不出）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組織，一个能把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态度、抗議和义憤的表現都汇合成为一个总的攻击

的組織，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領袖領導的組織。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組織，其性质自然并且必然要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內容。因此，“工人事业”杂志的上述論調，就不仅是要推崇政治活動的狹隘性，而且推崇組織工作的狹隘性，把这种狹隘性說成是正当合理的現象。在这个問題上，也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样，“工人事业”杂志是一个使自己的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組織形式，不了解我們的組織工作多么狹隘和原始，不了解我們在这个重要工作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們运动的真正的病症。当然，这并不是衰落过程中的病症，而是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自发义憤的浪潮簡直要把我們这些运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淹沒的时候，特別需要同一切維护落后性的主张，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狹隘性說成是正当合理的現象的企图进行决不調和的斗争，特別需要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是預備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現在我們中間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滿，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这种手工业方式。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可以拿 1894—1901 年間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組的活動情況來做例子。我們已經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都紛紛傾心于馬克思主義。自然，他們这样傾心不仅仅是把馬克思主義当做理論看待，甚至与其說是把馬克思主義当做理論看待，不如說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這一問題的回答，当做向前去进攻敌人的号召。于是，这些新的战士便在装备非常簡陋、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場合，他們几乎是沒有任何装备，沒有絲毫准备的。他們跑去作战，正好像一些种地

的庄稼汉只拿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一样。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别地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关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没有任何一个较为长期而有系统的活动计划，就直接去同工人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一批的青年输送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规模也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同工人建立过并维持过联系和编印过传单的那些人，现在已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示威，以至采取公开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号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其所以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系统的、预先想好的和早有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依照惯例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增长；因为警察局自然几乎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的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经“露过头角”的主要人物的，它只是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起来，以便获得明显的 *corpus delicti* ①，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物留在狱外“进行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双方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拿着木棒去进攻现代化的军队。

① 犯罪要件。——编者注

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虽然作战的人这样毫无准备，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增长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当严重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的时候（这种行动实际上从 1896 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的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主义者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等等），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拥有一切精良的装备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相当的地方去。于是迫害的行动层出不穷，牵连的人日益增多，地方的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任何工作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分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光狭小，这就是上述的那些情形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的态度和不能很好地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离开了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了，常常被破获！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态，——这是稍微了解运动的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熟悉运动的情况的读者不要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态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读者不要埋怨我们引证得太长了。

勃一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6 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过渡到更广泛的

实际行动这一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現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現象，是一个特点……那末在俄国工人革命的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們所說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①。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得到发展，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頻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日益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驅逐的手段，于是缺少优秀的革命人材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而且显然不能不影響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許多罢工都沒有受到革命組織方面的有力的直接的影响……鼓動传单和秘密刊物都感到不足……工人小組內沒有鼓動員进行工作……經費也常感缺乏。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組織的增长和发展。現有的革命活动家人數太少，不能把对于全部激动不安的工人群众的影响集中在自己手里，不能使所有的騷动事件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組織性…… 单个的小組，单个的革命家，沒有集合起來，沒有統一起来，沒有組成为一个統一的、强有力、有紀律的、各部分都有計劃地发展的組織……”接着作者說明，旧的小組一遭破坏便馬上有新的小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說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說明已經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結論說：“彼得堡的革命家的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們的工作結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別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資本斗争社’³⁶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動員既然不熟悉本工厂內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動工作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則，而只是領会了”（真的領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了，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組織或至少是一部分組織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之久，試問它的活動能有成就和效果么？…… 現在各个組織中的缺点显然不能說是完全由于过渡时期的关系……現有組織的成分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的不足，显然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員的条件下把各个組織切实地統一起来。”

① 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們加的。

(二)手工业方式和經濟主义

現在我們应当來談談每個讀者大概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說，作為整個運動所固有的發展過程的病症的手工業方式，同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派別之一的經濟主義有聯繫呢？我們認為是可以這樣說的。缺乏實際修養，不善于做組織工作，這確實是我們大家的通病，甚至從一開始就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人也不例外。當然，誰也不能因為實際工作者缺乏修養而責備他們。但是，“手工業方式”這個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養之外，還有別的含義：全部革命工作規模狹小，不懂得在這種狹小的工作的基礎上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組織，最後——並且最重要的一——就是企圖為這種狹隘性辯護，並且把它提升為一種特別的“理論”，也就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這種企圖從一產生就清楚地說明手工業方式是同經濟主義有聯繫的，說明我們如果不擺脫一般經濟主義觀點（即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務的狹隘見解），便不能擺脫我們組織工作的狹隘性。這種企圖表現在兩方面。有些人說：工人群众自己還沒有提出革命家“強加於”他們的那些廣泛的戰鬥的政治任務，工人群众還是應當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鬥爭，“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①（而與這種群眾運動“能夠勝任的”鬥爭相適應的，當然就是那種連最缺乏修養的青年也“能夠勝任的”組織）。另一些人則根本不贊成什麼“漸進主義”，他們說：可以並且應當“實現政治革命”，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完全不需要建立什麼用堅忍頑強的鬥爭來教育無產階級的堅強的革命家組織，只要我們大家拿起我們“能

① “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特別是給普列漢諾夫的“答復”。

够胜任的”和已經用慣的木棒來干就行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只要我們舉行總罷工^①，或者只要用“激發性的恐怖”來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運動就行了^②。這兩派人，即機會主義者和“革命主義者”，都屈服於盛行的手工業方式，不相信有擺脫它的可能，不了解我們最迫切的首要的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鬥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固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

我們剛才摘引了勃一夫的話：“工人運動的增長超過了革命組織的增長和發展。”這位“就近觀察的人的有價值的意見”（“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對於勃一夫那篇文章的評語），對於我們有雙重的價值。它表明，我們一向所說的目前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危機的基本原因是領導者（“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民主黨人）落後於群眾的自發高潮這個看法是正確的。它表明，經濟主義者來信（“火星報”第12號）的作者們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所謂輕視自發成分與日常的平凡的鬥爭的意義的危險，所謂過程策略等等的各種論調，正是歌頌和維護手工業方式。這些人一提到“理論家”這個詞就做出一副極端鄙視的怪樣子，而把自己對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和不開展狀態表示膜頂跪拜的態度稱為“對生活的敏感”，其實他們不過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們最迫切的實際任務而已。他們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齊步前進！不要搶先！他們向那些在組織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創精神，缺乏廣泛而大膽地開展工作的“計劃”的人高喊所謂“過程策略”！我們的主要過失就是降低我們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去適應最近的“顯著的”“具體的”日常經濟鬥爭的利益，而人們却繼續向我們高唱什麼要賦予經濟鬥爭

① 小冊子“誰來完成政治革命？”載於俄國出版的“無產階級鬥爭”文集。這本小冊子基輔委員會也翻印過。

② “革命主義的復活”和“自由”雜誌。

本身以政治性质！我再重复說一遍：这种“对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間故事中那个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物的“敏感”一样！

請你們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納尔苏修斯^①式的”高傲态度教訓普列汉諾夫时所說的一段話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爭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的答复”第24頁）但是，先生們，小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認識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們一寫到“实际”二字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号，以为实际性要求他們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末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无可救药的，他們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阿列克謝也夫、梅什金、哈尔土林和热里雅鮑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們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終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終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諾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們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縮

① “納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名。传说，納尔苏修斯自恃美貌，妄自尊大，拒絕了所有向他求爱的女神。因此，爱神阿芙罗狄蒂为了惩罚他，使他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水中，結果憔悴而死。此处，列宁用来比喻高傲自大。——譯者注

小“工人小組”活動的毅力和規模。這豈不正是表明手工業者迷戀於自己的手工業方式嗎？你們愛以實際精神自夸，却沒有看見俄國每個實際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實，即在革命事業中不僅小組的努力，甚至個人的努力也能創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許你們以為在我們的運動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樣的卓越的活動家吧？為什麼？是不是因為我們缺乏準備呢？但我們正在準備，還要繼續準備，而且一定能夠準備好的！固然，不幸在“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的死水上面浮起了一層泡沫，出現了一些對發性頂禮膜拜、虔誠地注視着俄國無產階級的“臀部”（照普列漢諾夫的說法）的人。但我們一定能除去這層泡沫。正是現在，遵循着真正革命理論、依靠着真正革命的和自發覺醒起來的階級的俄國革命家終於（終於！）能够直起腰來，盡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強大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使一切想降低我們的政治任務和我們的組織工作規模的企圖，都在人數眾多的實際工作者中間，在人數更多的、還在學生時代就夢想做實際工作的分子中間，受到嘲笑和鄙視。先生們，放心吧，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寫過這樣一段反對“工人事業”雜誌的話，“在24小時內可以改變某個專門問題上的鼓動策略，可以改變黨組織進行某一枝節性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變自己對於戰鬥的組織和群眾中的政治鼓動工作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問題的看法，那不要說在24小時內，即使在24個月內加以改變，也只有那些毫無原則的人才辦得到。”^①“工人事業”雜誌回答道：“‘火星報’所提出的這個唯一彷彿是屬實的罪狀是毫無根據的。‘工人事業’雜誌的讀者清楚地知道，我們從一开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頁。——編者注

始，在‘火星报’出現以前，就不仅号召大家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定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最近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用自己的出版物来为当时在俄国境内活动的同志們供給过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应当順便指出，你們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极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經濟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縮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难道你們諸位先生还不明白，你們这种論据恰巧是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現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斗争嗎？）……“另一方面，我們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說一致认定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嗎？多么宝贵的一致呵！）……“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的組織’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凡是侨居国外的組織一般力所能及的，联合会都已經做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5頁）。这种逃避問題的說法是徒劳无益的！你們确实做过你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沒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會斷言并且現在还要断言，你們“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們目光短浅而被縮小了。至于所謂建立“战斗的組織”来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來“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种說法，那就是可笑的了。

假使讀者要想看到“經濟主义者”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絕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不稳定的折衷派的“工人事业”杂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附刊”第13頁上

写道：“关于所謂革命知識分子問題，我們現在要讲几句話。固然，革命知識分子已經屢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作坚决斗争’的充分决心。但不幸的是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由于受到政治警察方面的残酷迫害，而把反对这个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們至今还不知道究竟要‘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坏的崇拜者)的这种輕視反警察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为我們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竟硬說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反政治警察的斗争实际上对于我們來說是不重要的！这种奇怪的結論，一定是很少有人表示贊同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們革命組織的缺点了。但是，如果——举例來說——馬尔丁諾夫对这种結論也不表贊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沒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論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能产生显著結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还需要特別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組織嗎？——那些絲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着这样的“任务”嗎？況且，如果除了少数領導者之外，沒有那些絲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絕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嗎？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軍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現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們才能够）决定我們整个运动的結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別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所以我們不仅要設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設法使工人群众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們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組織与純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問題。这个問題虽然在刊物上很少反映，但在我們“政治派”

与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經濟主义的同志們談話和爭論时却談得很多。这个問題值得特別說明一下。不过我們首先还要引一段話来結束我們关于手工业方式与經濟主义的联系这个見解的說明。

N. N. 先生³⁷ 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慮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沒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后几个字加上了着重号，并且对“道路”二字加了个注释：“这件事实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綱領中所說到的不是阴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的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么？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运动和秘密的請願运动么？”（“指南”第 59 頁）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終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們不必表現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鼓励和督促我們表現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与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成为（而且多半成为）“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設法斷絕外界与罢工者的任何关系，总是設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十分內行地”来組織。組織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比較不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們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一种秘密的行动（而有时我們自己也沒有秘密地准备），那我們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負的直接責任。我們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越来越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

們不想方設法使工人始終停留在原地不动)。

(三)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組織”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組織”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們談論組織問題时，簡直就是各讲各的話。例如，我現在还記得我同从前不認識的一位頗為彻底的經濟主义者談話的情形。当时我們是在談“誰來完成政治革命？”这本小冊子，我們兩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冊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視了組織問題。我們滿以為我們彼此是意見相同的，但是……当繼續談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我們两个人說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對話人責備該書作者忽視了罢工儲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完成”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的組織。在这种意見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記得我和这位經濟主义者在任何原則問題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見了！

我們的意見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經濟主义者在組織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們对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經濟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組織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組織不同。第一，工人組織应当是职业的組織；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組織；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組織(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地，革命家的組織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革命家的組織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既然这种組織的参加者

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末，工人与知識分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說他們各種不同的职业之間的區別了。這種組織必須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三种區別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內，职业組織和政治組織之間的區別也像工聯和社会民主黨之間的區別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各个國家內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們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尽量簡單），但在自由國家內，工会組織和社会民主黨組織的混同是根本談不到的。在俄国，初看起來，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黨組織和工会之間的任何區別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組都被禁止，因为工人經濟斗争的主要表現和主要手段即罢工根本就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推動”那些进行經濟斗争的工人“感到”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推動”社会民主黨人把工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義混为一談（我們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之流拚命談論第一种“推動”，而沒有看到第二种“推動”）。例如，就拿一味埋头于“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的那些人來說吧。其中有一部分人在他們活動的整个时期中（4个月至6个月）一次也不会感到必須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組織的問題；另一部分人大概会“感到”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从这些著作里得出“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許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義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許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

越晚，社会主义者也就越能参加工会运动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越加少见。如果到此为止，那末这个推論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人們还要更进一步，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混合起来。我們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們的組織計劃发生了怎样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經濟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組織应当是职业的組織。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組織并在这种組織內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會員，那就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們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須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組織，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組織越广泛，我們对于它們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經濟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們的同事給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組織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訓練，要比参加經濟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員，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組織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說來，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內是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組織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說的那样——lose^①，使秘

① 自由，广泛。——編者注

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經開始實現了，并且毫无疑问，我們的迅速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是来自拥护現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自己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經由瓦西里也夫和祖巴托夫之流树立起来，奧捷罗夫和沃尔姆斯先生之流也已經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經給以支持；在工人中間已經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們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慮呢？——对于这个問題，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大概不会有两种意見。我們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也夫之流、宪兵和牧师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用意讲給工人听。同时我們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動家在工人公开大会上說話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調和的、“和諧的”論調——无论他們提倡这些論調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結上司，或者只是因为笨拙无能。最后，我們还应当警告工人，使他們不要陷入警察經常布置的陷阱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大会上和合法团体内偵查“激烈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組織把奸細派到不合法的組織里来。

但我們这样做，并不是忘記工人运动合法化 归根到底 只会使我們获得益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益处。恰恰相反，我們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們已經說过了。而所謂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卸除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組織互助会等等），这一工作的发展是必然会供給我們越来越多的鼓动材料的。在这一点

上，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和奧捷羅夫之流說：努力干吧！先生們！努力干吧！既然你們想布置陷阱来陷害工人（無論是用直接的奸細告密手段也好，或是用“司徒盧威主義”來“誠實地”腐蝕工人也好），那我們就要設法揭穿你們。既然你們真正前进了一步，——雖然表現得極其“畏縮迂迴”，但終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們就要說：請吧！只有真正擴大——哪怕只是稍微擴大——工人的活動範圍，才能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這樣的擴大都會有利于我們，并且會加速那种不是奸細在其中找到社會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在其中找到信徒的合法團體的出現。總而言之，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清除莠草，而不是在溫室裏面培植小麥。我們把莠草除去，就能使小麥大大發育起來。而在阿法納西·伊萬內奇之流和普耳賀麗婭·伊萬諾夫娜之流^①在溫室里從事栽培的時候，我們則應當訓練出一些既會鋤今天的莠草，又會割明天的麥子的人^②。

總之，我們不能用合法化來解決建立尽量少帶秘密性和尽量廣泛的工會組織的問題（但是，假如祖巴托夫和奧捷羅夫之流為我們造成即使は局部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那我們會很高興，但

① 阿法納西·伊萬內奇和普耳賀麗婭·伊萬諾夫娜，是果戈里中篇小說“旧式的地主”中的一對地主夫婦。——譯者注

② “工人事業”雜誌看見“火星報”在那裡同莠草作鬥爭，就怒氣沖沖地攻擊“火星報”說：“在‘火星報’看來，目前時局中的主要問題不是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細想使工人運動‘合法化’的那些可悲的嘗試。‘火星報’沒有看到，這種事實正是表明‘火星報’的意見是錯誤的；這種事實正是證明工人運動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規模。”（“兩個代表大會”第27頁）一切的不幸都應當歸咎於這班“對於實際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視無睹的”正統派的“教條主義”。他們死也不願意看一尺高的小麥，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莠草作鬥爭！這難道不是表明他們“對俄國工人運動的前途持着錯誤的見解”嗎？（同上，第27頁）

是为了这一点，我們就要尽量坚决地同他們斗争¹⁾。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組織这条道路可走，而我們应当对于已經走上（這是我們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給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組織不仅能大大促进經濟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組織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結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就必須明白認識彼得堡的經濟主义者几乎已經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組織計劃的荒謬。这个計劃載于1897年7月的“工人儲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6頁——轉載自“工人思想报”第1号），以及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单頁，“火星报”第1号上也曾經談到它）。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詳細地规划了广泛的工人組織并且把这种組織与革命家的組織混为一談。我們可以拿比較詳尽一些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分五十二条，其中有二十三条是說明組織结构、办事細則以及設在每个工厂內的“工人小組”的权限的，这些小組（“每組不超过十人”）选出“全厂中心小組”。章程第2条上說：“中心小組应当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編写本厂的大事記”。“中心小組每月应当向全体会員报告儲金出納情況”（第17条），等等。有十条专讲“区組織”，有十九条专讲“工人組織委員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員会”（各区以及各“执行組”即“宣传組、外省組織联络組、国外組織联络組、貯藏組、出版組和儲金組”选出的代表）的錯綜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工人經濟斗争的“执行組”！这最清楚不过地說明經濟主义者的思想已經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說明他們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設法建立一个能够領導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組織。口里說什么

“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说什么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笔下却写出这样的组织章程，那就等于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五十多条章程中間，沒有一条证明他們稍微懂得必須在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全部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要求按职业組織起来，而在章程里連这一点也根本沒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瑣，人們企图在三級选举制下，用一条由一模一样的、瑣屑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的綫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員會”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經濟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着官样文章和官場气味的烦瑣的条文中。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設有中心小組的这种“秘密”組織倒使宪兵易于大規模地破获。波兰的同志已經经历过运动的这个阶段，当时大家也都迷恋于普遍設立工人儲金会，但是当他們一明白这只能使宪兵們得到丰富的收获时，他們就馬上把这种念头抛弃了。假使我們想有广泛的工人組織，同时又不願意遭到大規模的破获，不願意使宪兵开心，那我們就应当設法使这些組織完全不具有什么确定的形式。如果这样做，它們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末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編写本厂的大事記”（章程第2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么？不組織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報紙上登載通訊的方法来做這項工作，岂不是更好嗎？“……領導工人为改善他們在工厂內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3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組織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動員都是可以从普通的談話中确切地打听出来的，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

些要求告訴那个狹小的而不是廣泛的革命家組織，以便印發相當的傳單。“……組織儲金會……每一盧布工資繳兩個戈比作為會費”（第9條）——並且每月向全體會員報告儲金出納情況（第17條），把不繳會費的會員開除出去（第10條），等等。這在警察看來，真是再好沒有了一了，因為這樣一來，要洞悉這些“工厂中央儲金會”的一切秘密，要沒收他們的金錢，要拘捕一切優秀分子都容易極了。發行價值一個或兩個戈比的印花，蓋上某个（很狹小的很秘密的）組織的圖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實行募捐，在秘密報紙上用某種暗號把捐款賬目公布出來，這豈不是更簡便些嗎？目的同樣可以達到，而宪兵要找到線索就困難百倍了。

我本來還可以繼續用舉例的方法來分析這個章程，但是我认为我所講過的已經很夠了。由最可靠、最有經驗、經過最多的鍛煉的工人組成的一種人數不多的緊密團結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區域都有自己的代表，並且按照嚴格的秘密工作的種種規則同革命家組織發生聯繫，——這樣的核心在群眾最廣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執行工會組織所應當執行的一切職能，並且執行得正像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那樣。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免於一切宪兵的破壞，而使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運動得到鞏固和發展。

有人會反駁說：一個組織這樣 lose^①，根本就沒有什麼確定的形式，甚至連確定的、經過登記的成員都沒有，根本就不配稱為組織。也許是這樣。我不太重視名稱。但這種“沒有成員的組織”能夠做到我們需要做的一切，並且一开始就能夠保證我們將來的工聯同社會主義發生牢固的聯繫。誰想在專制制度下建立一個實行

① 自由，廣泛。——編者注

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組織，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們如果从切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組織开始，我們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純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們如果从建立一些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只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組織开始，那我們就会两种目的都不能实现，就会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捷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組織。

这种革命家組織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們下面就要来詳細談談。但是我們首先还要考察一下我們的恐怖主义者的另外一段极其典型的議論，他在那里又成了（真是命途多舛！）經濟主义者的近邻。在供工人閱讀的“自由”杂志（第1期）上，載有一篇标题为“組織”的文章，該文的作者是想为他那些朋友們，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經濟主义者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沒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看，学生們离开大学所在的城市，四散回家去过节或者过暑假了，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頓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 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一四散回家，运动就停止了；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了；‘委员会’被破获了，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将来建立起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許完全不像先前的委员会那样。先前的委员会这样說，而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那样說。过去和将来之間失掉联系；过去的經驗不能传給将来。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間沒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笨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如果組織能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

群众来干，那就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 63 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所作的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与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却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像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 *embarras de richesses*^①，“自由”杂志奉送给我们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真使我不知从何处下手来分析才好！为了清楚起见，我就从举例来开始谈吧。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譏諷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首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强性和稳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

① 应接不暇。——编者注

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經驗的积累已經足以使他們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沒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經過考驗、受过專門訓練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間，也有过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們竭力奉承“几百个笨人”，把他們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地贊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起他們（像莫斯特和哈賽尔曼那样）去从事輕率的“革命”行动，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領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一切蛊惑人心的分子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調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而在目前，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充分有修养的、开展的、有經驗的領導者的时候，我們的才子們却像民間故事中那个傻瓜伊万努什卡一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說道：“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所組成的委員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固”，——這話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組成的委員会，不管他們是学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們能把自己造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就可以。而你們所做出的結論，却是說不要从旁边去推动工人运动！你們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們这样主张只是有助于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和我們的手工业方式。請問：我們的学生“推动”我們的工人，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現就是，学生把他們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識和他們所获得的一些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糧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只能提供一些起碼知識和片断）传授給工人。在我們的运动中，像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

是太少，真是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為我們已經過分地閉關自守，過分奴隸般地崇拜那種初步的“工人對廠主和政府作的經濟鬥爭”了。我們職業革命家應當而且一定會百倍努力地來從事這樣的“推動”。但正因為你們用了“從旁推動”這樣一種可惡的字眼，這就必然會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們一樣不開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從旁給予他們政治知識和革命經驗的人，使他們對所有這些人都本能地想表示抗拒，——這樣，你們就成了蠱惑人心的人，而蠱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壞的敵人。

是的，是的！你們不要馬上叫喊起來，說我進行論戰時採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懷疑你們心地純潔。我已經說過：一個人只因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為蠱惑人心的人。但是我也已經指明：你們已經墮落到了蠱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終都要重複說：蠱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壞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他們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因為不開展的工人不能識破這些以工人朋友的資格，有時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資格來講話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在目前這種混亂和動搖的時期，在我們運動的面貌剛剛形成的時期，最容易誘惑群眾的莫過于蠱惑人心的宣傳，它使群眾只有以後經過最苦痛的教訓才能覺悟到自己的錯誤。所以，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當前的口號應當是：進行堅決的鬥爭，既反對墮落到蠱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雜誌，又反對墮落到蠱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業”雜誌（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地談到①）。

① 這裡我們僅僅指出：上面我們談到“從旁推動”以及“自由”雜誌在下面關於組織問題的各種議論時所說的一切，是完全適用於包括“工人事業派”在內的一切經濟主義者的，因為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積極宣傳和維護這種關於組織問題的觀點，另一部分人則滑到這種觀點上去。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容易些”。这个辉煌的真理（对于你們所說的这个真理，百来个笨人总是会拍手称赞的），看来好像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們在議論时从一个問題跳到了另一个問題上去。你們开始是讲，并且继续讲着捕捉“委員會”，捕捉“組織”的問題，而現在你們却跳到捕捉什么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問題上去了。当然，我們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成万的根子，但現在所談的并不是这一点。就“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現在也无法“捕捉”我們，哪怕我們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但是，虽然如此，我們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組織”被捕捉的情形，这种情形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們既然已經提出了組織被捕捉的問題，并且不願离开这个問題，那我就要告訴你們，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困难得多。无论你們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說我是“反民主主义”等等，我还是要坚持我这个意見的。在組織方面，所謂“聪明人”，正如我已經屢次讲过的那样，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不管他們是由学生或是由工人造就出来的都一样。而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組織，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組織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蠱惑人心的人誘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容易）；（3）参加这种組織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內，我們越缩小这种組織的成员的数量，縮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訓練的人参加，这种組織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間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

請我們的經濟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經濟主义者兼恐怖主义者”^①來反駁這幾點吧，而我現在只想把其中最後兩點拿來談談。捕捉“十來個聰明人”和捕捉“百來個笨人”的難易問題，可以歸結到我們上面已經分析過的那個問題：在必須嚴守秘密的條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眾性的組織。我們永遠不能使廣泛的組織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沒有這樣高度的秘密性就談不到什麼穩定的和保持繼承性的反政府的鬥爭。把所有秘密的職能集中在數量盡量少的職業革命家的手里，這並不是說他們將“替大家動腦筋”，並不是說群眾不必積極參加運動。恰恰相反，這些職業革命家將由群眾中間越來越多地產生出來，因為那時群眾就會知道，單是幾個學生和幾個從事經濟鬥爭的工人集合起來還不能成立一個“委員會”，為此還需要多年時間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那時群眾就會不只是為手工業方式的活動“動腦筋”，而會為這種培養工作“動腦筋”了。把組織的秘密職能集中起來，這決不是說要把運動的一切職能集中起來。最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秘密刊物工作的情況，不但不會因為“十來個”職業革命家把這方面的秘密職能集中起來而減弱下去，反而會因此而十倍地加強起來。這樣，並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使閱讀秘密刊物，向秘密刊物投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發秘密刊物的工作都幾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

① 這個名詞也許比前面那個名詞更適於形容“自由”雜誌，因為它在“革命主義的復活”中所維護的是恐怖主義，而在我們分析的這篇文章內所維護的卻是經濟主義。事與願違！——用這句成語來形容“自由”雜誌是很恰當的。志向和願望很好，但結果却是一團糟。所以會一團糟，主要是因為“自由”雜誌一方面維護組織的繼承性，同時却不願意承認革命思想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繼承性。極力想使職業革命家復活起來（“革命主義的復活”），同時却又主張：第一，採取激發性的恐怖；第二，“組織中等工人”（“自由”雜誌第1期第66頁及以下各頁），使他們盡量少“被人從旁推動”，——這實際上就等於為了讓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當柴燒了。

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于所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来一套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官样文章，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刊物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示威为止，也莫不如此。經過考驗的、所受的專門訓練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的事情——如准备传单，規定大致的計劃，为全城各区域、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領導人員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参加示威的事情受到损失，反而会对这种事情有很大的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駁我，說我的观点“不合民主原則”，我在下面就要詳細来答复这个极不聰明的反駁）。革命家組織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許多組織的活動范围和內容，这些組織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內，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組織，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組、秘密书刊閱讀小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組等等。这样的小組、工会和团体，必須在各地极普遍地組織起来，使它們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組織同革命家的組織混为一談，抹杀这两者之間的界限，使群众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認識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們忘記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群众对于这一点的認識已經很模糊。我們在組織方面的主要过錯，就是我們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敗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在理論問題上萎靡不振和动摇不定，眼界狹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更像工联书记而不像人民的代言人，不会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計劃来使敌人也生敬畏之心，而且在自己的專門技术即与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也沒有經驗，笨手

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請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所讲的是缺乏修养的問題，这个字眼首先就要用到我自己身上。我曾在一个抱有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組中工作³⁸，——所有我們參加这个小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們意識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这样一个可以把一句名言改成“給我們一个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国翻轉过来”的时候，我們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常常回想起我当时所感到的这种深切的慚愧，而我越是回想起这些，就越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們用他們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們不了解我們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組織工作的規模

我們在前面听见勃一夫說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這件事实大概是誰也不会否认的。可是問題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实。勃一夫写道：

“我們不去說明这种現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敗坏，被那些已經發生和正在发生的經濟变化所分裂的社会，从自己队伍中所提拔出来的能做革命工作的人材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提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組織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滿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內做十一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來說，多半只能执行鼓動員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組織工作，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却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工人事業”杂志第6期第38—39頁）

我們有許多地方不同意勃一夫的这种意見，尤其不同意我們加了着重号的地方，因为这些話特別突出地表明：勃一夫虽然也由于我們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像一切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經濟主义的束縛而不能找到擺脫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材实在很多，但我們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們。在这方面，我們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沒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願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識到，但已經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銳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沒有人，因为沒有領導者，沒有政治領袖，沒有擅长于組織的人材来进行广泛而且統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分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組織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勃一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現在勃一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見也是对他那个結論的一个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規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較起来实在是太狹隘了，它受“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种可怜的理論的束縛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現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的人，而且那些做組織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①。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組織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給屬

① 例如，近來在軍界可以看見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來的現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街头斗争的結果。所以，只要我們力量許可，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加强兵士和軍官中的宣传鼓動工作，注意建立加入我們党的“軍事組織”。

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分子去担任的。缺少专门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这个缺点是使我们一再非常痛苦地和非常正确地表示不满的。整个事业的单个“手续”越细致，也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执行这些手续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捕捉”所有这些“做零碎工作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把根据某件琐事捕人的情况构成“案子”来抵销国库用于“侦察局”的经费。至于那些願意帮助我們的人数，我們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沒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①——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越是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也就会越是坚定，越是广泛地传布开来，——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

①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报告”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是曾经多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的。能够并且确实会给予我们这种单个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这一切“帮手”都暴露出来，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特别培养一批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即以官吏的身份所能提供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的”革命家的身份所能提供的多些。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大，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强大；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惧怕大量的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了（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Credo》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然而勃一夫自己虽然很好地描写了专门化的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論的后半部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专门化的意义。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件事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人们在讨论我们对于工人的义务时所常常提出的那种“教育”不仅非常错误，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件事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站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却远不这样容易，远不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是否认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

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混在一起。你們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講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組織時就弯下腰來，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們還是直起腰來談严肃的問題吧，你們還是把教育交給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給政治家和組織家！難道在知識分子中間不是也有先進分子、“中等人”和“群眾”嗎？難道大家不是認為知識分子也需要通俗讀物嗎？難道這種讀物不是有人在寫嗎？假定說，有一個人在他所寫的一篇論大学生或中學生組織問題的文章中，好像有什么新發現似的，再三說明必須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組織起來，這樣的作者一定會受到譏笑，並且是應當受到譏笑的。人們會告訴他說：假如你在組織方面真有什么見解，那末就請你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吧，至于我們中間誰是“中等人”，誰高些，誰低些，那我們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組織方面沒有自己的見解，那末你硬要談什么“群眾”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無味的玩意兒。你要知道，“政治”問題，“組織”問題，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問題，所以談這些問題的態度就必須十分严肃。可以而且應當訓練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學生），以便有可能同他們來談這些問題，但你既然談到了這些問題，那你就應當拿出真正的回答來，而不應當倒退到“中等人”或“群眾”上面去，不應當拿些花言巧語來敷衍塞責^①。

為了能充分執行自己的任務，工人革命家也應當成為職業革

① “自由”雜志第1期上所載“組織”一文（第66頁）中說：“工人大眾將用他們沉重的脚步來支持將以俄國劳动界名義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這個詞當然是要大寫的！該文的作者又高喊道：“我並不敵視知識分子，但是”……（這也就是謝德林用“耳朵不會高過額頭”这几个字來翻譯的那個但是！）……“但是當一個人跑來講些非常漂亮動聽的話，並且只是因其（他的？）漂亮和其他優點而要求別人接受這些話的時候，我總是感到非常氣憤”（第62頁）。是的，這也使我“總是感到非常氣憤”……

命家。因此，勃一夫說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十一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余各种（除鼓动之外）革命职能“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就是不正确的了。其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一切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着自己的人材，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培养的人材。你们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材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却非常懂得，由“中等人”中间提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把每一个能干的工人立刻安置在相当的地方，使他的才能有充分发展和充分运用的机会，使他成为职业的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了经验技能，他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了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与他们同样的高度，力求把对于工人群众的了解、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无产阶级与它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时所绝对必要的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倍倍尔和奥艾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间提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俄国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系统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前途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与宪兵至少周旋上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

动员，而且是能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这条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却往往用一些专说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的现象，与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主义者”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的心理使人害怕稍微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高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和直接的要求的水平。不要害怕，先生们！要记着：我们现在在组织方面的水平已经低到极点，甚至设想我们可能提得太高，都是荒谬的！

（五）“阴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于最怕提得太高而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说他们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些责备，这些责备“工人事业”杂志当然也是加以附和的。

本书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火星报”一成立，我们很快

听到一个同志說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們也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們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責备。試問，哪一個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會被經濟主义者責罵為民意主义呢？

这种責备是由两种誤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們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宣布决战的集中的战斗組織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們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組織，并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党人和民意党人的那些土地自由派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組織看做是民意党人所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荒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別，如果它真想作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这样的組織不行。民意党人的錯誤并不在于他們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来，引导这个組織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們伟大的历史功績。他們的錯誤在于他們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論，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資本主义社会內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絲毫不了解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 解除了 我們建立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組織的責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 加給 我們这样的責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第二，有許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內（“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8頁）——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阴谋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的論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

們一向都反对，并且始終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阴谋行动^①，但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組織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所指的那本书里，在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結为阴谋行动的同时，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組織的輪廓，这种組織能够“为了給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②。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組織按其形式來說是可以称为“阴谋”組織的，因为法文的“秘密”这个詞是相当于俄文的“阴谋”的，而秘密性是这种組織所絕對必需的。对这种組織來說，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員人數、挑选成員的原則、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种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別人責备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阴谋組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責备，也像說我們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責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經濟主义的人都应当十分乐意地接受的。

有人会反駁我們說：这样一种严守秘密，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組織，这样一种不得不集中化的組織，也許会过分輕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許会輕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上的不滿以及工人阶级中的愤怒等等還沒有

① 參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 21 頁，駁彼·拉·拉甫罗夫。（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293—294 頁。——編者注）

② “俄國社會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 23 頁。（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294—295 頁。——編者注）这里我們还要順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說明“工人事业”杂志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話，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1 期上，有一段加有着重号的话：“該书所闡述的基本思想与‘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綱領完全一致”（第 142 頁）。真的嗎？难道那种认为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嗎？难道“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的理論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嗎？难道阶级論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嗎？請讀者判断一下，像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這個詞的机关报，还能說它有什么原則坚定性呢？

成熟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我們回答說：抽象地說來，當然不能否認，战斗組織可能會引导群众去作輕率的战斗，这种斗争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敗。但是在这样的問題上决不能限于抽象的見解，因为任何一次战斗都含有招致失敗的抽象危險，而除了有組織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減少这种危险。只要我們根据現代俄国的具体条件提出問題，就会做出一个肯定的結論：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使它不致作輕率的进攻，就絕對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組織。而現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組織的条件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經出現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們是應該“殊途同歸”的）：一个是毫无根据的經濟主义和稳健主义宣传，另一个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即企图“在虽然已經发展和巩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結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結局的征兆”（維·查苏利奇，“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第353頁）。“工人事業”杂志的例子，就是表明現在已經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崇拜这两个极端。这种現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現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永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滿意，于是也就始終会时而在那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組織，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滿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組織，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輕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駁我們說：这种組織观点是同“民主原則”相抵触的。如果說前面那个責難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末这个責難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組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才能除其他各种指令外，还向自己的編輯部发出下面这样的指令：

“組織原則。為了順利發展和統一社會民主黨，必須強調、發展和維護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原則，這一點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在我們黨內發現了反民主的傾向。”（“兩個代表大會”第18頁）

關於“工人事業”雜誌究竟怎樣同“火星報”的“反民主的傾向”作鬥爭，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講到。現在我們先來仔細考察一下經濟主義者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大家大概都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只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公開。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舉行的；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組織以內的人嚴守秘密的組織，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的組織的。試問，既然“廣泛民主原則”的基本條件對秘密組織來說是無法執行的，那末提出這種原則又有什麼意思呢？這樣，“廣泛原則”就不過是一句雖然很響亮但是毫無意思的空話。不僅如此，這句空話還證明人們完全不了解目前組織方面的迫切任務。大家知道，在我們這裡，在“廣大的”革命者中間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我們已經看到勃一夫怎樣痛苦地抱怨這一點，他完全正確地要求我們“嚴格地選擇成員”（“工人事業”雜誌第6期第42頁）。誰知有一些以“對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竟認為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特別重要的不是必須嚴守秘密和嚴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較狹隘地）選擇成員，而是“廣泛民主原則”！這真是胡說八道。

關於民主制的第二個標誌即選舉制，情形也並不好些。這個條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中是不成問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章程第1條寫道：“凡承認黨綱的原則並盡力幫助黨的人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既然整個政治舞台都公開擺在大家面前，就像戲

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末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綱，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報紙上，从人民的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可以说知道，某一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工作，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現得怎样，他的一般特点又是什么，——因此，全体 党員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員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作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謂“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錯誤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認識錯誤和避免錯誤。

把这种情形应用到我們的专制国家中來試試看吧！要一切“承认党綱的原則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俄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的利益，必须使这“一切”人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試問是否能够要求大家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担任某种职务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杂志所讲的那些响亮的話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組織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所以說它毫无意思，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組織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 广泛 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願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說它有害，是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則”的企图，只能便于警察来广泛破获我們的組織，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轉移实际工作者的視線，使他們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严重的迫切的任务，而去拟制关于选举制度的詳細的“紙上”章程。这种“民主制的儿戏”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

的人們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間流行。

“工人事业”杂志所慣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則”，为了向讀者表明这种手段的毫不体面，我們还要再找一个見证人。这个見证人就是伦敦“前夜”杂志的編輯耶·謝烈布利雅柯夫，他是个非常同情“工人事业”杂志而极端仇視普列汉諾夫和“普列汉諾夫派”的人。“前夜”杂志在論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問題的文章中，曾經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用滔滔不絕的无聊詞句来攻击普列汉諾夫。因此，我們认为这个見证人在這個問題上更有价值。在“前夜”杂志第7期（1899年7月）所載的“論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耶·謝烈布利雅柯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領袖地位以及所謂最高机构”的問題是“不体面的”，其中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鮑夫、米哈伊洛夫、彼洛夫斯卡娅、斐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沒有以領袖自命，而且誰也沒有选举过他們，沒有委任过他們，但他們确实是些領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与政府斗争时期，他們都担负着最艰苦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們的活動也最有成效。他們的領袖地位并不是他們自己要求来的，而是周围同志們对于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誠表示信任的結果。害怕什么最高机构（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以为它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揮运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誰会听从它呢？”

我們要問問讀者：“最高机构”同“反民主的傾向”有什么区别呢？“工人事业”杂志的“体面的”組織原則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所以說很幼稚，是因为“最高机构”或者有“反民主的傾向”的人，除非有“周围同志們对于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誠表示信

任”，是誰也不会听从他們的。所以說不体面，是因为这是利用一部分人爱好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們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的一种蛊惑手段。我們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組織原則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員，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來說是更为絕對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們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便会使革命組織的成員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沒有時間去考慮民主制（在由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們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內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們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責任，并且他們从經驗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組織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們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頗为发达的輿論，这种輿論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你們注意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的傾向”的論調和決議所发出的那种在国外玩弄的領袖儿戏的臭气，該是多么濃厚啊！

还必須指出，这种論調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們对民主这个观念認識不清而造成的。在維伯夫妇論英國工聯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叙述道，英國工人在他們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分担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問題要由全体会員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員輪流担任。只有經過了长期的历史經驗以后，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可笑

的，才懂得必須成立代表机关和設置专职人員。只有当工会的钱庫发生了几次破产以后，工人才懂得，所繳会費和所得津貼之間的比例問題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見。其次，你們讀一讀考茨基論議会制度和国民立法的那本书，就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結論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訓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責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見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報紙直接由人民編輯”的人，证明为了實現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領導就必需有专职的新聞工作者和专职的國會議員等等，抨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认为他們鼓吹国民直接立法制是为了“嘩眾取寵”，他們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們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民主的“原始”見解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間是很流行的。所以，在一些章程和书刊中也包含着这种見解，这是毫不奇怪的。伯恩施坦派經濟主义者在自己的章程上写道：“第 10 条。与整个协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員的多数决定。”恐怖主义派經濟主义者也重复他們的話：“委員會的決議只有經過所有的小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自由”杂志第 1 期第 67 頁）請注意，这种广泛实行全民公决制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則建立整个組織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們远沒有因此而責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們很少有机会認識真正的民主組織的理論和实践。但是，当那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杂志在这种条件下只以主张实行广泛民主原則的決議为限的时候，那我們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嘩眾取寵”呢？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們已經看見，對這里所敘述的組織計劃的反對意見，即認為這種組織不合乎民主制並帶有陰謀的性質，是毫無根據的，不過，還有一個常常被人提出的問題也值得詳細地探討一下。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有人擔心：建立集中制的組織，這會不會使重心從地方工作轉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這會不會削弱我們同工人羣衆的聯繫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動工作的穩固性，而使運動受到損失呢？我們回答說：近年來我們的運動恰恰是由於地方活動家過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損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轉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絕對必要的；這種轉移決不會減弱，而隻會加強我們的聯繫的牢固性和我們的地方鼓動工作的穩固性。我們就拿中央機關報和地方機關報問題來談吧，同時我們請讀者不要忘記：我們不過是把報紙事業當做一个例子來說明更廣泛更複雜得多的一般革命事業。

在群眾運動的第一個時期（1896—1898年），地方活動家嘗試圖建立全俄的機關報即“工人報”；在下一個時期（1898—1900年），運動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領導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機關報的工作上了。假使把一切地方機關報加在一起，那末大致說來每月只有一號^①。這難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手工業方式嗎？這難道不是顯然說明我們的革命組織落後於運動的自发高潮嗎？假使同樣多號數的報紙不是由各個分散的地方團體而是由統一的組織來出版，那末我們就不仅可以節省大批的人力，並且可以使我們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穩固性和繼承性。但無論是幾乎專為地方

^① 見“向巴黎代表大會的報告”³⁹第14頁，“從那時候起（1897年）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總共出版了三十號不同的報紙……平均每個月出版一號以上。”

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的是，直到現在多半还是这样），或者是在这个問題上表現出惊人的唐·吉訶德精神的政論家，都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总是安慰自己說：地方活動家要办全俄報紙是很“困难”的①；有地方報紙总比沒有任何報紙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見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報紙一般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很大的好处这一点上，我們并不逊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現在所說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擺脫全俄各地在两年半內总共只出版三十号地方報紙的这个事实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来的那种分散性和手工业方式。請你們不要只是停留在什么地方報紙一般是有好处的这种虽然无容置辯、但是过于籠統的議論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經驗所暴露出来的地方報紙的缺点。这种經驗證明，在我国現在的条件下，地方報紙往往是原則上不堅定的、沒有政治意义的、在耗費革命力量方面非常不經濟、在技术方面絲毫不能令人滿意的（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經常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什么偶然現象，而是分散性所产生的必然結果，这种分散性一方面可以說明为什么地方報紙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另一方面它又是由于地方報紙占优势而得以維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組織簡直无力保证自己的報紙具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來說明我国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用來說明必須出版許多地方報紙的理由，即由地方工人印刷时价钱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供給地方居民消息这种理由，在我們俄国，正像經驗所证明的那样，却变成了反对地方報紙的理由。这种地方報紙在革命力量的耗費方面极不經

① 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沒有一个地方小組不能在全俄的工作中积极地担负一定的工作。“不要說我干不了，而应当說我不想干”。

济，出版次数非常少，其原因很简单：秘密报纸，无论规模怎样小，总要有一种庞大的秘密机关，而这种机关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关来的。秘密机关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能造成大规模的破获，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干干净净，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要建立良好的秘密机关，就要革命家有很好的专门训练和极其彻底的分工，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单个的地方组织——无论它当时怎样强有力——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的利益（给工人以有坚定原则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地方的利益，也要通过非地方性的机关报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乍一看来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证明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三十号报纸的一切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末这个报纸就一定会很容易地出版到六十号之多，甚至能出版到一百号之多，因而一定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中的一切纯粹地方性质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组织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的必要。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有容易办理和接近地方的优点，其实这种优点，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看来大都是虚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与实际工作人员接近的政论家实在是妨害着实际工作，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只是说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省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讲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杂志（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题”的时候，

竟說“我們覺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點都應當有本地的工人報紙，不是從別地運來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報紙”，這難道不是唐·吉訶德精神嗎？假使這位政論家不願意考慮他自己所說的這些話的意思，那就請讀者來替他考慮考慮吧：俄國有幾十個，甚至几百個“稍大的工人聚居地點”，如果真是每個地方組織都來創辦本地的報紙，那樣會使我們的手工業方式永遠繼續下去了！這種分散狀態就會使我們的憲兵十分容易地——不用費“稍大的”力量——捕捉地方活動家，在他們一開始活動時就把他們捉走，不等他們發展成為真正的革命家！該文作者又繼續寫道：在全俄的報紙上敘述某某廠主的醜惡勾當和“本城以外的各個城市的工廠生活中的瑣事”是沒有趣味的，而“奧勒爾城的人讀到奧勒爾本城的消息時，就不會感覺無趣了。他一知道把誰‘罵了一頓’，把誰‘揍了一頓’，精神便會振作起來”（第69頁）。不錯，奧勒爾城的人是會精神振作起來的，可是我們的這位政論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這種為舍本逐末習氣辯護的態度是否適當呢？——這才是他所應當好好考慮一下的問題。在承認工廠方面的揭露工作的必要和重要這一點上，我們並不遜於任何人，可是要記住，我們現在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讀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報”上的彼得堡通訊時，也都感覺無趣了。為了在各地進行工廠方面的揭露，我們一向都印發過傳單，並且將來也一直要印發這種傳單，但是報紙這種出版物，我們却應當把它提高，而不應當把它降低到工廠傳單的地步。我們在“報紙”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並不是什麼“瑣事”，而是工廠生活中巨大和典型的缺點，這種揭露是以特別突出的事實作為例證的，所以它們能夠使全體工人和所有領導運動的人都感覺興趣，能够真正充實他們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能够開始喚醒新的地區和新的行業的工人。

“其次，在地方報紙上能把工廠當局或其他當局的一切醜惡勾當都就地拿獲，立刻揭露。等到一個消息傳至遠在異地的全國性報紙的時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記了！‘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咳，記不起来了！’”（同上）。是呵，記不起来了！我們又從這同一個材料中知道：兩年半所出版的三十號報紙是在六個城市里印行的。這就是說，一個城市平均半年出版一號報紙！即使我們的這位輕浮的政論家在自己的設想中把地方工作的生產率提高兩倍（這對中等城市來說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在手工業方式範圍內是無法大大提高生產率的），——那末結果也不過是兩個月出版一號，也就是說，根本算不得什麼“就地拿獲”。但是，如果十個地方組織聯合起來，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積極辦理一個全國性報紙，那就可以每兩星期把全俄各地發生的一些並非細小的瑣事而是真正顯著的典型的丑惡現象“拿獲”一次。這是任何一個熟悉我們各地組織中的實際情況的人都不會懷疑的。至於就地拿獲敵人，假使我們是講正經話而不是空口說白話，那就根本不是秘密報紙所能做到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只有通過暗中散發的傳單才可以做到，因為實行這種拿獲的最長期間往往是不超過一兩天時間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罷工，或工廠中的格斗事件，或示威游行等等）。

“工人不僅是在工廠內生活，並且是在城市內生活”，——我們的這位作者繼續寫道，他用一種甚至波利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徹底性從局部問題談到了一般問題。於是他就指出關於城市杜馬、城市醫院、城市學校等等的問題，並要求工人報紙干預一般城市的事情。這個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別明顯地表明人們在談論地方報紙問題時往往是單以一種空洞的抽象見解為限。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點”都出版辟有“自由”雜誌所想的那樣詳細的本城消息專欄的報紙，那末這在我們俄

國的條件下，就不免要變成地道的舍本逐末習氣，不免要削弱人們對於必須向沙皇專制制度舉行全俄的革命攻擊這一點的認識，不免要使因為說過一句責備革命家的名言，即責備他們關於並不存在的議會談得太多、關於已經存在的城市杜馬講得太少而出名的那個派別的幼芽加強起來；這種幼芽還很有生命力，它只是暫時隱藏起來或者被壓抑下去，但還遠沒有連根拔除。我們所以說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雜誌顯然並不願意有這種結果，而願意有相反的結果。可是，只有善良的願望是不夠的。為了使對於城市的事情的說明符合我們全部工作的方向，首先就要不是單用一些推論，而且根據許多實例把这个方向完全明確地規定下來，使它成為堅固的傳統。我們現在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我們却首先要做到，然後才能想到和談到廣泛的地方報刊的問題。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寫城市的事情，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單從書本上了解這些事情。但具有這些知識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全俄差不多是根本沒有的。要在報紙上（而不是在通俗的小冊子上）敘述城市的和國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鮮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起來並且整理過的材料。而為了收集和整理這樣的材料，靠原始的小組中所實行的那種“原始的民主”，即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公決制的兒戲作為消遣的民主，當然是不夠的。為此就需要有專門作家、專門通訊員所組成的大本營，需要有社會民主黨人記者的隊伍，這些記者到處建立聯繫，善于打聽各種各樣的“國家秘密”（俄國官吏時常以這種秘密自傲，而且時常隨便將它們泄露出來），善于钻到各種各樣的“幕後”里去，——需要有“因職務關係”而必須無孔不入和無所不曉的人所組成的隊伍。我們這個反對任何經濟、政治、社會和民族壓迫的政黨，能夠而且應當去找到、召集、訓練、動員並調動這支無所不曉的人所組成的

军队去作战，——但这一切都是还有待于我們去做的事！我們在絕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沒有采取任何步驟，甚至常常沒有認識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們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生动有趣的論文、通訊和揭露我国外交、軍事、教会、市政、財政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文章，那末你們會发现这样的文章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說是絕无仅有①。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些非常漂亮动听的話”，說什么必須“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出版一个揭露工厂方面、城市方面以及国家方面一切丑恶現象的報紙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可能是貧乏的表現，也可能是富裕的表現。当运动还没有創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瑣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貧乏的表現。而当运动已經完全能够执行全面的揭露和全面的鼓动工作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許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地方報紙占优势的情况究竟是表明什么，这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結論确切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誤解。我們的大多数地方組織到現在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是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恰巧相反：大多数地方組織主要应当关心全俄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的机关报工作。

① 所以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們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是一个很好的報紙，它在原則坚定性方面是完全无可非議的。但是，它想給予地方运动的东西却因出版次数很少并且常常遭到大規模的破壞而沒有做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則上提出运动的根本問題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動的工作，是这种地方机关报所不能胜任的。而它所提供的特別好的东西，如論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論失业等等問題的文章，却又不是一种純粹地方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不只是南俄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們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从来没有見到过。

在沒有做到這一點以前，我們就辦不成任何一個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的鼓動來真正幫助運動的報紙。而如果能够做到這一點，必要的中央機關報與必要的地方機關報之間的正常關係就會自然建立起來。

* * *

初看起來，關於必須把工作重心從地方工作轉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結論，似乎是不能適用於專門經濟鬥爭的範圍的，因為工人在這裡直接遇見的敵人乃是單個的企業家或單個的企業家集團，這個敵人沒有結成牢固的組織，絲毫不像我們在政治鬥爭中直接遇見的敵人，即俄國政府那樣擁有十分集中的、連綴瑣碎的事情都由統一的意志來指揮的純粹軍事組織。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們已經屢次指出：經濟鬥爭是一種職業性的鬥爭，因此它需要按工人的職業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點聯合起來。我國的企業主越是迅速地聯合成為各種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這種職業性的聯合也就越加迫切必要。我們的分散狀態和手工業方式直接妨礙著這種聯合，因為這種聯合必須有能夠領導全俄一切工會的全俄統一的革命家組織。我們上面已經講過為此目的所應當建立的那種組織，現在我們只想在談我們的報刊問題時補充几句。

在每個社會民主黨報紙上都應當有職業性的鬥爭（經濟鬥爭）欄，這大概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但是工會運動的增長，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會報刊的問題。然而我們覺得，除了極少的例外，在俄國暫時還談不到工會報紙的問題。這是一種奢侈品，而我們往往連糊口的面包都沒有。在我國，適合於秘密工作條件並且現在已成為需要的工會報刊形式，應當是工會小冊子。在這種小冊子里，應當把一切說明本行業的勞動條件，本行業的勞動條件在俄國各個

地方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关于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公开的^①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地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记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职业性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职业性斗争的經驗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我们收集起来的那些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而这些材料现在却简直散失在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里；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区纺织工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

① 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像“工人思想报”所发表的那些问题的秘密材料，就会大大地浪费革命家的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是能够很容易地代替革命家的），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的某一部分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标准，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多半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与专门论述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局等等方面的出版物上面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那个“初次的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情形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往往在我们谈话结束时一面擦汗，一面对我微笑地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加点还难！”

我们越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会越加迫不得已而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某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关于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較高、劳动条件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別的地方的工人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担负起最先把工会斗争綜合起来的责任，并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加强，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們的工联工作在我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組織，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組織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說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組織由于具有坚定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動員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正确的比例时就永远不会感到困难。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波·克里切夫斯基責备我們有“使理論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的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30頁），“‘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錯誤就是它那个全党組織的‘計劃’”（即“从何着手？”一文①）。馬尔丁諾夫也附和他說：“‘火星报’有輕視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輝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結果就在第4号上所載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組織計劃”（同上，第61頁）。最后，尔·納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計劃”（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計劃的諷刺）表示憤懣的人們。我們刚收到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們已說过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其中說道：“現在來談什麼以全俄報紙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脫離實際的思想和脫離實際的工作”（第126頁），就是“文人习氣”的表現等等。

我們的恐怖主義者和“日常的平凡的鬥爭進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這並不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我們在前面談到政治和談到組織的那兩章里已經考察過他們這種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我們也應當立刻指出：爾·納杰日丁，並且只有他一個人，打算誠心誠意地來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歡的這篇文章的內容，打算從實質上回答這篇文章，——而“工人事業”雜誌卻沒有從實質上講過任何一句話，只是極力用一大堆無聊的蠱惑人心的胡言亂語來模糊問題。於是，無論我們怎樣不願意，也不得不費些時間來首先打掃一下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①。

（一）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

讓我們把“工人事業”雜誌用來攻擊我們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嘆詞句摘錄一下吧。“並不是報紙能夠建立黨的組織，而是相反……”“一個站在黨的上面、不受黨的監督、因擁有自己的代办員網而離開黨獨立存在的報紙……”“為什麼‘火星報’居然忘記了它自己所屬的那個黨內實際存在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呢？……”“擁有固定的原则和相應的計劃的那些人，同時也就是全黨的實際鬥爭的最高支配者，他們可以命令全黨去執行他們的計劃……”“這一計劃把我們的生動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組織都趕入陰間，而想把一個幻想性的代办員網呼喚到人世上来……”“‘火星報’的計劃如果得到實現，結果就會連我們這個已在形成起來的俄國社會民主

① 希臘神話中說，奧吉亞斯的牛圈三十年來沒有打掃，後來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內打掃。意思是指極骯髒、極污臭的地方。——譯者注

工党的痕迹都扫除净尽……”“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們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編輯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讀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內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自己抱不平，而是为我们党的那些組織和委員会抱不平，因为據說“火星报”想把它們赶入阴間，甚至想連它們的痕迹都扫除干净。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杂志上的那些論文发表于1901年9月，而現在已經是1902年1月中了。在这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沒有一个委員会，也沒有一个組織提出过正式抗議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員会和各个組織都赶入阴間的恶魔！同时，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也无论是在許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都又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通訊。为什么人家想把他們赶入阴間的那些人居然沒有觉察到这一点，沒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員会以及其他組織都在进行真正的事业，而沒有玩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員会都讀过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組織的計劃，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組織”的一种尝试，同时它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沒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計劃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們也就自然沒有想到要因为有人在“火星报”上擅敢說出下面的話而“生气”：“鉴于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給同志們提出一个計劃草案來考慮，关于这个計劃，我們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里將作詳細的發揮。”如果同志們采納這個提供他們考慮的計劃，那末他們執行這個計劃就不是由於“被迫服從”，而是由於相信它是我們的共同事業所必需的；如果他們不采納這個計劃，那末這個“草案”（這是個多么狂妄的字眼啊！）就會始終不過是個草案，——難道這不是每個誠懇地對待問題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嗎？如果在攻擊一個計劃草案時不只是“譴責”這個計劃並勸同志們拒絕這個計劃，甚至唆使那些對於革命工作很少有經驗的人去攻擊計劃起草人，而所以實行攻擊，又只是因為這些起草人擅敢“立法”，擅敢充當“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個計劃草案，——難道這不是一種蠱惑人心的手段嗎？如果人們對於那種想把地方活動家提高到更廣闊的見解、任務、計劃等等的水平上來的企圖提出反駁，並不只是由於自己認為這種見解不正確，而且還由於有人“想”把我們“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試問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能够發展，能夠前進嗎？爾·納杰日丁也曾經“譴責”過我們的計劃，然而他並沒有使用不能單用政治見解的幼稚或粗淺來解釋的蠱惑手段，他從一開始就堅決排斥了所謂“監督全黨”這種罪名。因此談到納杰日丁對於計劃所作的批評時，我們可以並且應當從實質上給以回答，而談到“工人事業”雜誌所提出的批評時，我們却只能以鄙視作為回答。

雖然我們對於一個墮落到叫喊什麼“專制”和“被迫服從”的作家應當表示鄙視，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因此就不必去澄清這種人提供給讀者的糊塗觀念了。只有澄清這種糊塗觀念，我們才能使大家明白認識，這種空談“廣泛民主制”的时髦詞句究竟是怎樣一種貨色。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忽略了各個委員會，說我們要想或企圖把它們趕入陰間等等。既然我們迫於目前秘密工作的條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們同各個委員會之間的真實關係的事實都不能

向讀者說明，試問我們怎么來回答這種責難呢？那些信口提出一種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責备的人，居然走到我們前面去，這只是因為他們无所顧忌，因為他們根本輕視革命者必須把自己所擁有、所建立或力圖建立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联系都仔細地隱藏起來的責任。所以，我們也就根本拒絕在“民主制”方面去同這班人競爭。至于說到那些對黨內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讀者，那末我們執行我們對這種讀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敘述現有的情形和處于 *im Werden*^① 的情形，而是敘述一小部分已經過去、因而可以當做已往的事實來敘述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稱王稱霸”^②，國外“聯合會”責備我們企圖連党的痕迹都掃除干淨。好吧，諸位先生。我們只要向讀者敘述一下已經過去的四件事實，就能使你們心滿意足了。

第一件^③事實。一個“鬥爭協會”中的直接參加過我們黨的成立以及直接參加過派代表出席黨的成立大會的幾位會員，曾經同“火星報社”的一個成員商定，要出版一套適應全部運動需要的工人叢書。出版工人叢書的計劃沒有實現，但是為這套叢書而寫的兩本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和“新工廠法”^④却幾經轉折由第三者帶到國外去出版了⁴¹。

第二件事實。崩得中央委員會的幾個委員向“火星報社”的一個成員建議共同成立一個像崩得當時所說的“著作實驗所”。同時他們還說，假如這件事情辦不到，那末我們的運動就會大大退步。

① 生長過程中。——編者注

② “火星報”第8號上俄波猶太工人總聯盟中央委員會對我們論民族問題一文的答辯。

③ 我們故意把這些事實列舉得與它們實際發生的次序不一樣⁴⁰。

④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79—302頁和第228—271頁。
——編者注

談判的結果是寫出了“俄國工人的事業”這本小冊子①。

第三件事實。崩得中央委員會通過一個外省市鎮組織來向“火星報社”的一個成員接洽，說要請他負責編輯準備復刊的“工人報”，結果當然是獲得了同意。後來這一建議有所改變，改成了請他撰稿，因為關於編輯人員的問題又有了新的安排。這一提議當然也獲得了同意⁴²。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幾篇論文（這幾篇論文的稿子保存下來了）：“我們的綱領”——內容是直言不諱地聲討伯恩施坦主義，反對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報”上所表現的轉變；“我們的當前任務”（要“創辦一個正常出版而與一切地方團體密切聯繫的全黨機關報”；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業方式”的弊病）；“迫切的問題”（批判認為在着手出版共同機關報以前必須先發展各個地方團體的工作這種反駁意見；堅決認定“革命組織”有頭等重要意義，認為必須“使組織、紀律和秘密活動技術達到最完善的地步”）^②。“工人報”復刊計劃沒有實現，於是這幾篇論文也就沒有發表。

第四件事實。一個委員會中的一個負責籌備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委員，把大會的會議計劃通知“火星報社”的一個成員，並推舉該社為預備復刊的“工人報”的編輯候選人。他採取的這個所謂預備步驟，隨後又經他本人所屬的那個委員會以及崩得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⁴³；“火星報社”接到了關於大會召集地點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於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參加這次大會，于

① 順便說說，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托我代他聲明一句，說他這本小冊子的手稿也像他先前所寫的幾本小冊子的手稿一樣是寄交“聯合會”的，因為他以為“聯合會”的出版物仍由“勞動解放社”編校（由於某些條件，他在當時，即在1899年2月間還不能知道編輯人員變更的事實）。這本小冊子很快就会由同盟負責重版。

②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86—190、191—195頁和第196—200頁。——編者注

是就也写了一个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思想，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們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不能解决統一問題，并且可能会动摇建党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現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获；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員會及其他一切組織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員會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全部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員會所培养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各委員會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員會了。可是，代表大会因为有几次破获事件发生而沒有召集成功，这个报告也由于必須保守秘密而被銷毀了，讀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包括一个委員會所派出的几位全权代表在內。

現在請讀者自己來判断一下，像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稱王称霸，或者“工人事業”杂志硬說我們想把各个委員會赶入阴間，想用传播一个報紙的思想的組織来“代替”全党的組織这样一些手段，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吧。其实，我們向各个委員會作報告，說必須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計劃，这正是按照各个委員會再三提出的請求。我們在寄給“工人報”发表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報告中發揮這個計劃，正是为了全党的組織，并且我們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如此有影响的，即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們党的責任的人們提出的請求。只是在黨組織和我們一同來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 尝試都遭到失敗以后，我們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責任創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使得同志們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實驗結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猜測。現在这一實驗所提供的某些結果已經是有目共睹了，所以現在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們對我們應尽的責任了解得究竟是不是正确，都能判断那些

因為我們指出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民族”問題上的不彻底以及另外一些人產生不可容忍的無原則的動搖而對我們懷恨在心，因而企圖把一些不了解不久以前的情形的人引入迷途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了。

(二)報紙能不能成為集體的組織者？

“從何着手？”一文的全部要點，就在於提出這個問題並且給以肯定的回答。我們知道，只有爾·納杰日丁一個人曾經企圖從實質上分析這個問題，並企圖證明必須給以否定的回答。我們現在把他的論據全部引錄如下：

“……我們很喜歡‘火星報’（第4號）提出必須創辦全俄報紙的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同意說這種提法與‘從何着手？’一文的標題是適合的。這當然是一種極重要的工作，但是能奠定革命時期的戰鬥組織的基礎的並不是這種工作，並不是一大批通俗傳單，並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須在各地着手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我們還沒有這種組織，我們過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進行工作，而群眾差不多只是進行了經濟鬥爭。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即使有辦得很好的全俄報紙，又有什么意思呢？自焚樹老是在那裡燒着，總燒不完，但是它也燒不着任何人！‘火星報’以為人民一定會在全俄報紙的周圍，在建立全俄報紙的事業上集合起來，組織起來。其實，人民在更具體的事業的周圍是會更親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來的！可以而且應當成為這種事業的，就是普遍創辦地方報紙，立刻準備工人力量去作示威遊行，由地方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間經常進行工作（經常在他們中間散發傳單，召集他們開會，号召他們反抗政府，等等）。我們要在各地着手進行生動的政治工作，而當在這個實際的基礎上的統一成為必要的時候，那它就不再是人為的統一，不是紙上的統一了。這樣把各地方的工作統一成為全俄的事業的任務，決不是報紙可以辦到的！”（“革命前夜”第54頁）。

我們在這一大段雄辯的議論中加了着重號的那些字句，最突

出地表明了該文作者无论对我们的計劃的估計，或者他在这里拿來与“火星报”对立的一般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有办得极好的全俄報紙也沒有什么意思。——这話完全正确。但問題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說明它的“計劃”以前所做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須“号召建立革命組織，使它 不仅在名义上 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統一一切力量，領導运动，即 随时都能有准备地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发动，利用它們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軍事力量”。現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火星报”繼續写道，——在原則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問題，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設計劃，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設。但人們又把我們拉向后退，使我們离开实际解决問題的事情，轉回去空談那个原則上正确的、不容置辯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为广大工作人員所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組織”！可敬的作者呵，現在問題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組織！

“我們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經濟斗争”这个說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說法同“自由”杂志上常見的、把有知識的工人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那种根本錯誤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們的有知識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經濟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帮助有知識的工人和知識分子 把自己培养成 政治斗争的領導者，那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領導者，又只有依靠經常和随时估計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計各个階級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

以，一方面說“培植政治組織”，同时又把政治報紙的“紙上的事業”同“各地方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計劃”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計劃”，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騷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絕大多数地方組織連想也沒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許多是任何一个組織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而当有人例如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知識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緒增长的事实时，納杰日丁（他說，“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派办的嗎？”——“革命前夜”第129頁）、經濟主义者（“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以及許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喚起人們想到这一切，喚起人們来归纳和綜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現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經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銷的全俄報紙不可。

把“火星报”的“計劃”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現的人，完全不懂得計劃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沒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說明了这个計劃的比喻。創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曾經写道，——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組織（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組織）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綫索。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未見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綫来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終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們相互衔接起来，形

成一座完整而統一的大廈的輪廓，請問，這算不算是“紙上的”事情呢？目前我們黨的生活的狀況，豈不正是既有石匠，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條使大家都能看得見，使大家都可以把握住來進行工作的引綫嗎？讓他們去叫喊，說我們拉一根引綫就是想發號施令吧！先生們，假使我們真想發號施令，那我們就不要標明為“火星報”第1號，而會標明為“工人報”第3號了，——有些同志曾經勸我們這樣做，並且我們在上述那些事件發生後本來是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的。但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想使自己的雙手不受束縛，以便同一切假社會民主黨人作不調和的鬥爭；我們當時希望，——如果我們的引綫拉得正確的話，——人們尊重這條引綫是因為它拉得正確，而不是因為它是由一個正式的機關報拉的。

爾·納杰日丁教訓我們說：“把地方活動統一到中央機關里來的問題，真是在迷宮里兜圈子；要造成統一，就需要成分一致，而這種一致又只能由某種具有統一作用的東西才可以造成，但這種具有統一作用的東西，又只能是強有力的地方組織的產物，而目前各個地方組織又是並不一致的。”這個真理，也像什麼要培植強有力的政治組織的真理一樣可敬，一樣不容置辯，而又一樣沒有意義。任何問題都可以說是“在迷宮里兜圈子”，因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無窮無盡的環節組成的一條無窮無盡的鏈條。政治家的全部藝術就在於找到並且緊緊掌握住最不容易從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個鏈條的那個環節^①。假使我們有一大堆老練的石匠，能夠彼此非常協調地工作，

① 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馬爾丁諾夫同志！請你們看看“專制”、“不受監督的權威”、“最高支配權”等等的這種可惡的表現吧。你看，有人竟想掌握整個的鏈條！！趕快寫一份控訴書吧。“工人事業”雜誌第12期可以用這個現成的題材發表兩篇社論了！

即使没有什么引綫，也能把石头放置在适当的地点（抽象地說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末我們也許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是不幸我們現在還沒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非常協調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放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总的引綫來放，而是放得乱七八糟，敌人很容易就能把它們拆散，好像这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堆沙子。

第二个比喻：“報紙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員和集体的鼓動員，而且是集体的組織者。就后一点來說，可以把報紙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輪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之間的来往，帮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績。”^①这岂不像是文人，像是坐在书房里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嗎？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很差的材料搭起来的；它只使用一个很短的时期，只要建筑大体完成，人們就会把脚手架拆掉当柴烧的。至于革命組織的建筑問題，那末經驗證明，有时候即使沒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七十年代的情形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現在，我們沒有脚手架便根本不能建筑起我們所需要的房屋。

納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說：“‘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報紙的周围，在建立全俄報紙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組織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来的！”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俄国有句俗語說：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許要喝的。但是也有人甘願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大的具体性，我們的那

^① 馬尔丁諾夫在“工人事业”杂志上引证了这段話的第一句（第 10 期第 62 頁），而恰巧不引第二句，好像是要借此着重說明他不願意触及問題的实质或者不能了解这个实质。

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竟說出了多么恶劣的話呵！你看，我們的全部运动已被我們的狹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懦心理压抑到何等地步，竟然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种現象辯护！納杰日丁自以为对“生活”特別敏感，他特別严厉地斥責“坐在书房里的”人，責备（自以为很聪明地責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做經濟主义，他自以为是比正統派和批評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不知道他提出这些論据只是帮助了使他感到憤慨的那种狹隘性，只是喝着吐滿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沒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像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乱搞“土地恐怖”，乱敲“警钟”等等，那末，即使他极其誠愚地对狹隘性表示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狹隘性的人們拯救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請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 地方報紙；2. 准备示威游行；3. 在失业工人中間进行工作。一眼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來說明什么問題的，因为无论我們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如果想要把它们看做什么特別适于“集合和組織”人民的东西，那都是荒謬的。我們知道，同是这位納杰日丁，在兩頁以后又这样說道：“現在我們应当简单地指出一件事实：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員會甚至沒有做到它們所能够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現在我們所有的那些应当負起統一的責任的中央組織却只是一种虛构，是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是互封領袖的把戏，并且在强有力的地方組織沒有成长起来以前，这种情形是不会消灭的。”这些話里面有很多夸张之处，同时，无疑也含有許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納杰日丁竟看不見，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的事实，是与那些局限于地方組織范围内的活動家的眼界狭小

和活動規模狹小的現象(這在缺乏修養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聯繫嗎？難道他也像“自由”雜誌上那篇論組織問題的文章的作者一樣，忘記了隨着轉向廣泛的地方報刊的工作(從1898年起)，經濟主義和“手工業方式”也特別加強起來的事實嗎？即使“廣泛的地方報刊”的工作能夠做得比較令人滿意(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除掉極個別的特殊情況之外，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地方機關報也還是不能“集合和組織”革命家的一切力量去對專制制度發動總攻，去領導統一的鬥爭。不要忘記，這裡所談的只是報紙的“集合”作用，組織作用，所以我們也可以請維護分散狀態的納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個諷刺性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從什么地方得到二十萬個革命組織人材這種遺產呢？”其次，“火星報”的計劃正是把最廣泛的示威遊行當做目標之一，所以決不能把“準備示威遊行”同“火星報”的計劃對立起來；而問題却在於選擇實踐的手段。在這裡，納杰日丁又弄糊塗了，他不知道只有已經“集合和組織”起來的軍隊才能“準備”示威遊行(示威遊行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都是自发地進行的)，而我們現在正是不善于把軍隊“集合和組織”起來。“在失業工人中間進行工作”，——這是同樣的糊塗觀念，因為這個工作也是已經動員起來的軍隊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是動員軍隊的計劃。納杰日丁在這裡怎樣忽視我們的分散狀態的危害性，怎樣忽視我們缺乏“二十萬個人材”的事實——這從下面一件事實中便可以看出来。許多人(包括納杰日丁在內)責備“火星報”，說它關於失業工人的消息登載得太少，說它關於農村生活只是間或登載了一些說明極平常的現象的通訊。這種責備是正確的，但是“火星報”在這方面真是“無辜的罪人”。我們也曾經極力想把“引線拉到”農村去，但是那里差不多根本沒有石匠，於是我們只好鼓勵每一個甚至只告訴我們一些平常事情的人，我們希望這樣會

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的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們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将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綜合起来，那就完全沒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当然，多少具有像納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关于游民生活的知識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間进行的鼓动工作来为运动作出极宝贵的貢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設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訴 全体 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給他們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沒了自己的天才。

現在的确所有的人都在談統一的重要性，都在談“集合和組織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們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这种統一的問題却往往沒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們要把一个城市中的单个的——假定是区的——小組“統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說，不仅要有共同的“联合会”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換材料、經驗和人員，不仅要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范围內的各种专门工作来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关所要花的“本錢”（当然是指物力和人力两方面而言）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名詞来表示的話），同时，专门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場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像一个地区这样的場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經有过这样显得过分狭窄的情形。这一点我們在上面已經用政治鼓動和組織工作方面的例子詳細地证明过了。必須，絕對必須而且首先必須扩大这个場所，以經常的共同的工作为基础来建立各个城市間的 实际 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們，使他們“好像是坐井观天”（用寄給“火星报”的一封信上的說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可以

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經驗，怎样滿足从事广泛活动的願望。所以，我要繼續坚持說：这种 实际 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報紙才能着手建立起来，因为这种報紙将成为唯一經常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綜合起来，因而推動人們沿着 所有的 許許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正像条条道路通羅馬一样——不断前进的全俄的事业。假如我們不只是口头上說願意統一，那我們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組立刻分出比方說四分之一的力量来积极参加共同的事业，而報紙立刻就会向它^① 指明这个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表現得最厉害，什么地方缺乏鼓动工作，什么地方联系不够，在这个总的巨大的机器中有哪些小的輪子是自己这个小組能够加以修理，或者拿更好的輪子加以替换的。現在還沒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尋工作来做的小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一个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的总的状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一个广泛的事业（它反映着对专制制度举行的总的革命进攻）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輪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們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們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

单是推銷報紙的工作（假使这个報紙真是名副其实，即經常出版，它不是像厚本的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版四五次），就能开始把 实际 联系建立起来。現在，各城市之間因革命事業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罕見的事情，至少是例外的事情；而到那时

① 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該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該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并不只是把这种参加了解为参加文字工作，而是了解为一般地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話。专门給“工人事業”杂志做个注解：在重視事业而不是重視民主制的儿戏，并且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具体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候，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見的事情，它自然不仅能保证报纸的推銷，并且还能保证（这是更重要得多的）經驗、材料、人員以及經費的交流。那时候，組織工作的規模就会馬上扩大許多倍，某一个地方的成功就能經常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要求利用現成的經驗。那时候，地方工作就会比現在丰富而完备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經濟揭露材料，将成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的精神食糧，将供給我們許多材料和机会来举行关于各种各样的問題的談話和讲演，同时，合法刊物上的种种暗示，社会中的种种議論，政府机关“羞羞答答地”公布出来的种种消息，也往往提出这样的問題来。那时候，每一次发动，每一次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評判和討論，会使大家都不願意落后于別人而要求比別人做得更好，——（我們社会主义者並不籠統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了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考虑改变进攻計劃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引起現在常有的情形，即每一次示威或每一号地方报纸都往往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最后掙扎的”地步，使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要查明“根子”就会困难得多，它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查；另一方面，經常的共同的工作能使人們习惯于把每一次进攻的力量与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現在，差不多誰也沒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使得不仅书刊，就是革命工作人員也容易从別地“調遣过来”。

現在这些工作人員往往是完全消耗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較有才干的鼓動員或組織員从甲处調到乙处。人們起初是为了党的事情，用党的經費作短程

的来往，后来他们就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們真能使所有的或絕大多数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团体和小組都來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末我們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創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經常銷行于全俄各地。这个報紙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那时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細微、但是經常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的周围，就会有系統地挑选和訓練出一支由久經考驗的战士組成的常备軍。在这个共同組織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們的革命家中間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鮑夫，从我們的工人中間提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們会率領那已經动员起来的軍队，喚起全体人民去鏟除俄罗斯的可耻的、可詛咒的制度。

這是我們应当幻想的事情！

* * *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統一代表大会”的会場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編輯和撰稿人。这时馬尔丁諾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向我质問道：“請問，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員會請示，自主的編輯部有权去幻想嗎？”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用哲学家的态度来加深早已加深了普列汉諾夫同志的意見的馬尔丁諾夫同志的意見）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說道：“我进一步問你，如果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沒有忘記，照馬克思的意見，人类始終只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沒有忘記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那末从根本上來說，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問題，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

起来。我就試試躲在皮薩列夫背后吧。

皮薩列夫在談到幻想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的問題時寫道：“有各種各樣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趕過事變的自然進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變的自然進程始終達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種情形下，幻想是絲毫沒有害處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強勞動者的毅力……這種幻想中並沒有任何會敗壞或者麻痺勞動力的東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這樣來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間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像力來給剛剛開始在他手裏形成的作品勾畫出完美的圖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設想，有什么刺激力量會驅使人們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方面從事廣泛而艱苦的工作，並把它堅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細地觀察生活，把自己觀察的結果與自己的空中樓閣相比較，並且總是認真地努力實現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就絲毫沒有害處。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聯繫，那幻想決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⁴⁴

可惜的是，這樣的幻想在我們的運動中未免太少了。對這種情況應當負最主要的責任的，是那些以頭腦清醒和“熟悉”“具體情況”自夸的合法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尾巴主義”分子。

(三)我們需要什樣樣式的組織？

讀者從上文中可以看到，我們的“計劃策略”是反對立刻号召舉行衝擊，而主張“正規地圍攻敵人的要塞”的，換句話說，是主張用全力來集合、組織和動員常備軍的。我們因為“工人事業”雜誌從經濟主義跳到高喊（1901年4月在“‘工人事業’附刊”第6期上）衝擊而嘲笑了它，於是它也就極力攻擊我們，罵我們是“學理主義”，罵我們不懂革命的職責，罵我們不該号召大家謹慎從事，等

等。当然，从一些毫无原則、只会用深奥的“过程策略”支吾搪塞的人口里发出这样的責备，是絲毫不会使我們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綱領原則和策略原則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視态度的納杰日丁重复这种責备，也是絲毫不会使我們惊奇的。

據說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納杰日丁却拚命想重演历史，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罵“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別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記了一句名言：如果說历史事件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末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⁴⁵。用特卡乔夫的宣传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經是輝煌壮丽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組織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別可笑了。

納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見，这一切（像“火星报”第7号上所載的一位工人的来信等等現象）是一种征兆，它說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現在（原文如此！）來談什么以全俄報紙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你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塗观念：一方面，认为人們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報紙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起来，同时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和“組織中等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現在”來談全俄的組織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接更简单些讲，就是“現在”已經太迟了！請問最可敬的尔·納杰日丁，“普遍地創办地方報紙”，現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請把这一点与“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是句空話，至于說什么只是組織中等人和普遍創办地方報紙，这就无异是替經濟主义大开方便之門。其实，現在应当談的是統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組織，并且一直到真正的——不

是紙上的——衝擊開始以前，談這個組織都不算遲。

納杰日丁繼續說道：“的確，我們在組織方面的情形非常不好。‘火星報’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願兵和起義者，這話完全正確……你們很清醒地估計我們的實力，這是很好的。但同時你們為什麼忘記，群众并不是我們的，因此他們不會來向我們請示什麼時候開始軍事行動，而會自動地‘騷亂起來’的……群眾自己帶着自发的破壞力量發動起來，就可能擾亂和排擠開我們一直預備把極有系統的組織性灌輸進去，但到現在還沒有來得及灌輸進去的那個‘常備軍’。”（着重號是我們加的）

真是奇怪的邏輯！正因為“群眾不是我們的”，所以現在高喊“衝擊”是不聰明和不體面的，因為衝擊是常備軍的攻擊，而不是群眾的自发的爆發。正因為群眾可能擾亂和排擠開常備軍，所以我們定要趕快把“極有系統的組織性灌輸”到常備軍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來得及”趕上自发的高潮，因為我們越能“來得及”灌輸這種組織性，就越能使常備軍不被群眾所擾亂，而走在群眾前面，領導群眾。納杰日丁所以糊塗，是因為他以為這種有系統地組織起來的軍隊所從事的是一種使它脫離群眾的工作，而事實上，它所從事的却正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全面的政治鼓動，也就是一種使群眾的自发的破壞力量與革命家組織的自觉的破壞力量互相接近和溶為一體的工作。先生們，你們真是嫁禍于人，因為正是“自由社”自己把恐怖手段寫在綱領中，也就是号召建立恐怖主義者的組織，而這種組織確實會使我們的軍隊不去同群眾接觸的，可惜這些群眾還不是我們的，可惜他們還不向我們或者很少向我們請示什麼時候和怎樣開始軍事行動。

納杰日丁繼續恐吓“火星報”說，“我們會把革命本身也錯過去的，就像我們把目前這些簡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錯过去了一樣。”我們把這句話和我們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話聯繫起來觀察一下，就

可以明白知道，“自由社”臆想出来的所謂特殊的“革命前夜的观点”^①是很荒謬的。照直說来，特殊的“观点”就是认为“現在”来推論和准备已經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問問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 132 頁“論述理論問題^② 与策略問題”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 132 000 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錯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工作放在自己全部綱領、策略和組織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以全国報紙为中心来掌握組織綫索的那些人，不仅沒有把春季的事件錯过去，反而使我們能預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 13 号和第 14 号上所記載的那些示威游行，他們也沒有錯过去。恰恰相反，他們參加了这些示威游行，他們切实感觉到自己有責任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報紙来帮助一切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示威游行并利用它們的經驗。只要他們活着，他們就不会把革命錯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們善于进行鼓动工作，要我們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議，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它既不为朋友的錯誤所牽累，又不为敌人的詭計所陷害！

于是我們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說明我們为什么

① “革命前夜”第 82 頁。

② 順便說說，尔·納杰日丁在他的“理論問題評論”中，差不多沒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論問題的东西来，只是說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議論：“在我們所处的时期，整个伯恩施坦主义都已經沒有什么迫切意义了，正好像是阿达莫維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隕退也好，或者是反过來說，司徒卢威先生能够駁倒阿达莫維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 110 頁）尔·納杰日丁的极端忽視理論，在这里是表現得再明显不过了。我們既然已經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正統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評派，那是“毫无关系的”！我們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們需要利用与批評派作理論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实践立場作坚决的斗争！

特別堅決主張圍繞着全俄報紙、通過一齊為共同的報紙而努力的辦法來建立組織的計劃。只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使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組織具有必要的靈活性，即能夠立刻適應各種各樣的迅速變化着的鬥爭條件，“一方面在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點的時候，善于避免同這個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敵人最難料到的地方和時間突然攻其不備”^①。專為應付爆發和街頭鬥爭，或者專為應付“日常的平凡的鬥爭進程”來建立黨的組織，將是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時刻進行平凡的工作，同時又應當時刻準備着應付一切情況，因為爆發時期轉變為平靜時期往往是幾乎無法預料的，而在可能預料的情況下，也不能利用這種預料來改造組織，因為這種轉變在專制制度的國家里發生得非常迅速，有時竟會由於沙皇的揚尼恰爾⁴⁶一個晚上的襲擊而發生。並且革命本身，也決不能想像為單一的行動（納杰日丁之類的人大概覺得就是這樣的），而應當看做是比較激烈的爆發時期和比較沉寂的平靜時期的幾次迅速交替的過程。因此，我們黨組織的活動的基本內容，這種活動的中心，應當是在最激烈的爆發時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靜時期都可能並且必須進行的工作，這就是闡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廣大群眾並在全俄範圍內統一起來的政治鼓動工作。在現代的俄國，沒有一個經常出版的全俄報紙，是

① “火星報”第4號所載“從何着手？”一文。“不站在革命前夜觀點上的革命文化派，是絲毫也不会因長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納杰日丁這樣寫道（第62頁）。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說：假使我們不能規定出一種預定要進行很長時期的工作，同時利用這種長期工作的過程，使我們黨在任何意外情況下，在事變進程無論怎樣加速的情況下，都能站在自己崗位上，履行自己的職責的政治策略和組織計劃，那我們就簡直會成為可伶的政治冒險主義者。只有從昨天起才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命的納杰日丁會忘記，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類的生活條件，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決不應該因長期工作的問題而“感到不安”。

絶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報紙周圍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組織，由这个報紙的工作人員（是按这个字的广义來說，即指一切为这个報紙工作的人）构成的組織，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看看我們时常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被全部破获的情形。在所有的地方組織缺乏一种共同的經常工作时，这样的破获事件往往使工作間断数月之久。如果所有的組織有一种共同的工作，那末即使遭到最厉害的破获，只要有两三个坚强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組同总的中央联系起来，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組甚至在目前也产生得很迅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获，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央建立联系了。

另一方面，再拿人民的起义來說。現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們应当想到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代表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們已經有了中央委員會，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絲毫結果的。相反，在办理和推銷共同的報紙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員网^①，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

① 哟，真糟糕！我又脫口說出了“代办員”这个使馬爾丁諾夫們的民主主义耳朵听起来很难受的可怕的名詞！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詞沒有使七十年代的卓越的活動家們感到委屈而使九十年代的手工业者們感到委屈呢？我喜欢这个名詞，因为它明白确切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員所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業，假如必須用另一个名詞来代替它，那我也許只会选定“工作人員”这个名詞，只是可惜这个名詞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个單事化的代办員組織。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瓦封領袖”的馬爾丁諾夫，尽可以不說“办护照的代办員”，而說“革命家护照供給事务局总办”等等。

行能够为它在起义时获得胜利提供最大保证的經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意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养成一种善于正确估計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定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組織都善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一政治問題、事件和变故有所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回答这些“变故”，——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組織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統一起来的最經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如果沒有这种联系，就沒有办法来集体討論起义計劃，并且沒有办法在起义前夜采取必須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步驟。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計劃”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像对它沒有仔細加以考慮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絲毫不忘記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計劃。

結 束 語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約十年，大致是 1884—1894 年。这是社会民主派的理論和綱領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思潮的人还寥寥无几。当时社会民主派是在沒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 1894—1898 年。这时社会民主派已經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現了。这是它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知識分子紛紛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紛紛到工人中去，工人紛紛热中于罢工，这种趋势像流行病一样迅速地传布开来。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績。大多数領導者都是些很年輕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紀”。他們因为年紀很輕，在实际工作方面缺乏修养，很快地就退出了舞台。但他們的工作規模大都是很廣闊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时，是抱着民意党的那种观点的。他們在少年时代，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行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須进行斗争，必須与那些始終坚持民意主义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閱讀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問題。在这个斗争中訓練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工人运动中去进行工作了，同时他們“一分钟”也沒有忘掉启发了他們的思想的馬克思主义理論以及推翻专

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天成立了党，这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件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我們已經看到，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而在1898年完全替代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代，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了不正的声調，这种声調一方面表現在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也夫等先生的著作中，另一方面表現在弗·伊一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的著作中。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走的只是領導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繼續增长，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間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領導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經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們差不多仅仅是靠“合法”馬克思主义的刊物教育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对他们的自觉性的要求越高，这样的刊物也就越加显得不够。領導者不仅在理論方面（“批評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运动的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响亮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性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出版合法书刊的布伦坦諾派和出版秘密书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Credo》綱領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讀者責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談得太詳細了，那我就要回答說，“工人事业”杂志所以具有“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①。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真正能够代表那种无论对“批評”、“經濟主义”或恐怖主义

都决心让步的态度的并不是彻底的尔·姆·，而是随风倒的克里切夫斯基們和馬尔丁諾夫們。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絕對原則”的崇拜者傲然輕視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与完全忽視理論的态度相結合。这个时期的英雄們所干的事情，与其說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說是把它們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經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論，而变成了人們“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滲进去的混合物；“階級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們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闊、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說“經濟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們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組織，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結，第四个时期（不管怎样，現在已經有許多征兆預示着它的到来）什么时候开始，——我們还不知道。这里我們已經从历史的領域进入現在的、一部分是將來的領域。但是我們深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馬克思主義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納，我們对于“怎么办？”这个問題，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結束第三个时期。

① 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諺語来回答：Den Sack schlägt man, den Esel meint man, 用俄国的諺語說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而且大批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論家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問題上顛三倒四，在对于我們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見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

附录^①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 实行统一的尝试

我們还要把“火星报”在組織方面对“工人事业”杂志所采取的并且一貫执行的策略說明一下。这个策略在“火星报”第1号那篇論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②的文章中，已經作了充分的說明。我們当时立即认定，由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为我们党的国外代表机关的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已經分裂成为两个組織，党的国外代表問題成了一个悬案，至于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由俄国方面选出两个代表，即由已經分成两部分的“联合会”中每一部分各选一人参加国际社会党常务局的事实，只是使这一問題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解决。我們已經声明，“工人事业”杂志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我們在原則上坚决地站在“劳动解放社”的一边，但我們同时拒絕考察分裂的詳細情况，并指出了“联合会”在純粹实际工作方面的功績^③。

由此可見，当时我們的立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观望等待的立場。我們对当时流行于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的意見作了一种让步，这种意見认为，最坚决反对經濟主义的人也可以去同“联合会”协力工作，因为“联合会”曾經屡次声明，說它在原則上同意“劳动解放社”的立場，說它在基本的理論和策略問題上并不想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39—340頁。——編者注

② 我們对分裂所做的这个估計，不仅是以我們所看到的书刊为根据，并且是以我們組織中某些到过国外的人在国外所收集的种种实际材料为根据。

具有什么独立的面目。我們所采取的这种立場的正确性，已經由下面這件事實間接証實，就是差不多正当“火星報”第1號出版的時候（1900年12月），有三個人退出“聯合會”而組成為一個所謂“發起團”，並向1.“火星報”組織國外部、2.革命組織“社會民主黨人”以及3.“聯合會”提出建議，說他們願意充當進行調解談判的中介人。前兩個組織馬上就對這個建議表示同意，第三個組織却表示拒絕。固然，在去年的“統一”代表大會上當有一個發言人敘述了這些事實的時候，“聯合會”的一個領導人曾經提出聲明，說他們對這個建議表示拒絕，只是由於“聯合會”不滿意這個發起團的成分。我認為我有責任把這種解釋講一下，但我却不能不指出，我認為這種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聯合會”既然知道兩個組織已經同意進行談判，那它是可以經過另一個中介人或者直接去同這兩個組織接洽的。

1901年春天，“曙光”雜誌（4月，第1期）和“火星報”（5月，第4號）都直接批評了“工人事業”雜誌^①。“火星報”特別激烈地抨擊了“工人事業”雜誌的“歷史性的轉變”，因為這個雜誌在它4月份的附刊上，即在春季事件已經發生之後，對醉心於恐怖手段和“流血的”号召的傾向表現了動搖。雖然遭到了這次批評，“聯合會”還是表示同意通過新的“調解團”來恢復調解談判。於是上述三個組織選出的代表在6月間舉行了預備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以極詳細的“原則協議”為基礎的協約草案，這個“原則協議”已經由“聯合會”在“兩個代表大會”一書中，由同盟在“‘統一’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一書中公布出來。

這個原則協議（或者像大家時常稱呼的：六月代表會議決議）的內容及其清楚地表明，我們當時提出了最堅決地排斥一般機會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主义以及俄国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現作为实行統一的必要条件。第1条写道：“我們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企图，这种企图的表現就是所謂經濟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等。”“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范围包括……同一切反对革命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思想斗争”（第4条第三项）；“社会民主党在一切組織工作和鼓动工作中，一分钟也不应当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推翻专制制度”（第5条第一项）；……“不仅要在雇佣劳动同資本的日常斗争的基础上进行鼓动工作”（第5条第二项）；……“不承认……純粹經濟斗争和为局部政治要求而斗争的阶段”（第5条第三项）；……“我们认为对于运动重要的是批評那些把运动的低級形态的原始性和……狭隘性推崇为……原則的思潮”（第5条第五项）。即使是和运动完全无关的局外人，只要他稍微仔細地讀过这些決議，他也能从它們的表述中看出，这些決議所反对的正是机会主义者和“經濟主义者”，正是那些即使只是一分钟忘記了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的人，正是那些承认阶段論，把狭隘性推崇为原則等等的人。誰只要稍微了解“劳动解放社”、“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对“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批評，那他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決議逐条驳斥的正是“工人事业”杂志所陷入的那些錯誤观点。所以，当“联合会”中的一个人在“統一”代表大会上提出声明，說“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上所載的論文并不是由于“联合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的轉变”，而是由于这些決議內容过分“抽象”^①所引起的时候，一个发言人就完全公正地譏笑了这种說法。这位发言人当时回答說，決議的內容不但不抽象，而且非常具体。只要把这些決議瞧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是“在捉什么人”了。

最后这句話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段頗能代表当时的情况的

① 这种斷語在“两个代表大会”第25頁上也重复說过。

插曲。一方面，波·克里切夫斯基馬上抓住了“捉人”這句話，認為這是把我們這方面的惡意（“布設陷阱”）泄露出來的一種失言，並高聲叫喊道：“究竟是在捉什麼人呢？”當時普列漢諾夫就以諷刺的口吻問道：“真的，是在捉什麼人呢？”波·克里切夫斯基當時回答說：“讓我們來幫不善猜測的普列漢諾夫同志猜測一下吧；我可以向他說明，這裡是在捉‘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全場哈哈大笑）。可是我們却並沒有讓人家把我們捉住！”（左边有人插嘴說：這對你們更不利！）另一方面，“鬥爭”集團（調解團）中有一个人在發言反對“聯合會”對決議所提出的修正時，想要替我們那位發言人辯護，他聲明說：“捉人”這個說法顯然是在進行激烈的爭辯時脫口說出的。

至于我，那末我認為，這種“辯護”對使用了這個說法的那位發言人是不利的。我認為“在捉什麼人”這個說法是“嘻笑說出而認真想過”的，因為我們向來都責備“工人事業”雜志立場不穩和態度動搖，所以我們當然是應當設法把它捉住，使得往後再不會有動搖發生。至於惡意是根本談不到的，因為當時問題關係到原則上的動搖。而我們終於用這樣一種同志態度^①“捉住了”“聯合會”，以至于波·克里切夫斯基本人以及“聯合會”的另一個領導人也對六月決議表示贊同。

“工人事業”雜誌第10期上所載的那些論文（我們的同志只是

① 其表現就是：我們在六月決議的導言中聲明說，俄國社會民主黨整個說來是一向就站在“勞動解放社”的原則基礎上的，“聯合會”的功績特別表現於它所進行的出版和組織方面的工作。換句話說，我們表示完全願意忘掉過去的一切，并承認我們那些參加“聯合會”的同志們所進行的工作有益處（對事業有益處），只要他們完全停止我們加以“捕捉”的那種動搖態度就行了。每一個公正的人，讀過六月決議以後，都只會這樣了解這些決議。如果目前“聯合會”用自己重新轉向經濟主義方面去的行為（第10期所載的論文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引起了分裂之後，鄭重其事地責備我們，說我們講這些承認他們的功績的話是撒謊（“兩個代表大會”第30頁），那末這種責備當然是只能令人發笑的。

已經到达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时候，即在代表大会开幕几天以前，才看到了这一期杂志）清楚地表明，在从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里，“联合会”中已經发生了新的轉变：經濟主义者又占了上风，隨“风”倒的編輯部又來为“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和“批評自由”辩护，为“自发性”辩护，并以馬尔丁諾夫为代表来鼓吹縮小我們的政治影响范围（據說是为了使这种影响复杂化）的“收縮論”了。这就又一次证明了帕爾烏斯所說的一句很中肯的話：要用什么公式去捉住机会主义者是很难的，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贊成任何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这个公式，因为机会主义就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堅定的原則。今天机会主义者排斥了任何灌輸机会主义思想的企图，排斥了任何一种狭隘性，冠冕堂皇地答應說“一分钟也不忘記推翻专制制度”，說“不仅要在雇佣劳动同資本的日常斗争的基础上进行鼓动工作”等等。明天他們又会改变說法，借口維护自发性，維护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提倡能产生显著結果的要求等等，来玩那套老把戏。“联合会”在那里繼續斷言說，在第 10 期所載的那些論文中，“‘联合会’始終看不出有什么背离代表會議的草案所規定的一般原則的异端行为”（“两个代表大会”第 26 頁），它这种說法只是暴露它完全不能或者不願意了解意見分歧的实质。

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10 期出版以后，我們已經只需要作一个最后的嘗試：举行一次普遍的討論，以便弄清是不是整个“联合会”都对这些論文以及对它那个編輯部表示同意。“联合会”对我们这种做法特別表示不滿，責备我們企图在“联合会”中制造糾紛，說我們干涉旁人的事情等等。这种責备显然是沒有理由的，因为在一個选举产生的編輯委員會有一点风就“飄蕩起来”的情形下，一切都是由风向决定的，而我們当时就是在秘密會議上确定这个风向的，这种會議除了打算实行統一的那些組織的成員之外，是沒有任

何旁人参加的。用“联合会”名义对六月決議提出的修正使我們对于达成協議所抱的最后一綫希望也完全消失了。这种修正确齒地证明“联合会”已經重新轉到經濟主义方面去，证明“联合会”的大多数是对“工人事業”杂志第10期的內容表示同意的。他們要求从那些确定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現形式的文句中勾去“所謂經濟主义”（理由是說这几个字“意思不确定”，其实根据这个理由只能得出結論說，必須把这个广泛流行的錯誤思想的实质更明白地确定一下），还要求把“米勒兰主义”也勾掉（虽然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業”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頁上拥护过这个主义，并且在“前进报”上面更加公开地拥护过这个主义^①）。虽然六月決議已經明确地指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領導无产阶级为反对各种政治压迫、經濟压迫和社会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的一切表現”，因而要求把所有这一切斗争表現变成有条不紊的和統一的斗争，然而“联合会”却还要求加进一些絕對多余的字句，如說“經濟斗争是对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刺激”（这些字句本来是无可爭論的，但它们在有狭隘“經濟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却只会使人們根据它来作出各种曲解）。并且，他們还对六月決議加进一种簡直是直接缩小“政治”概念的修正，这就是要求刪去“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記推翻专制制度的目标）几个字，另一方面却要加上“經濟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当然，听到这样一些修正之后，我們这方面的所有发言人都相继拒絕发言，认为继续同一些重新轉到經濟主义方面去，并要求保证自己有动摇的自由的人进行談判，是毫无益处的。

“正是‘联合会’认为是保证将来協議巩固，即保持‘工人事業’

① 在“前进报”上，該报現在的編輯部，考茨基同“曙光”杂志已經就這個問題展开了論戰。我們一定会使俄国讀者了解這次論戰的⁴⁸。

杂志的独立面目及其自主地位的 *sine qua non*^① 条件的东西，‘火星报’则认为是阻碍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两个代表大会”第 25 页）。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我们从来也没有侵犯过“工人事业”杂志的自主地位^②。至于“联合会”面目的独立性，那我们确实是无条件地排斥过的，因为这种“独立面目”是要在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上讲独立，六月决议正是无条件地反对这种独立面目的，因为这种“面目的独立性”在实践上始终是意味着——我们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动摇，并以这种动摇来维护我们这里盛行的、为党所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工人事业”杂志用它第 10 期上所登载的那些论文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清楚地表明，它想要保持的正是这种面目的独立性，而这种愿望也就自然地和必然地导致了决裂和宣战。但是，如果“工人事业”杂志的“独立面目”是意味着把它的活动集中在一定的出版任务上，那末我们大家都是愿意承认这种意义上的“独立面目”的。这种任务自然应当这样来正确地分工：1. 科学杂志，2. 政治报纸，3. 通俗的文集和通俗的小册子。“工人事业”杂志只有同意这种分工，才能证明它真心愿意彻底抛弃它那些为六月决议所斥责的错误思想；也只有这种分工，才能完全消除任何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真正保证协议的稳固性，同时又能成为保证我们的运动达到新的高潮和获得新的成就的基础。

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革命派所以同机会主义派最终决裂，并不是由于什么“组织上的”情况，而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想要坚持机会主义的独立面目，企图继续用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議論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① 必需。——编者注

② 如果不把为建立各个已经统一的组织的共同最高委员会而召集的编辑会議看做是对自主地位的一种约束的话，但是召集这种编辑会議是“工人事业”杂志在 6 月間也曾經表示贊成的。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我在“怎么办?”一书第 141 頁^① 上提到的那个“发起团”，要求我把叙述他們參加在各个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組織中間进行調解的經過那段話，作如下的更正：“該团的三个成員中只有一个人是在 1900 年末退出了‘联合会’，其余两个人直到 1901 年間才退出，因为这时他們已經深信无法使‘联合会’同意去和‘火星报’国外組織及‘革命組織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代表會議，——而这正是‘发起团’的建議的內容。对于这一建議，‘联合会’的領導起初表示拒絕，并說它拒絕举行代表會議的理由是由于担任調停的‘发起团’成分‘不合格’，而表示願意去同‘火星报’的国外組織直接接洽。可是过后不久，‘联合会’的領導却又通知‘发起团’說，它讀了‘火星报’第 1 号上所載的論‘联合会’的分裂的短評之后，已經改變了自己先前的决定而不願意去同‘火星报’接洽了。既然如此，那末‘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先前所說‘联合会’拒絕举行代表會議只是由于不滿意‘发起团’的成分这种話，又应当怎样解釋呢？事实上，‘联合会’的領導在去年 6 月同意召集代表會議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这时‘火星报’第 1 号上所載的那篇短評仍然有效，并且‘火星报’对‘联合会’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六月代表會議以前出版的‘曙光’杂志第 1 期和‘火星报’第 4 号上已經更明显地表示出来。”

尼·列宁

载于 1902 年 4 月 1 日

“火星报”第 19 号

按“火星报”原文刊印

① 見本书第 173—174 頁。——編者注

注 释

“怎么办？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一书，是列寧在1901年末—1902年初写成的。在“火星报”第4号（1901年5月）上的“从何着手？”一文中，列寧指出，这篇文章是“一个計劃草案……关于这个計劃，我們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詳細的發揮”。

1901年秋列寧直接着手写这本书。在1901年11月所写的“‘統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編’序言”中，列寧曾通知說，該书“正在准备之中，不久就要出版”。在同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列寧发表了“同經濟主義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叫做“怎么办？”一书的大綱。1902年2月，列寧写了这本书的序言。同年3月初“怎么办？”一书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件事，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上曾发过消息。

列寧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并加以論证的思想，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捍卫和發揮。斯大林同志在1905年春天写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見“斯大林全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9—117頁）这本小冊子，是与“怎么办？”一书直接衔接的。他在1905年8月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見“斯大林全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43—154頁）一文，也是为捍卫列寧在“怎么办？”一书中发挥的思想而写的。列寧对这篇文章評价很高，說这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从外面灌輸意識’这一有名問題的絕妙提法”。

1907年，列寧把“怎么办？”一书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刪去了第五章第(1)节（“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并在序言中指出，本书这次出版时“略有刪节，刪去了一些有关組織方面的細節或一些細小的爭論意見”。同时列寧又增加了5个新的脚注。

本书是按1902年版的原文刊印，并且根据1907年版作了校訂。——第1頁。

2 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 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政党。

拉薩爾派 是斐·拉薩爾的拥护者和信徒，以1863年由拉薩爾創立

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骨干。拉薩尔派认为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政府所支持的工人协会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他們主张用爭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議会中的和平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拉薩尔派，并指出他們“許多年来妨碍了組織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最后簡直变成警察手中的工具”。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以及同恩格斯的通信中对拉薩尔派的理論观点和策略作了評价。

愛森納赫派 是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思想上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愛森納赫派在威·李卜克內西和奧·倍倍尔的领导下，在 1869 年的愛森納赫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两个政党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政府迫害的加紧，这两个党于 1875 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一个統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拉薩尔派是这个党里的机会主义派。

列宁在 1913 年 8 月所写的“奧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中对拉薩尔派和愛森納赫派做了評論。——第 6 頁。

3 盖得派和可能派 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別，它們是 1882 年在法国工人党分裂之后产生的。

盖得派 是指茹·蓋得的拥护者，它是左派，即馬克思主义派，坚持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盖得派在 1901 年組成为法国社会主义党。

可能派 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別，它引誘无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斗争方式，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局限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possible)办到的范围内。1902 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別一起組成了法国社会党。

1905 年，法国社会主义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在 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茹·蓋得和法国社会党的整个领导一起轉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了。——第 6 頁。

4 費邊社分子 是指 1884 年由英国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所建立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費邊社”的參加者。“費邊社”是以罗馬統帅費邊·孔克达特(“缓进者”)的名字命名。費邊以缓进待机，回避决战聞名。費邊社分子引誘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主张通过細小的改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經在 1893 年 1 月 18 日給左尔格的信中評論过費邊社分

子。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屢次評論過費邊社分子。見列寧的“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英國的和平主義和英國的不愛理論”等等。——第 6 頁。

- 5 列寧摘譯了恩格斯為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第三版所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221—222 頁）。——第 8 頁。
- 6 “無題派”是指 1906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無題”雜誌的組織者和參加者——謝·尼·普羅柯波維奇、叶·德·庫斯柯娃、瓦·雅·博古查爾斯基等人。“無題派”公開宣布自己是修正主義的擁護者，支持孟什維克和自由派，反對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政策。列寧稱“無題派”為孟什維克式的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人式的孟什維克。——第 10 頁。
- 7 德·伊·伊洛瓦斯基（1832—1920 年）——歷史學家，編寫過許多在革命前俄國的中小學里普遍采用的正式歷史教科書。他在教科書中把歷史主要歸結為帝王將相的活動，用種種次要的和偶然的情況來解釋歷史過程。——第 11 頁。
- 8 講壇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產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德國。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大學講壇上假冒社會主義名義鼓吹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者硬說資產階級國家是超階級的東西，說它能夠調和各個敵對階級並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既不傷害資本家的利益，又能尽可能照顧劳动者的要求。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宣傳講壇社會主義的觀點。——第 12 頁。
- 9 漢諾威決議是 1899 年 9 月 27 日—10 月 2 日（10 月 9—14 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漢諾威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就“對黨的主要觀點和策略的攻擊”問題而通過的決議。代表大會所以討論這個問題並通過這項專門的決議，是由於以伯恩施坦為首的一伙機會主義者提出要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並要求重新審查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否決了修正主義者的觀點，但決議中沒有批判和揭露伯恩施坦主義。伯恩施坦派也投票贊成這個決議。——第 13 頁。
- 10 卢卑克決議是 1901 年 9 月 9—15 日（22—28 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盧卑克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決議。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是進行反修正主義的鬥爭。那時，修正主義已經成為黨內的右翼，有自己的綱領和刊

物《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前很久就发表过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要求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自由”。代表大会拒绝了伯恩施坦派提出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伯恩施坦提出了公开的警告，但是在原则上没有提出伯恩施坦主义者不能留在工人政党内的问题。——第 13 页。

- 11 德国社会民主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是在 1898 年 9 月 21—26 日 (10 月 3—8 日) 召开的，它是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大会宣读了没有出席的伯恩施坦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叙述了他以前在一系列文章中发表过的机会主义观点并且为这些观点辩护。在大会上，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中间，没有一致的意见。一些人 (倍倍尔、考茨基等) 主张对伯恩施坦进行思想斗争，并批判他的错误，但反对对他采取组织手段。另一些人——以罗·卢森堡为首的少数则比较坚决地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第 13 页。
- 12 斯塔罗维爾 是亚·尼·波特列索夫的笔名。波特列索夫是“火星报”编辑，后来成了孟什维克。——第 14 页。
- 13 “趾高气扬的作家”是阿·馬·高尔基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篇名。——第 16 页。
- 14 列宁指的是“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这篇文章集，该书在 1895 年 4 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刷，印数为 2 000 册。书中包括了列宁以克·土林的笔名写的一篇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见“列宁全集”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311—481 页)。——第 17 页。
- 15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于 1899 年在流放地写的，目的是反对一些“经济主义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宣言——《Credo》。列宁从姐姐安·伊·叶利札罗娃那里收到《Credo》以后，就写了这篇尖锐的、揭露性的抗议书。
- “抗议书”在列宁召集的(在米努辛斯克州叶尔马柯夫斯科耶村)十七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政治犯的会议上讨论并且一致通过。土鲁汉斯克和奥尔洛夫(维亚特卡省)的流放者都同意这篇“抗议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书”由列寧寄給国外的“劳动解放社”。1900年初，格·瓦·普列汉諾夫在“供‘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参考的 *Vademecum*(指南。——編者注)”文集中，轉載了“抗議书”。——第 18 頁。

- 16 “往事”(月刊)是一种历史杂志，1906—1907 年在彼得堡出版。1908 年杂志改名为“过去的年代”，后被沙皇政府封閉。1917 年 7 月，該杂志在彼得格勒复刊，一直出版到 1926 年。——第 18 頁。
- 17 “供‘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参考的 *Vademecum*”是一本資料文件汇編，汇編中的資料文件是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的机会主义观点的；书的前面載有普列汉諾夫写的一篇序言。这本文集是由普列汉諾夫編輯的，由“劳动解放社”于 1900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第 19 頁。
- 18 «*Profession de foi*» 是一份說明基輔委員會的机会主义观点的传单；传单是在 1899 年写的。传单內容有很多地方和“經濟主义者”的有名的 «*Credo*» 相同。列寧在“論 «*Profession de foi*»”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見“列寧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251—260 頁)。——第 19 頁。
- 19 “‘工人思想报’附刊”是“經濟派”“工人思想报”編輯部于 1899 年 9 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中，特別是在署名尔·姆·的“我的实际情况”一文中，公开发表“經濟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倒退倾向”一文中以及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这本小册子作了批判(見“列寧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223—250 頁和本书第 15—22, 52, 62—63 頁)。——第 22 頁。
- 20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9 卷第 13 頁。——第 23 頁。
- 21 列寧摘譯了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8 卷第 565—567 頁)。——第 27 頁。
- 22 “俄国旧事”(月刊)是一种历史杂志，1870—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31 頁。
- 23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是一种秘密報紙，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共出版过两号：第 1 号出版于 1897 年 2 月(报上印的是 1 月。这一号在俄国油印了 300—400 份)；第 2 号于 1897 年 9 月在日内瓦出版。——第 32 頁。

- 24 “工人报”是基辅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的秘密机关报。共出版过两号：第1号在1897年8月出版；第2号在同年12月（报上的日期是11月）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工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在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警察捣毁了印刷所以及中央委员被捕，该报没有继续出版。——第32页。
- 25 列宁提到的“非正式会議”是于1897年2月14日和17日（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議的一方面有弗·伊·列宁、安·亚·瓦涅也夫、格·馬·克尔日札諾夫斯基及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其他成员，即所谓“老年派”（他们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地以前曾释放出狱三天），另一方面有在列宁被捕后领导“斗争协会”的“青年派”。——第33页。
- 26 “‘工作者’小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自1896年至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一共出版过十号。第1—8号是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会员转到“经济主义”方面去，“劳动解放社”拒绝担任该报的编辑工作。于是“‘工作者’小报”第9—10号就改由“联合会”建立的新的编辑部编辑出版。——第33页。
- 27 “弗·伊一中的文章”即弗·巴·伊万申的文章。——第34页。
- 28 瓦·沃·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是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表——“经济主义者”。——第35页。
- 29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由德国自由资产者希尔施和敦克尔两人在1868年建立的，他们鼓吹“阶级利益和谐论”，诱惑工人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把工会运动的任务局限于储金互助会和文化教育团体的范围内。——第40页。
- 30 “前夜”是民粹派的杂志，自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以俄文出版。共出版了三十七期。该杂志使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第42页。
- 31 格·瓦·普列汉诺夫以恩·别尔托夫的笔名于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了有名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第49页。
- 32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曙光”杂志第1期（1901年4月）上作者署名为“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的一篇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主义者赞”。诗中

嘲笑了“經濟主义者”迁就自发运动的态度。詩的作者是尤·奧·馬爾托夫。——第 49 頁。

- 33 在“火星报”第 7 号(1901 年 8 月)“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登載了一位紡織工人的来信，这封来信說明列宁的“火星报”在先进工人中間有很大的影响。

来信人写道：“……我把‘火星报’拿給許多工友看过，結果把这份報紙通通弄破了，可是这期報紙却是很寶貴的……这里讲的都是我們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种东西是沒有办法用金錢來估价，用钟点來計算的。当你讀到報紙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們工人和領導我們的那些知識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錢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 工人群众現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經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這話說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現在大家都知道必須爭取自由，用胸膛去爭取自由。現在所有的人，不論老少都願意閱讀书籍，只是可惜我們缺乏书籍。在前一个星期日，我召集了十一个人在一起閱讀了‘从何着手?’一文，我們直到半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說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 我們很想向你們‘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們大家應該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們大家應該怎样活和怎样死。”——第 85 頁。

- 34 “俄国报”是溫和的自由主义的報紙，自 1899 年至 1902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90 頁。

- 35 “圣彼得堡新聞”自 1728 年起在彼得堡出版，它是 1703 年出版的俄国第一个報紙——“新聞报”的繼續。自 1728 年至 1874 年，“圣彼得堡新聞”由科学院出版，自 1875 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該报一直出版到 1917 年底。——第 92 頁。

- 36 这里指的是“工人反資本斗争社”。这个組織人數不多，观点接近于“經濟主义”，是 1899 年春天在彼得堡建立的。这个团体曾經油印了传单“我們的綱領”，但是由于組織被破获，传单沒有能够散发出去。——第 98 頁。

- 37 N. N. 即謝·尼·普羅柯波維奇，是积极的“經濟主义者”之一，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第 105 頁。

- 38 列宁指的是 1893—1895 年他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第 121 頁。

- 39 指“向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1900年巴黎)”这本小册子。该报告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委托“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向大会提出的，并于1901年由联合会以单行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本小册子还包括了崩得的报告(“俄国和波兰的犹太工人运动史”)。——第136页。
- 40 列宁加这个注释的目的是为了保密。其实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排列的。——第149页。
- 41 指的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列宁的商谈，列宁在1897年下半年写了本文中所提到的两本小册子。——第149页。
- 42 指的是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弗·伊·列宁的商谈。——第150页。
- 43 列宁叙述的“第四件事实”，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和崩得要在1900年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所提到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指的是伊·赫·拉拉扬茨(社会民主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他是为了同弗·伊·列宁商谈而于1900年2月去到莫斯科的。——第150页。
- 44 列宁引用的是德·伊·皮萨列夫的文章“幼稚想法的丧失”(见“皮萨列夫文选”两卷集1935年俄文版第2卷第124、125页)。——第163页。
- 45 列宁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的下面一段话：
-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却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121页)。——第164页。
- 46 揭尼恰尔是苏丹土耳其的一种享有特权的步兵，于1826年取消。揭尼恰尔掠夺居民，残暴异常。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做揭尼恰尔。——第167页。
- 47 列宁在1907年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略去了这个附录。——第173页。
- 48 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党的生活”栏发表了一篇短评“‘曙光’杂志同‘前进报’的论战”，对这一次论战作了总结。——第178页。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本书譯文华自“列子全集”中文版第5卷，這次排印第二版时，譯者对譯文又作了一次校訂。

列 宁
怎 么 办?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內大柵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印数 $\frac{1}{32}$ · 印张 6 · 插页 5 · 字数 136,000
1960 年 3 月第 1 版 1965 年 3 月第 2 版
1965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658 定价（四）0.84 元

